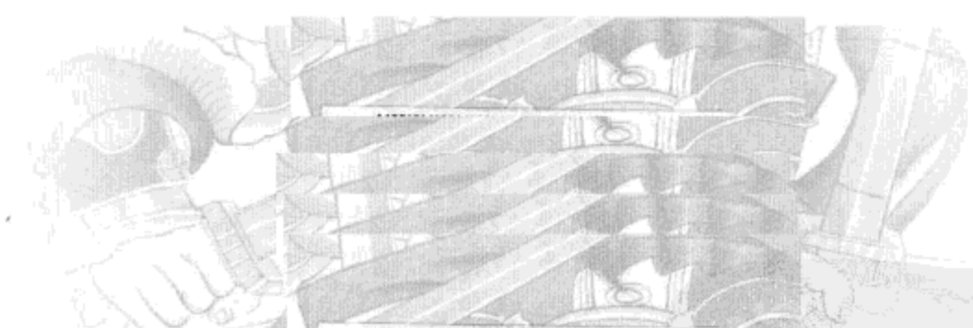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蒙曼 著

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蒙曼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81056-981-3

Ⅰ.唐… Ⅱ.蒙… Ⅲ.禁军-军事制度-研究-中国-唐代 Ⅳ.E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021 号

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作　　者　蒙　曼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　彩插:4 页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81-3/E·5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持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学校“211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所谓“211工程”是指国家在21世纪重点办好100所左右的大学，使这些大学不仅成为国内高校的龙头，而且在世界同行中也应有重要的影响。科学研究是办好大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系承担的这个书系，正是在我校列入此项工程之后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它视作学校整体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建设，也关系到学校科研的整体发展。这么说是不是我们有点自言其重了？也许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学校和历史系双重角度着眼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央民族大学从1951年建校开始，历史系（1956年设置）就成为学校比较有特色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在学校发展中以培养优秀人才和科研见长，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人文基础学科不太景气的时候，历史系的厚重学术和踏实学风仍旧得以保存。我们希望这种风气持续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中央民族大学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起家并形成特色的，现在我们虽然朝着综合性大学全方位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项和特色仍然是学校长久持续的核心内容，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文学这些特色学科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所以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作为学校“211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其中。

所谓“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

和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研究的核心集中于此，这个书系自然也反映这个特点。中国历史的多民族、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到一体格局的形成，足以证明忽略民族和民族关系是不可能搞清中国历史发展面貌的，这在今天的学术研究已成常识，但是具体微观的研究仍然缺乏，这不是说已有的成果不多、不丰富，只是这个领域提供给人们的空间实在太大，足以让我们和后人沿着前贤的足迹继续前进。本书系设立的目的即在这里。

具体到这个书系本身，我们采取的原则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专著的作者多数是本系的教师，也有部分校内外的同行，若条件允许，本系离退休教师的作品也将列入其中。我们之所以搞这个系列，主要是从专著本身具有较高学术性的角度着眼的。一般认为，所谓专著是指作者本人长期研究的课题，作者长期专注与此，对研究的问题当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或者学术新意，这样的作品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当然，相应的荣誉和承担的责任也由作者本人负责，所谓文责自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愿以此作为本书系宗旨之一。

历史系的教师不多，而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分散，用一个主题去限定恐有不周之处，故以“民族历史文化”为名，将这个领域内与此有关的作品收入，经过系列出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一整套的研究成果，这些作品将会在一个方面反映历史系科研的面貌，同时也能反映民族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风貌，到那时如果能够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可，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欣慰。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编委会

内容提要

北衙禁军指的是屯驻于宫城以北，以保卫皇帝和皇家为主要职责的皇帝私兵。有关唐前期北衙禁军的状况，以前学者囿于材料的限制而较少措意。本文在大量掌握新史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基本线索，勾勒北衙禁军发展的几个阶段，并具体研究每个阶段禁军的特点和职能。

北衙禁军是伴随着唐初军队国家化的完成而出现的，是皇帝私人需求凸显的产物。真正意义上的北衙禁军形成于贞观十二年，以招募制和私属化为基本特色，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唐前期北衙禁军发展的整体思路。

高宗、武则天两朝羽林军的建立和官署的完善使北衙禁军在建制上脱离南衙十二卫，这种走向与同时期“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以及皇权的强化紧密相连。这一时期，北衙禁军开始大规模消解府兵的职任和人员，在中央宿卫方面承担了主要角色。

羽林军内部的一个独立分支——百骑是与皇帝私人关系更为密切的武装力量。它在武则天以后崇重内廷的氛围中迅速发展为千骑、万骑。唐隆政变后，立功万骑取得功臣封号，形成“唐元集团”的势力，极大地影响了玄宗一朝禁军系统的格局。开元后期，万骑演变成为建制完备的龙武军，同时形成内部迁转机制。与此同时，宦官统领的内飞龙兵崛起，以皇帝为核心的分层防务体制形成。

玄宗时代，北衙禁军向内廷迅速靠拢，在若干方面形成类似于宦官的制度，宦官和禁军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准内廷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是禁军将士社会身

份的下降与对国家公共生活影响力的缩小，这也是同时期理性政治发展的产物。

在整个唐前期，与北衙禁军的发展壮大同步的是府兵制的衰落与瓦解。在禁军的发展过程中，府兵不断被吸纳进来，从而在人员和职任上都实现了禁卫合流，北衙禁军同时成为府兵制瓦解的因子和出路。

北衙禁军的出现是唐朝针对府兵制本质发生变化，府兵亲密程度下降问题做出的回应，其发展则是逐步摆脱南衙影响，向内廷化演进的过程，这一演进到玄宗开元后期臻于成熟。但是，成熟的制度也孕育着它的反面，宦官干军、兵骄将堕等政治痼疾已露端倪。皇帝为了让自己不受制于权臣所采取的措施最终却导致皇帝受制于家奴，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序

唐代制度史之研究，必与政治史相结合，既需要关注政治事件对制度的影响，也要留心制度建置对政治进程的制约，此道理虽然人人尽知，但是要找到一个制度与政治史可以结合起来的点，而又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却并不容易。有关唐代禁军制度，有《六典》、《通典》、《会要》等书的记载，于前期制度，约略可寻，而后期则不够明晰。唐代禁军在政治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宫廷政治，多系宫闱秘闻，非外廷所能知悉；且其事实往往遭胜利者之篡改，所余史料有些并非信史；有关唐代禁军参与宫廷政治记录，详于后期而略于前期。最近若干年来，西安周边出土的唐代墓志陆续发表，其中不少志主即唐朝前期禁军将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禁军的宝贵材料，为制度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架起一道津梁。

1999年秋季开始，我在给研究生开的隋唐史课程中主要讲授唐代石刻史料。恰好蒙曼来北大攻读博士学位，从我治隋唐史，因而鼓励她注意墓志史料。她好学深思，很快注意到墓志中大量的禁军史料价值，而确定以唐代前期禁军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对这一选题极表赞同，因为制度史和政治史为北大历史系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我自己专注十余年所做的归义军史研究，实际也是以政治史和制度史为纲，附以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展开论述的。归义军乃唐朝一偏远方镇，岂可与唐朝宫廷政治与禁军历史相提并论，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如此丰富的西安出土墓志，恐怕我也可能早就转而治“长安学”，而非“敦煌学”

了。

从选题到博士论文，从博士论文到这本专著，我觉得蒙曼的这部作品是成功的，虽然其中具体的短长可由读者品评，但其研究政治史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

如今，随着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传统的制度史研究面临着挑战，我以为用旧的方法做复原式的研究，虽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已经不太“好玩”了，我们过去耗费不知多少精力辑录的职官、衙署名称，现在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决。因此，利用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史料进行透彻的分析，把制度史和其他相关的历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必然成为今后制度史研究的方向。蒙曼的这部著作，注意从纷纭的史料中解析体制问题，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希望今后能够在方法论上努力精进，并且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

蒙曼作为我的第一个博士，很高兴她的书稿即将出版。教学相长，我写给她书稿的这些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隋唐长安研究的自我鞭策。因不揣浅陋，略述本书学术因缘如上，是为序。

荣新江

2005 年 4 月 23 日

PDG

目　录

导言……（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缘起……（1）
第二节　20 世纪唐代禁军问题研究回顾 ……（2）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本书结构……（8）
第一章　屯营——太宗朝北衙禁军的建立 ……（13）
第一节　唐初军队的国家化与太原元从 ……（13）
第二节　玄武门之变与北门守备的加强 ……（25）
第三节　贞观十二年北门屯营的建立 ……（30）
第二章　羽林军——高宗朝到玄宗朝的变化 ……（45）
第一节　羽林军的诞生和职官系统的建立 ……（45）
第二节　羽林军的基本形态 ……（54）
第三章　龙武军与玄宗朝禁军体制的完备 ……（80）
第一节　百骑系统的发展与武周末到玄宗初的政变 ……（80）
第二节　前期唐元功臣集团的形成及挫折 ……（90）
第三节　龙武军的建立与后期唐元功臣集团……（114）
第四章　皇帝与皇家——唐前期禁军向内廷化之变迁……（141）
第一节　北衙与长安北城——禁军准内廷体制的
建立……（141）
第二节　禁军身份的卑微化——户奴与奴官……（148）
第五章　北衙禁军与府兵制的消解……（160）
第一节　北衙禁军对府兵人员的吸纳……（160）
第二节　北衙禁军对于府兵职任的消解……（167）

余论　唐前期北衙禁军的渊源及走向……（179）
第一节　骁果、给使营与唐代的北衙禁军……（179）
第二节　唐前期君主专制的强化与禁军的走向……（187）

参考文献……（195）
后记……（210）

导　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缘起

军事制度是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联系着权力与安全，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越了制度本身。北衙禁军是唐代军队系统中负责保卫皇帝及其家族的武装力量，因此，它又与皇权政治的运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立足于北衙禁军在唐代前期的发展演进，观察同一时期皇权的强化、内廷势力的发展和与此相关的制度兴废与人事变迁，可以深刻体会到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走向。同样，在一个流动的历史过程之中观察制度的演进，也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造成演进的复杂动力与机制。为此，本书首先以时间为线索，描摹不同历史时期北衙禁军的不同状态，揭示禁军制度与政治实践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结果。

禁军制度的演进形态又与其所活动的空间结构紧密相连。正是因为宫城北门这一特殊的驻防位置，才使得北衙禁军从一开始就介入到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影响斗争成败的关键。这一特性也使得它备受瞩目，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空间政治结构的影响和塑造，直至最终被纳入内廷权力范畴。

考察任何一种制度都离不开设计、运行与维持这项制度的人的思想与活动。本文关注禁军制度的缔造者——皇帝为维护自身权力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对禁军制度产生的影响，也关注禁军组织的成员——包括禁军将领结成的利益集团以及集团的凝固化与

制度化；还包括禁军士兵的来源、职任、待遇及其与其他军事系统的关系。本书同样关注与禁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特殊群体——宦官在当时政治结构中的活动趋向与地位变化，正是这些复杂的因素共同塑造了所谓北衙禁军。

最后，我还要把研究的时间断限定位在唐前期。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朝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直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做法。事实上，这种基于运用方便而做的简单划分往往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并不能完全吻合。仅就兵制而言，在时间坐标上位于“安史之乱”以前的玄宗朝便是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许多通行于唐后期的制度在玄宗朝已经出现甚至基本定型。比如历来受到史家广泛关注的府兵制的解体与节度使制的形成便是如此。北衙禁军也不例外，其各项制度的演进完成于开元二十七年（739）龙武军的建立。但是，任何制度发生影响都需要时间来显示，“安史之乱”作为一场浩劫也确实加速了唐朝社会的重组，因此，我们仍然将唐前期截止于“安史之乱”，探讨在此之前北衙禁军的演进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节　20世纪唐代禁军问题研究回顾

20世纪对唐代禁军问题的研究，大体开始于30年代[①]。

滨口重国在《从府兵制到新兵制》一文中，将府兵制的解体解释为一个一分为三的过程，即囊括全部军防任务的府兵制演化为专司中央宿卫的禁军，作为地方警备的团结兵和负责边防守备

① 胡戟等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孙继民所撰第三章《兵制》部分有对禁军的研究介绍，但与笔者关注点有所不同。

的藩镇[①]。这一概括着眼于宏观，对于我们研究禁军与府兵制的关系颇有启发。

4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一章深入探讨了唐代皇位继承不稳定与北门禁军及宫廷构造之间的关系，虽然关注的重点在于宫城北门的政治意义，但仍然促使我们思考北门禁军的发展与唐前期宫廷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②]。

在西方，法国的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早在1948年就出版了《新唐书·兵志》的翻译[③]，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对于唐代兵制的兴趣，虽然有一些相关的讨论[④]，但很少有人从制度层面加以研究。

对于唐代禁军制度做深入研究的一批重要成果诞生于50年代。1955年，菊池英夫发表《唐府兵制的成立过程与北衙禁军的起源》[⑤]，次年又发表《唐代北衙禁军考》[⑥]。作者认为，唐高祖父子各自招募军队共创李唐政权，并凭借各自的军事实力来瓜分政治权力，贞观十年（636）设置军府实际上意味着长期以来私人军队国家化进程的最终完成。武德时期（618—626），三万

---

① 《从府兵制到新兵制》，《秦汉隋唐史研究》上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二次印刷，第3—83页。原载《史学杂志》第41编第11、第12号，1930年。

②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9—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 *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e*, 2 vols., Leiden: E. J. Brill, 1947—1948。他还发表了一篇《兵志》译文的附录：Les Insignes en deux parties (*fou* 符) 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 (618—907)，载 *Toung Pao*, 41, 1952, pp. 1—148。

④ 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在《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一书中，讨论前期的一些兵制问题。

⑤ 《东洋史学》第13辑，第61—96页，1955年7月。

⑥ 《史渊》第70号，1956年10月。

太原元从作为天子直属兵户担负着整个宫廷防卫，和王子兵一起构成庞大的私兵群。这些私兵势力在太宗掌权后解体，太宗在正规制度之外创设的百骑、飞骑则延续了太原元从的谱系而成为天子亲军。这一研究对于唐初军事政治形势颇具洞察力，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也为笔者所借重。

1957 年，唐长孺发表《唐书兵志笺正》[①]，对《新唐书·兵志》做了许多精细的考订，其中，第三卷重点考察了不同时期北衙禁军的来源问题。当时宥于体例所未能涉及的一些有关禁军产生原因及走向的思考，则体现在 1993 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章《军事制度的变化》中。他认为，唐代北门禁军产生的原因是府兵制本质的变化。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带有部落兵色彩，是统治者最亲信的武装力量，无论守宫还是守城，完全可以合一，不需要单独的天子禁军。隋代彻底改革府兵制，宿卫士兵和统治者并无特殊关系，因此需要在府兵之外，另设亲兵。唐代北门禁军和南衙卫兵分为独立的两个系统，北门禁军来源不一，但都与当时的统治者有密切关系，且招募的比例愈来愈高，这也是唐代军制发展的总体趋势。

1988 年，黄修明发表《唐代前期的北衙禁军》一文，对这一时期禁军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②]。20 世纪 90 年代后，张国刚开始关注北衙禁军问题，相继发表了《唐代北衙六军述略》[③]、《唐代禁卫军考略》[④] 两篇文章，对于北衙禁军内部诸军的发展脉络、执掌、建制进行了更为清晰的梳理。赵雨乐发表《唐前期北衙的骑射部队——北门长上到北门四军的几点考察》，指出北

① 《唐书兵志笺正》，第 83—107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年。
② 《南充师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第 76—81 页。
③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 143—156 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 年。
④ 《南开学报》1999 年第 6 期，第 146—155 页。

衙是在南衙的母体内成长起来的。北衙禁军肇始于南衙诸卫轮番宿卫北衙的旧有制度，太宗至玄宗期间频繁发生的宫廷政变，加速了君主对于精锐卫队的要求，北衙禁军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着朝廷与宫廷的政治主导地位①。

此外，许多对于唐代政治史、军事史的研究也会涉及北衙禁军。如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提出北衙禁军作为灵活的柔性制度是对于南衙诸卫基于律令制的刚性制度的补充，认为正是这种柔性制度使得北衙禁军与政变结下不解之缘②。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则以开元后期制度调整为背景提出了玄宗朝禁卫合流的观点③。有关府兵制和宦官制度的研究，更是直接对应于唐代前、后两期的禁军问题。由于这方面的论著太多，这里只能择要介绍：前者如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气贺泽保规《府兵制的研究——府兵士兵及其社会》（日本，同朋舍，1999 年）等，后者如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1 年）、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④、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唐代宫廷防卫与宦官权力渊源》⑤、《唐代宦官机构衙署考》⑥ 等研究，都或多或少地谈到北衙禁军问题。其中赵雨乐的一系列论著，关注点在于空间构造对于制度演进的作

---

①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2 期，第 74—81 页。

② 《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 445—461 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

③ 《隋唐五代简史》，第 174 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④ 收入《山居存稿》，第 244—27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⑤ 《唐代的历史与社会》，第 45—58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⑥ 《中国第 4 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621—636 页，成功大学，1999 年。

用，对于理解禁军问题颇具启发性。特别是他所讨论的内飞龙厩在唐玄宗朝的兴起，对于考虑同时期北衙禁军制度的变化更具直接意义。

以上大体是对唐代北衙禁军问题的宏观论述，下面对禁军不同时代、不同组成部分的具体研究择要作一介绍：

关于北衙禁军的早期形态，宁志新《说唐初“元从禁军”》具体辩证了唐初“元从禁军”的组建时间、成分、待遇、编制、人数、管理以及发展状况，认为唐初国内战争结束后留下的三万太原元从进入北衙禁军和南衙内府兵两个系统，由太原元从演化而来的元从禁军于武德七年（623）组建，到龙朔二年（662）被羽林军所取代[①]。

另外，对于玄武门之变的研究也必然涉及同时期的北门守备问题，如李树桐《玄武门之变的再认识》[②]，刘蓬春《“玄武门之变”伏兵考辨》、《“玄武门之变”伏兵计考析》[③]，黄永年《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④] 及《玄武门之变揭密》[⑤] 等，都涉及同时期的军队状况。

关于羽林军的情况，宁志新《唐代的羽林军初探》有专门论述，但基本限于建制演变，其他诸如职能、人员配备等情况则付诸阙如[⑥]。

---

① 《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9 年第 3 期，第 88—94 页。

② 《大陆杂志》第 72 卷第 1 期，1986 年 1 月；收入作者《唐史索引》，第 31—50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年。

③ 分别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 年第 4 期，第 114—121 页；《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 19 卷增刊，1998 年 10 月，第 1—6 页。

④ 《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年；收入作者《文史探微》，第 183—202 页，中华书局，2000 年。

⑤ 收入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 140—151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

⑥ 《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90 年第 4 期，第 88—94 页。

有关百骑（千骑、万骑、龙武军）系统的专论则有汪篯《玄宗时期之禁军及其统帅》，提出玄宗始终以大权畀予亲信奴官，前则有王毛仲，后则有陈玄礼。以王毛仲为中心的北门将士结成朋党，引起唐玄宗的疑惧和打击，但是，唐玄宗以龙武功臣统领禁军的政策未变；玄宗虽然信任高力士，但高力士并未掌握禁军权力；羽林军的名号往往被授予边将或中朝官员，但仅仅作为荣衔[①]。汪篯先生著此文时，许多相关石刻史料尚未得见，其结论不免带有很大的猜测性，但就总体方向而言则极具洞见。这几点结论，对于我们考虑北衙禁军特别是龙武军在玄宗朝的状况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唐后期藩镇坐大、宦官专权的特殊背景下，由宦官统帅、用以保卫中央、制衡藩镇的北衙禁军，特别是神策军势力膨胀，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有关后期禁军，尤其是神策军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前期。如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②]、《神策军的发展》[③]，齐勇锋《说神策军》[④]，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⑤]，赵雨乐《唐末北衙禁军的权力基础》[⑥] 等。以这些研究成果所反映出来的后期禁军状况为坐标，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唐前期北衙禁军的走向。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北衙禁军制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李锦绣《禁军及京师宿卫兵费》，探讨北衙禁军与中央

---

① 收入汪篯《汉唐史论稿》，第 247—25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② 《东洋史研究》第 18 卷第 2 号，1959 年 10 月，第 35—56 页。

③ 《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田村博士退官记念事业会，1968 年 5 月，第 205—219 页。

④ 《陕西师大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93—102 页。

⑤ 《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年。

⑥ 《中国第三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1997 年，第 1—15 页。

财政之间的关系[①]，王素《唐五代的禁卫军狱》关注禁军对于唐代司法体制的影响[②]，薛平栓《浅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③] 以及周敏《论唐代京都“禁军侠少”及在唐诗中之表现》[④] 则探讨禁军的构成人员及其对禁军整体素质的影响，这些成果都拓宽了我们对于北衙禁军问题的研究视野。

上述研究成果，体现出学者在北衙禁军制度前后期的演进、禁军与其他军事制度之间的关系、禁军与内廷势力、禁军与中央政治斗争、禁军与唐代社会等多方面所作的开拓和探索。但是，制度演进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诸如王朝的政治选择、政治集团的利益要求、体制传承的内在规律乃至空间布局、人事兴替、社会思潮等等都会对制度的发展造成影响。因此，演进的机制具有复杂性，具体的发生过程也还有待展开。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本书结构

北衙禁军首先是一个特定的空间概念。唐代隋兴，承袭了隋都大兴城的布局，宫城在最北面，次南为皇城及外郭城。作为皇帝日常起居、听政之地的宫城以北是空旷的禁苑，此外别无屏障，因而安全警卫非常重要。另外，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禁苑的海拔较之城内诸宫殿为高，一旦从这个地方突入宫城，就会形成军事上的居高临下之势[⑤]。在这种情况下，北部禁苑，特别是宫城北门的防务从一开始就受到皇帝的重视。从唐高祖武德年间

① 《唐代财政史稿》，第 1184—118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 2 辑，第 117—12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 《唐都学刊》1992 年第 3 期，第 16—21 页。
④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3 期，第 132—135 页。
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49—58 页。

(618—626) 开始，太极宫北门——玄武门左右由屯营驻守[①]。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以后，大明宫建成，宫北玄武门亦有禁军驻防。开元十年（722）九月二十七日敕："驾在京，左右屯营宜于顺义、景风门内安置，北衙亦著两营，大明北门安置一营，大内北门安置一营。"[②]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武则天时代更名为神都，取代西京，成为国家统治中心。皇帝在洛阳时，宫之北门玄武门也驻有禁军。武则天末年，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桓彦范与敬晖因得谒见，密陈废周立唐的政变计划。他们引禁军将领李多祚筹划其事，谓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政变发动后，桓彦范等遣王同皎与李湛、李多祚往东宫迎太子，请至玄武门指挥诸将[③]。

唐代统治者针对宫城在北、皇城在南这种都城设计模式，将禁军的上直空间主要界定在长安和洛阳宫城北部的禁苑中，这便是禁军名号之前贯以"北衙"的由来[④]。

但是，北衙禁军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驻防于宫城北门，更重要的应该是其特殊的军制。唐前期以府兵制为基本军制[⑤]。府兵由均田农民征发而来，名籍保存于州、县、军府和南衙十二卫。他们按照十二卫的编制宿卫中央，有战事则由兵部依据敕书委派将领组织出征；禁军是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名籍只在本军和兵部。

---

① 此时的屯营尚非严格意义上的禁军，但与后来的北衙禁军有渊源关系，详见第一章。

②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第 1292 页。（本书所用古籍版本情况，详见参考文献。）

③ 《册府元龟》卷六二七，第 7530 页。

④ 参曾我部静雄《唐代南衙、北衙向南司、北司的推移》，《史林》第 64 卷第 1 号，1981 年，第 37—58 页。

⑤ 府兵并非唐前期唯一的兵种，而是与兵募制度相辅而立。但是，府兵作为唐初唯一的常备军，其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府兵制的核心价值取向，也同样适用于兵募。

禁军平时的训练权在于领兵将官，指挥调动权则直属皇帝。毫无疑问，府兵和北衙禁军都属于中央军，但其差异仍然是巨大的。府兵实行征兵制，禁军则实行募兵制。虽然府兵的调动也要秉承皇帝的旨意，并以宿卫为最主要职责，但是，他们更多地体现国家利益和政府行为；而禁军则以皇帝的私人利益为最高准则，是皇帝的私属武装。

本书以时间为基本线索，勾勒北衙禁军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具体研究每个阶段禁军的特点和职能。笔者的研究表明，作为皇帝私人生活及其保障机构与国家公务机构分离产物的北衙禁军，其发展过程正是逐步摆脱南衙控制、向内廷化演进的过程。到玄宗开元后期，北衙禁军形成类似于内侍省的内部迁转机制和独立司法系统，以皇帝为中心的分层防务系统也正式出现，唐前期北衙禁军的发展臻于成熟。但是，这一制度也孕育着它的反面，宦官干军、兵骄将堕等政治痼疾已初露端倪。作为两种不同的军事体制，禁军的发展与府兵的衰落同步进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绝非机械的此消彼长。在禁军的发展过程中，府兵不断被吸纳进来，从而在人员和职任上都实现了禁卫合流，北衙禁军同时成为府兵制瓦解的因子和出路。

本书结构和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章　屯营——太宗朝北门禁军的建立

本章主要辨证了传统史料中对有关“太原元从”和北衙禁军关系的误解，认为北衙禁军是伴随着唐初军队国家化的完成而出现的，它和唐太宗即位以前的亲兵——秦府兵有很大关系；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北衙禁军出现于贞观十二年（638），以招募制和私属化为基本特色，这两个特色规定了唐前期北衙禁军发展的整体思路。

第二章　羽林军——高宗到玄宗朝的变化

高宗朝羽林军的建立和武周朝羽林军官署的完善使北衙禁军

在建制上脱离南衙，取得了和南衙十二卫平等的地位，这种走向与同时期“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以及皇权的发展紧密相连。在羽林军时代，北衙禁军开始大规模消解十二卫府兵的职任和人员，在中央宿卫方面，北衙禁军已经承担了主要角色。

第三章　龙武军——北衙禁军发展的完备

龙武军由羽林军内部一个独立分支——百骑发展而来，百骑独特的出身和侍从职能使得它在武则天以后崇重内廷的氛围中迅速发展为千骑、万骑，并逐渐成为宫廷政变的主导力量。唐隆政变后，立功万骑取得功臣封号，形成我们称之为“唐元集团”的势力。唐元集团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前期集团的打击清楚地显示出统治者对禁军职责与权限的限制。开元后期，万骑改为建制完备的龙武军，同时形成内部迁转机制。与此同时，宦官统领的内飞龙兵崛起，以皇帝为核心的分层防务体制形成，唐前期禁军制度臻于完备。

第四章　皇帝与皇家——北衙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建立

北衙禁军的发展是皇帝私人势力加强的产物，它最终被并入皇帝的内廷势力中。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准内廷体制”的建立。与这种体制相对应的是禁军将士社会身份的下降与对国家公共生活影响力的缩小，这是同时期理性政治发展的产物。

第五章　北衙禁军与府兵制的消解

府兵制的解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贞观十二年以来，北衙禁军一直对府兵进行着职任与人员的双重消解。北衙禁军与南衙十二卫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取代，而是合流，这一点，无论对于中央宿卫还是地方防务都是如此。

余论　唐前期北衙禁军的渊源及走向

隋代府兵制本质发生变化，在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失败后趋于瓦解。隋炀帝因此寻求制度变革，骁果和给使营应运而生。由于隋朝短祚，这两种尝试都未能充分发展下去。继起的唐朝重

建了府兵制，但骁果和给使营的一些精神则通过北衙禁军表现出来。“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宦官由典军而干政的局面，对此，以往史家更多地关注了宦官权力的发展，本章则试图说明，玄宗一朝北衙禁军彻底脱离南衙及其向内廷化靠拢也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一章　屯营——太宗朝北衙禁军的建立

第一节　唐初军队的国家化与太原元从

菊池英夫先生指出，在唐朝立国的过程中，士兵主要由将领招募而来并私属于将领，因此政局稳定后面临着将私属武装收编国有的问题，而北门禁军的建立正与同时期军队的国家化直接相关[①]。这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说法。笔者同意菊池先生将禁军的建立作为军队国家化的后果之一这种考虑，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三万“太原元从”的去向，便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关太原元从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军事系统的说法，最初见于李繁《邺侯家传》，后来又被《新唐书·兵志》采用。志云：“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这种说法渊源有自，遂被学者广泛接受。有关唐代历史的综合性著作，如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都采用此说；菊池英夫《唐府兵制的成立过程与北衙禁军的起源》，宁志新《说唐初“元从禁军”》（《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9 年第 3 期），张国刚

---

① 菊池英夫：《唐府兵制的成立过程与北衙禁军的起源》，《东洋史学》第 13 辑，1955 年 7 月，第 61—96 页。

《唐代禁卫军考略》（《南开学报》1996年第6期），赵雨乐《唐前期北衙的骑射部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专论文章也以此为立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各家也都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局部修正。如宁志新先生认为，太原元从是北衙禁军与南衙内府兵的共同源头。而菊池英夫先生认为，太原元从并未构成禁军的全部，而是演变为后来禁军中的长上折冲、长上果毅。诸说虽然有所差别，但都肯定元从禁军与后来的北衙禁军之间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然而，据笔者看来，太原元从既非像《新唐书·兵志》所云成为北衙禁军的源头，也非如宁志新先生认为的那样既包含北衙禁军又包括南衙内府兵，或是如菊池先生所推测的演变为后来禁军中的一部分。现有材料表明，他们并未被统一编入任何特定军事系统，和后来的北衙禁军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渊起兵所依赖的军事力量。

首先是太原地区的府兵。隋末大乱，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起兵晋阳。太原留守节度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五郡之众，士兵有数万之多。虽然由于李渊起兵带有明显的反叛性质，最初指挥这些军队并不都顺利[①]，但隋代府兵仍是李渊军队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太原周围的府兵系统，为李渊提供了一批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据张国刚先生统计，当时的左右三军统军几乎清一色来自隋代的府兵将士，军头也部分出身于府兵[②]。

李渊军的另一重要来源是私人募兵。义宁元年（618）三月，李渊起事之前，“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攻下西河后，应募者益多，“渊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六月条：“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第5738页。

② 张国刚：《唐代禁卫军考略》，《南开学报》1996年第6期，第146—155页。

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义士。”[①]这些应募者包括太原附近的“豪杰”、“群盗”，甚至若干家奴[②]。李渊自任大将军，又以世子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至七月壬子从晋阳出发之时，已经有甲士3万[③]。这两部分军事力量是最早跟从李渊的军队，因此被称为“太原元从”。

此后，李渊一路攻城略地，不断收编部伍，扩大军力。如攻下霍邑后，“乃节级授官，与元从人齐等。其丁壮胜兵者，即遣从军，配左右领军大都督，还取其同色同党，自相统处之，不为疑异。俘降之徒，不胜喜跃，欣若再生。……自是以后，未归附者，无问乡村堡坞，贤愚贵贱，咸遣书招慰之，无有不至。其来诣军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请效力。……丙申，至汾阴。遣书招冯翊贼帅孙华，华所部强兵至于数千，积年劫掠，非常富实，泺水以北，莫敢当之。帝书到，华喜而从命。……于是拜华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翊郡守。从其来者，仍委华以次授官，颁赐各有差。”[④]

在长安附近，李渊的亲族积极响应。李渊之女（后封平阳公主）、从弟神通及女婿段纶各自募兵，其他据保乡里的所谓“贼帅”也望风响应。“从弟赵兴公神通起兵鄠县，有众数千，闻义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贼帅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则魏公密之从父也。以密反于荥阳，缘坐亡命，招集无赖，抄劫鄜县之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六月条，第5739页。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李渊）教曰：“义兵取人，山藏海纳，逮乎徒隶，亦无弃者。及著勋绩，所司致疑，览其所请，可为太息。岂有矢石之间，不辩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功，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妨也。赏宜从重，吾其与之。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知当时有为数不少的部曲、徒隶参战。（唐）温大雅著，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28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第5739—5741页。

④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9页。

间，众将四五千。盩厔贼帅何潘儿、向善志等，亦各率众数千归附。宜君贼帅刘旻，又率其党数千人降。帝并以不次封，遣书劳之，仍令各于当界率众，便受敦煌公部署。旬日间，京兆诸贼四面而至，相继归义，罔有所遗。”①

到李渊攻克长安时，军队总人数已超过 20 万。这些军队来源复杂，各有所属。其中，招募来的军队与招募者有着很密切的私人关系，募兵归招募者统领。招募者在李渊集团中的地位，也取决于其募兵的多少②。而出身于所谓“群盗”的则仍由旧帅统领③。与此同时，关中地区还有隋代的鹰扬府，在李渊控制长安后，也被收编于麾下④。所有这些力量都是李渊立国的军事基础，但是他们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其中，跟随李渊从晋阳出发的 3 万甲士占据核心地位，他们身经百战，战斗力也最强。

控制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李渊需要将不同的军事力量整合起来，为此，他在武德元年（618）五月建立唐朝后改隋鹰扬郎将为军头，使新接收的各种军力向来自太原地区的战斗部队靠拢。同年六月，改军头为骠骑将军。九月，设置军府⑤，又使战斗部队回归于常规状态下的府兵体制。

以上三个步骤目的在于将入关各路义军与关内土著军进行混一。但是，这种混一在唐初干戈扰攘的局面下还要经历新的变

---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 34 页。

② 如《旧唐书》卷六八《段志玄传》：“义兵起，志玄募得千余人，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第 2505 页。

③ 如《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宜君贼帅刘旻，又率其党数千人降。帝并以不次封，遣书劳之，仍令各于当界率众。”第 34 页。

④ 毛汉光：《隋唐军府演变之比较与研究》，《中正大学学报》第 6 卷第 1 期人文分册，1995 年 12 月，第 119—157 页。

⑤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 6—7 页。

动。武德二年，宋金刚陷沧州，李世民请以三万精兵破之，高祖悉发关中兵与之[①]。这 3 万精兵，菊池英夫认为就是跟随高祖从太原起兵的元从。随后不久，李渊于关内道设十二军，以关内 261 府分隶之。十二军以关中土著为主，跟随李渊的时间较短，战斗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在李世民率领精锐出征后，他们留下来负责守卫关中地区，太原元从和关内府兵再次分途。

武德六年初，太子建成破刘黑闼。武德七年二月，割据河北山西北部的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三月，李孝恭又杀辅公祏，国内战争基本结束。高祖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士兵还于军府。武德七年三月，唐朝初定令，置内外官名，对官僚制度进行整顿，以安置共同创业的功臣，让他们由领兵打仗的谋臣猛将转变为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官僚。

具有首义之功、一直随将领东征西讨的太原元从也被重新安置。《新唐书·兵志》云：

> 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

太原元从本来是由随高祖起事的将领招募而来，带有强烈的私兵性质，“悉罢遣归”意味着他们和原来的领兵官脱离关系，这无疑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步骤。这支军队的成员都来自河东，在关内没有土地。伴随着同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②]，他们之中的愿留者分到了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定居下来，实现了土著化。

问题是这些太原元从和国家防务体系的关系。《新唐书》乃至后代所有关于太原元从转化为“元从禁军”的记载，都本自德宗朝（780—805）李繁所撰的《邺侯家传》，只是在人数上有所

---

①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第 2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七年四月条，第 5982 页。

不同[①]。《邺侯家传》中，有关禁军部分的记述为：

> 国初太原从义之师，愿留宿卫为心膂不归者六万，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师家为永业，于县下置太原田以居其父兄子弟。于龙首监置营以处，并为臣高祖起第于监内，谓之元从禁军。……初，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谓之“父子军”。

又云：“臣高祖仲威从神尧入长安，为左屯卫将军，兼主太原从义之师于龙首监，总南北禁军之任。”[②]

这里，李繁以屯卫为南军、太原元从为北军，文义甚明。《新唐书》以太原元从作为唐代北衙禁军的源头，也正是遵循了李繁之说。只是将愿留的人数由六万改成了三万，以与其他文献吻合。但是，这段记载是否可靠呢？我们可以从文本和事实两方面进行检验。

在文本是否可靠这一问题上，让我们先来看看文中的关键人物李仲威。

对于李仲威的官职，李繁有两个说法，一说见上引文，为左屯卫将军；另一说同样出自《邺侯家传》：“义宁元年，初下京城，为右骁卫将军主之。贞观初，以尉迟敬德权领，后二年，复入领焉。略转右卫大将军，主禁旅凡二十年。”

李仲威其人见于《隋书》卷五四《李衍传》，仅指明其为北周李弼之孙，隋将李衍之子，此外并无相关事迹记载[③]，因而我们无法判定李繁两说中不同官职之间的关系，不宜妄加论断。

---

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三，第8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② 《玉海》卷一三八，第2569—2571页。

③ 《隋书》卷五四《李衍传》，第1362—1363页。此外，《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还提到一个李仲威：“帝从弟赵兴公神通起兵鄠县，有众数千，闻义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贼帅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但就其出身而言，和李泌的五世祖李仲威应是两人。

那么，元从禁军的说法是否可靠呢？先来看一下《邺侯家传》对于元从禁军以后发展的描述：

> 太宗乃以元从军为龙武，分为左右，置将数员分掌之。初，高祖好畋猎，于元从拣善射者百人，分两番于北门长上从猎，谓之百骑。太宗时亦然，衣以五色，赏赐优厚。高宗时渐众，改为千骑，于北门别置营垒，犹统龙武军。武太后朝召入转多，改为万骑，而名羽林军，分左右，置将军，员如龙武。羽林盛而龙武衰。初，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谓之父子军，及置羽林万骑，但取材艺，燕公请募骧骑之后，以为神武军，衰矣。

记载错乱，完全没有史实根据。以此看来，《邺侯家传》作者对于北衙禁军前后发展状况并不熟悉。这样一个整体记载存在严重问题而又缺乏旁证的文本无疑会让人产生怀疑[①]。

既然李繁的说法不可尽信，我们就再来看看散见于其他史料中有关太原元从的记载是否能够与李说吻合。现存史料中的太原元从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元从官僚。他们是跟随高祖起兵的谋臣猛将，建立唐朝后，又成为新政府的管理者，唐王朝的统治者一直对其优奖有加。《文苑英华》卷四四〇《优奖太原勋旧德音》：

> 朕（太宗）嗣膺宝祚……其内外姻戚、平生故旧、太原元从官人及历事之所文武僚佐爰及胥吏，往虽每降国恩，恐

① 李繁有才而无行，当时人已有定评。他因涉嫌“擅兴”罪，唐文宗初被赐死于京兆府。（见《旧唐书》卷一〇三《李繁传》，第3623—3624页。）其《邺侯家传》作于临刑之时，陈寅恪先生认为系“唐人追述前事”之作，不免语涉虚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4页）；岑仲勉先生也认为只能作为二手史料（《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页）。李繁所作《邺侯家传》，本于其父李泌的记述，但是，李泌生存的年代在玄宗至德宗朝，上据唐初已经150余年，李繁作《邺侯家传》更在李泌死四十年后，对于唐初史事的记载，无疑算不得第一手史料。

未周悉，或才用不申，阶品屈滞，或家道贫匮，子孙沦沉，须有矜量，咸使得所。

《唐会要》卷四五：

永徽三年（652）十二月二十八日敕：功臣贞观二十三年（649）已来简退者特宜同致仕例。其太原元从及秦府左右仍各加阶，先有正四品者不在此例。

《新唐书》卷三：

[总章元年（668）四月庚申]，以太原元从、西府功臣为二等。第一功臣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一人，有至四品、五品者加二阶，有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功臣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从六品一人，有至五品者加一阶，三品以上爵一等。

这部分功臣都是官僚，其宦海沉浮有自身的游戏规则，因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姑不置论。

另一种是元从士兵，也是本文的关注点所在。《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第二："武德二年四月甲寅，出库物一百五十万段，以分赐太原元从人。"《唐律疏议》卷四"私入道、诈复除、避本业"条疏议曰："诈复除者，谓课役俱免，即如太原元从，给复终身。"[①]《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太宗遗诏》："太原元从人见在者，各赐勋官一级。"[②] 从以上官方文书可知，太原元从在随李渊进入长安后都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犒赏。武德七年均田后，他们又得到给复终身的优待。到贞观末年，太原元从已经所剩无多，残存者受到勋官一级的嘉奖。有关文书都没有提到"元从禁军"，则李繁所谓三万太原元从统一转化为元从禁军

① 《唐律疏议》，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第97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太宗遗诏》，第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的说法就值得怀疑了。

如前所述，修正《家传》说法的有赵雨乐、菊池英夫、宁志新三说。三说都承认元从禁军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存在，但是并不直接将其与北衙禁军等同起来。

赵雨乐先生认为，李渊起兵太原，至建立长安政权，有愿留宿卫者三万人，未随军队解散归农，高祖以渭北白渠附近之地安置，使屯于宫城北门，编为元从禁军，是唐初专事宿卫的北门屯兵。这批军队经历长期宿卫，士兵老退则由子弟世代相承，有承汉取六郡良家子及死事之孤的遗风。他还认为，此一阶段的北门禁军，并非专门守御宫廷北门，他们只是维持府兵制中轮番宿卫的兵役而已。这实际上是看到了有关北衙禁军源头记载的不合情理之处，而对此作出的模糊性解说。这种解释一方面坚持三万太原元从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使太原元从与北衙禁军脱离了直接对应关系。但是，赵说以为所留元从并非专门守御宫廷北门，而是维持府兵制中轮番宿卫的全部工作，并称“在这一阶段内，宫禁周边包括其在北门宿卫的工作，均由南衙卫队兼顾”[①]。实际是将北衙禁军与南衙卫兵等同起来，并以之对应太原元从，这种解说无疑又与《家传》清晰划分南北军的记述直接冲突。

宁志新先生认为，元从禁军并非单纯的北衙禁军，而是形成南衙十二卫内府兵和北衙禁军两部分。他具体分析了唐初十二卫内府兵和北衙禁军的人数，认为武德七年之内府包括左右卫之亲府、勋一府、勋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左右骁卫、武卫、威卫、领军卫、金吾卫之左右翊府[②]，共 20 个中郎将府。以每府

---

① 赵雨乐：《唐前期北衙的骑射部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3 期，第 74—81 页。

② 宁志新《说唐初“元从禁军”》，《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9 年第 3 期，第 31—37 页。

约千人计，总计 20000 人。左右监门卫有监门校尉 320 人，直长 680 人，长人长上 20 人，直长长上 20 人，合计 2080 人。这样，南衙诸卫内府总计有兵 22000 余人。而北衙禁军有七营，营与府级别相当，以每营 1000 人计，七营合计 7000 余人。与内府兵相加，正符合元从禁军三万之数。

这是一个具有想像力的猜测。问题在于：

第一，北衙七营在《新唐书·兵志》中被记载为太宗朝的制度，武德时期虽然有屯营，但是否就是北衙七营，史料无载，不能确认。并且，从后期制度发展来看，北衙禁军一直分为左右两部，为双数建制。因此所谓“北衙七营”之“七”字，很可能是“屯”字之误写，不能轻易作为数字使用。

第二，唐代三卫例由五品以上子孙和勋官上柱国、柱国子充任，在唐初是官僚子弟出仕的重要途径[①]，而宁先生将名额全部让渡给太原元从，也没有足够的依据。

第三，从现存墓志材料来看，有些太原元从并没有进入十二卫内府或北衙系统。我们在墓志中找到了四位元从功臣子孙的记载：

王贤，“并州太原人也。父绍宗，从太武神尧皇帝龙兴，因授朝请大夫，遂乃编贯神州，徙居赤县。”王贤本人无官，贞观八年死于胜业里[②]。

李智亮，父果，“唐初应物接权，向风慕义。通议大夫，太原元从。”智亮本人为上护军行屯留郡（潞州）户曹[③]。

朱仁表，父君卿，“唐元从，上骑都尉。属太宗文武神尧皇

---

① 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3 辑，第 148—17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

② 《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 323 页。

③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第 377 页。

帝奉天革命[①]，应天顺人，……于时扈从，行至长安。制曰：‘……宜尊先泽，锡以戎班’。”朱君卿徙家于高陵县（属雍州），仁表武周朝解褐授岚州合河县尉[②]。

此外还有王荣，“唐之始祖举义师于北京，唯公之先宗向雄风于西土。……因家上京。”[③]

唐代三卫属于卫官，北衙禁军则比照三卫对待，如果死者生前曾任三卫或禁军，在墓志中例有反映。这四方墓志所见的太原元从都只有散官或将军号，显然并未担任卫官或为禁军，他们的子孙也没有留在禁军系统。

由此看来，宁志新先生有关太原元从转化为南衙内府兵和北衙禁军的解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再看菊池英夫先生的说法。菊池先生认为，元从禁军在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后轮流上番宿卫，其中，番上者被安排在诸卫系统，番下者则在渭北所赐田里从事农耕，他们可能是武德朝北门屯营中长上折冲、长上果毅的来源[④]。是否真的如此呢？

毋庸置疑，武德中玄武门确实驻扎有屯营。如《旧唐书》卷一八七上《敬君弘传》：“武德中为骠骑将军，掌屯营兵于玄武门。”但是，这支屯营是否和武德七年后的“元从禁军”有关呢？回答却是否定的。骠骑将军之号，存在于武德元年（618）六月十九日至七年三月六日之间，尚在李渊遣散军队之前[⑤]，则玄武门屯营兵本不待太原元从而后有。我们在墓志中也找到一个例

---

① 唐高祖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此处“太宗文武神尧皇帝”的说法，可能是太宗文武皇帝及高祖神尧皇帝之略，因为唐人对于太宗的崇敬，而将太宗放在前面。

②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505页。

③ 《文苑英华》卷九〇九《镇军大将军王荣神道碑》，第4784—4786页。

④ 《唐府兵制的成立过程与北衙禁军的起源》，第61—96页。

⑤ 张国刚：《唐代禁卫军考略》，《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第146—155页。

证："曹钦，京兆人。武德元年，自薛举归国，即于北门长上。"① 曹钦就是北门屯营中的一名长上，但并不属于太原元从。《新唐书·薛万均传》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薛万均本罗艺部下，后归唐高祖，"秦王平刘黑闼，引万均为右二护军，北门长上。"同样不属于太原元从。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武德年间，玄武门以北确实有屯营存在。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屯营士兵多为长上。但是，长上士兵来源复杂，与太原元从并无必然联系。当然，从情理考虑，屯营的最初兵源中可能会有许多太原旧人，但却与武德七年遣散太原元从这一整体性安排无涉。

综合文献记载和墓志材料，我们认为，李渊起兵太原，当地府兵、豪绅、群盗乃至奴婢都有追随者。武德七年天下大定后，在太原有产业者大多回到太原，而原来在当地并无根基的士兵则选择了留在京城。太原元从无论去留，都享受课役俱免的待遇，他们可能还被授予散号或将军号以示褒奖，但并未被统一编入军事系统。当然，因为唐初士兵地位较高，我们不排除太原元从中有人自愿放弃"课役俱免，给复终身"的优待而留在军队的可能，但这应该属于个人行为，而并非对于三万愿留者的统一安排。太原元从的这一结局，是唐初军事国家化的重要步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和屯驻于玄武门以北的屯营并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武德年间的北门屯营是否等同于后来的北衙禁军呢？回答还是否定的。我们在序言中说过，北衙禁军不仅仅意味着驻扎于北门，更重要的在于它特殊的军制。而屯营仅仅是兵士上番时的屯聚之所，并非任何特殊的军事单位②。目前我们看到的明

① 《曹钦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404—40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②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确属于北门屯营的敬君弘、曹钦、薛万均三人中，前两人来自南衙诸卫系统，薛万均则属于王子兵，以此推知，当时的宫城诸门分兵主守，各种军事系统都有责任，北门屯营大约就是由南衙府兵与王子兵中的长上者组合而成。《旧唐书》卷一八七上《敬君弘传》称：屯营将领敬君弘在玄武门政变后，赠左屯卫大将军，据此我们推测屯营可能隶属屯卫，但是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管理体制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等同于后来的北衙禁军。

第二节　玄武门之变与北门守备的加强

真正对唐前期北衙禁军发生影响的是武德七年定令后继续存在的王子军队，以及由此引发的玄武门之变。

针对唐代前期宫廷革命频仍，法定的储君无一人能够正常继位，真正继位者必须依靠政变上台的局面，孙英刚先生提出“一君两储三方”格局的概念。其中，“一君”是指握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成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护一个皇位继承人选；“三方”指两大政治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①]。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唐前期的政治史颇有裨益，而这种格局最初形成的原因，便是唐初的王子握兵。

唐朝的创立是李渊家族共同创业的结果。起兵之初，李渊的三个较为年长的儿子建成、世民、元吉都独立领兵，李渊的女儿（后来的平阳公主）、女婿柴绍、段纶、堂弟神通也都各自募兵参战。唐王朝建立后，由于割据战争仍在继续，三位王子继续率军

① 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7卷，第263—2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战。《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载武德七年令云：

> 秦王、齐王下统军为护军，副统军为副护军，……诸军骠骑将军为统军，其秦王、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直（真）[①]、驱咥直、车骑并准此。

具体说来，就是秦王、齐王各有左右三个护军府和左右亲事、帐内府未被纳入国家军事系统。

除这些公开的军队之外，王子们还有自己的私兵。如“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②] 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2000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③]。

伴随军权的还有政治权力。秦王李世民担任中书令、尚书令，齐王元吉为侍中，二人之教与太子令、李渊诏敕并行。“扫荡”天下，拥有巨大军事、政治资本的李世民不甘心屈居人下，遂与太子建成展开激烈的王位之争。齐王元吉在斗争中投靠了建成一方。

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秦王世民密奏太子、齐王淫乱

---

① “库直”为王府武官，隶亲事府，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在有的史料中又写作“库真”，如《隋书》卷三九《元景山传》中，其子成寿即为隋秦王俊府库真。现存墓志材料中，此职一律写作“库真”，因而当以“库真”为确。以此类推，另一王府官名“驱咥直”中的“直”字亦当作“真”，惜无直接证据。又北魏职官中有羽真、比和真、斛落真之类，“真”的意思学者推测为“人”（张庆捷、郭春梅《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7—69页）。据此可知这类官职本出于拓跋系统。此外，严耀中先生《唐初期的库真与察非掾述论》（《史林》2003年第1期，第45—49页）也提到这一制度的北朝渊源。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四年正月条，第5901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七年六月条，第5985页。

后宫，高祖决定次日按问。四日，李世民率亲信提前进入宫中，伏兵临湖殿，诛杀太子、齐王。对于这场伏击战，黄永年先生认为，到临湖殿参与消灭太子、齐王的秦府兵将起决定作用，驻守玄武门的屯营并不是政变必须依靠的力量，其将领在政变前也并未参与决策①。从相关史料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解释。

因此，当太子、齐王兵冲击玄武门时，虽然屯营作为宫门的守卫者必须抵抗，但他们对李世民并非完全的忠诚，对于即将发生的战斗也没有充分的准备。面对来势汹汹的宫府兵，屯营兵军不成列，其将领敬君弘挺身出战，而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②

政变的重点不在玄武门，但玄武门却爆发了政变中最激烈的战斗。由于太子府和齐府二千精兵的进攻，敬君弘和骁卫中郎将吕世衡均死之，若非临湖殿的伏击已经结束，尉迟敬德手持太子、齐王首示众，局面将变得难以控制。这场战斗使太宗认识到玄武门守军的重要性，促进了以后禁军制度的改革。

玄武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诞生了一批功臣。他们因为李世民所居弘义宫在太极殿西而被称为"西府功臣"③。通过考察西府功臣的去向，我们可以了解唐太宗对当时军事重点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只考虑西府功臣中的武臣状况。

---

① 黄永年：《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入氏著《文史探微》，第183—202页，中华书局，2000年。

② 《旧唐书》卷一八七上，《敬君弘传》，第4872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第19页。

表一

姓　名	政变前官职	政变中作用	政变后去向（至贞观初）	出　处①
尉迟敬德	秦府左二副护军	伏兵临湖殿	右武候大将军	旧本传
侯君集	秦府左虞候车骑将军	同上	左卫将军	旧本传
刘师立	左亲卫	同上	左骁卫将军	新本传
庞卿恽	不详	同上	不详	同上
公孙武达	秦府右三军骠骑	同上	右监门将军	旧本传
杜君绰	不详	同上	左武卫大将军	会要 45
郑仁泰	帐内旅帅	不详	丰浩府左别将	补遗 2—192
李孟尝	不详	同上	右威卫大将军	旧本传
长孙顺德	左骁卫大将军	防守玄武门	左骁卫大将军	旧本传
秦叔宝	秦府右三统军	同上	左武卫大将军	旧本传
张公谨	秦府	同上	左武候将军	旧本传
安兴贵	秦府右库真	嘉猷门宿卫	右千牛备身	补遗 1—67
程知节	右二府护军	伏兵临湖殿	右武卫大将军	补遗 2—203

① 表中，“旧”指《旧唐书》，“新”指《新唐书》，“会要”指《唐会要》，“补遗”指《全唐文补遗》，“通鉴”指《资治通鉴》。以下诸表同此。

续表

姓　名	政变前官职	政变中作用	政变后去向（至贞观初）	出　处
张士贵	右库真骠骑将军	不详	右骁卫将军于玄武门长上统屯兵，转右屯卫将军	补遗 1—40
段志玄	右二护军	不详	左骁卫大将军	旧本传
罗君副	右四府右车骑将军①	不详	左勋卫四府中郎将，左骁卫将军	补遗 4—297
曹　钦	将军	伏兵柏堂	新城府别将	补遗 3—405
常　何	监门中郎将	玄武门	真化府折冲都尉长上	补遗 7—4
周孝范	秦府右库真车骑将军	不详	右屯卫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	周孝范碑②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秦府左右为主体的西府功臣中，绝大多数在李世民登基后进入十六卫系统，显然，南衙诸卫是唐初统治者最看重的武装力量。

但在另一方面，北门屯营的力量也得到极大的加强。这可以从屯营统帅的级别变化中得知。政变前，统领屯营的敬君弘是屯

① 按照制度规定，秦王府有左右各三府，罗君副职为右四府车骑，于典籍无考，存疑。

② 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正》，第 162—166 页，中华书局，2001 年。

卫下的骠骑将军，贞观初期的北门屯营统帅已升格为屯卫将军。目前已知的屯营将领有两位，都出身于西府功臣。一是周孝范，据《周孝范碑》称：周孝范武德九年六月任太子右内率，检校北门诸仗，授千牛将军。贞观元年授右屯卫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此后累转左屯卫大将军，仍宿卫玄武门。另一位是张士贵，武德九年为太子内率，右骁卫将军，贞观元年于玄武门长上统屯兵，转右屯卫将军、大将军。周孝范与张士贵分别以左右屯卫大将军统领玄武门屯营，意味着北门屯营分为左、右两营，周孝范和张士贵各统一部。

《通鉴》贞观七年八月乙丑条云："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卒。上行幸，常令范与房玄龄居守。范为人忠笃严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终于内省，与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① 从官职经历来看，这个周范应该就是周孝范。周孝范死后，当时领兵在外的张士贵立即被召还京。《张士贵墓志》称："敕公使持节龚州道总管。途次衡阳，夷獠逋窜。……悬旌五岭，立功百越……其年，被召还京，依旧右屯卫大将军，北门上下。"这次针对百越的军事行动，据《旧唐书·张士贵传》，发生在贞观七年，则张士贵的还京，正是为了接替去世的周孝范。张士贵和周孝范都出身于秦府库真，是长期追随李世民的亲信力量，以亲信统禁兵，也是北门禁军将领一贯的选拔原则。

第三节　贞观十二年北门屯营的建立

1. 军队国家化的最终完成与屯营之建立

玄武门之变在军事上的最大意义在于促成了军队国家化的完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七年八月条，第6102页；又见《册府元龟》卷六二七，第7529—7530页。

成。

如前所述，武德年间军队国家化的成果在于使掌握在各级领兵官手里的太原元从解甲归田，并重新建立了南衙诸卫系统。但是，武德改革留下了两个问题：一是王子握兵，一是十二军。

武德初年，各个王子手中都有规模不等的军事力量。武德七年令中，东宫置左右卫率府、左右宗卫率府、左右虞候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左右内率府，为十率府。秦王、齐王则置左右各三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又有库真及驱咥真，各于左右内选才堪者，量事置之[①]。其中太子率府和二王护军府各以千人计，亲事府则有执仗亲事 16 人，执乘亲事 16 人，亲事 330 人。帐内府有帐内 667 人[②]。是则太子有军队万人，秦、齐二王各有军队不少于 8000 人。王子手握重兵会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这一点在玄武门之变中已经暴露无遗。武德九年六月政变后，秦王世民为首的天策上将府废，大约护军府也同时被废。

问题在于府废后兵士的去向。《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627）条云："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太宗则云不宜示人以隘。但是，从文献中我们看到："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③] 则太宗确实需要组建一支可靠的亲兵。如所周知，贞观以后的北衙禁军都分为左右营，为双数，因而"北衙七营"的"七"字，颇疑即"屯"字之误，其兵力不能确指，但来源可能有很多原来的秦王护军府及亲事、仗内府士兵。依据有关墓志及碑刻，我们找到了一些秦府旧人的材料，如豆卢仁业，为秦王府库真戍守北门，此后累迁

①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 1784 页。
②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第 1306 页。
③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 1330—1331 页。

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卒[①]；段元哲，为秦王府右库真，武德九年授秦王府别将，此后累迁左武卫翊府右郎将，贞观十三年卒[②]；元仁师，为西府（秦王府）库真长史，累迁长上别将，贞观十三年卒[③]；此外还有魏伦，秦王府库真兵曹参军事，显庆三年卒[④]；崔善福，秦王府库真[⑤]。除库真外，秦王府其他武职如右虞候副率检校左领军卫将军乙速孤神庆，“秦王府妙资左右，公以良家首辟，（便）令长上，……公以九年六月四日，载静奸回，因而侍卫，……以贞观五年授右卫勋卫长上。”[⑥] 这样看来，秦府旧人在玄武门之变后的去向似乎十分复杂。但是，周孝范、张士贵都属于原来的秦府库真系统，政变后俱擢北门将军，可以推知秦府旧兵也会有许多随主帅一起，以另一种形式转化成了太宗的私人卫队而进入北衙禁军系统。

另一个在贞观年间得以解决的问题是十二军的取消并转化为府兵。武德二年（619），唐析关中为十二道，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关内诸府隶之[⑦]。武德六年（623），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十二军废。但武德八年（625）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⑧]。军置将军一人，

---

①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468页。
②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481页。
③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447页。
④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367页。
⑤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508页。
⑥ 《全唐文》卷二〇一，第2029—2033页。
⑦ 十二军之设，史料中有武德二年、武德三年两说。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当以二年说为是。参《唐书兵志笺正》卷一，第7页。
⑧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第1291页。

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唐长孺先生认为，十二军有坊主，正如民之有里正，乃是上承西魏北周军民分治之制[①]。

重组的十二军何时废止，史书无考。但是《新唐书·兵志》接下来的记载是："太宗贞观十年（636），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值得注意的是"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一句。我们知道，武德年间构成十二军兵力的正是关内261府，贞观十年以关内诸府隶诸卫，意味着作为战时体制的十二军正式被和平时期的卫府制度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带有强烈战争色彩的统军、别将改称为强调道德意义的折冲、果毅[②]。与之相应，坊主之职也随之罢废，在唐初戎马倥偬时代一度恢复的兵农分离重归于隋朝以来兵农合一的军事体制。贞观十年改制还意味着将关内以外地区陆续增加的军府固定下来，最终形成634府的规模[③]，从而奠定了唐代府兵制的基本格局。

随着王府兵的取消和十二军的废止，唐初以来军队国家化的努力基本完成。帝国的全部兵力都被划归于十二卫名下，根据《新唐书·兵志》规定："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为七番，一千五百里为八番，两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全部府兵按照道里远近，分番宿卫中央。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唐代府兵番上

---

① 《唐书兵志笺正》卷一，第8—9页。

② 折冲为"折冲樽俎"之意。果毅则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之意。隋炀帝最早将其作为招募的骁果领兵官的称号。这种称号较之统军、别将显然具有更多的道德意义。

③ 对于唐代军府数额，各种典籍记载分歧颇大，研究者对此的解释也各有不同，本文取毛汉光先生的说法。参其《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5卷第1期，第111—171页，1994年。

宿卫中央的制度，有关西州蒲昌府出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府兵在州镇服役，并不到中央宿卫[①]。这意味着唐代府兵可能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承担中央宿卫，一种只在地方服役。由部分地区的府兵承担宿卫任务在有关典籍中也有迹象可寻，如开元十一年（723），“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②]，长从宿卫是骠骑的前身，它的兵源范围，很可能也是在此之前上番府兵的范围。另外，《唐六典》卷五规定：“凡诸卫及率府三卫贯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皆令番上，余州止纳资而已。”三卫属于府兵内府，但不排除外府也有类似规定的可能。结合出土文书，应该说只有部分府兵番上宿卫确实反映了府兵制的某种事实。问题是它反映的是什么时期的事实。蒲昌府文书写于开元二年，长从宿卫的选拔是在开元十一年，而《唐六典》则成书于开元二十五年。可以肯定在玄宗朝府兵已经有番上中央和戍守地方两种。但是，唐初是否如此呢？如果把这种情况无限上延，则《新唐书》关于番上服役的记载就成为具文，因为上述地区没有一个远在千里以外。这种考虑是没有根据的。合理的推测是，仅以特定地区的府兵番上是府兵制衰落时代的事情，在唐初府兵制全盛时期，全部府兵都要番上中央。其上番的频率，则依据距离的远近有所不同。综合参考《新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我们大体可以推算出，贞观时期在长安宿卫的外府兵当在九万以上。

---

① 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研究》，《东方学报》第33辑，1963年3月；《关于新获之唐代蒲昌府文书》，《东方学报》第45辑，1973年9月。

②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6—1327页。

表二①

州名	府数	距离（里）	上番人数	州名	府数	距离（里）	上番人数
京兆	131	0	26200	绛州	33	590	4714
华州	20	180	4000	慈州	3	685	428
同州	26	250	5200	隰州	6	885	857
商州	2	220	400	并州	18	1260	2250
岐州	13	310	2600	汾州	12	1090	1500
邠州	10	300	2000	沁州	2	1020	250
陇州	4	460	800	潞州	3	1640	300
泾州	6	480	1200	岚州	1	1580	100
原州	2	80	400	石州	2	1250	250
宁州	11	456	2200	忻州	4	1440	500
庆州	8	570	1143	代州	3	1060	375
鄜州	11	477	2200	潞州	1	1330	125
坊州	5	350	1000	泽州	5	1140	625
丹州	5	550	714	怀州	2	1010	250
延州	9	674	1286	易州	9	2345	750
灵州	5	1250	625	幽州	14	2520	1166
盐州	1	1500	125	平州	1	2650	100
夏州	2	1500	250	妫州	2	2842	200
绥州	4	1000	571	蓟州	2	2823	200
洛州	39	850	5571	荆州	1	1730	100
汝州	4	980	571	夔州	1	2443	100
陕州	15	510	2143	襄州	1	1250	125
虢州	4	430	800	均州	1	900	143
蒲州	33	320	6600	金州	1	737	100
晋州	16	730	2286	梁州	1	760	143

① 表中距离依据《元和郡县志》及《旧唐书·地理志》，指从州制所到长安的距离。军府人数根据府的级别，有1200、1000、800三等，表中一律按1000人计算。

续表

州名	府数	距离（里）	上番人数	州名	府数	距离（里）	上番人数
凤州	1	600	143	瓜州	1	3400	83
成州	1	1000	143	扬州	4	2845	333
扶州	2	1600	200	和州	1	2683	100
秦州	6	800	857	安州	1	1970	100
渭州	4	1100	500	越州	1	3530	83
兰州	2	1460	250	潭州	1	2445	83
洮州	1	1500	100	益州	3	2010	250
岷州	3	1336	375	彭州	2	1985	200
叠州	1	1700	100	蜀州	3	2115	250
宕州	2	1470	250	汉州	1	1910	100
凉州	6	2000	500	邛州	1	2170	83
沙州	3	3700	250	广州	2	4210	166

此外还有内府兵。具体说来，包括左右卫之亲府、勋一府、勋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左右骁卫、武卫、威卫、领军卫、金吾卫之左右翊府，共 20 个中郎将府，以每府 1000 人记，合 2 万人。内府番上原则和外府相同，也按道里远近分番宿卫。此外还有千牛卫和监门卫。左右监门卫各有监门校尉 320 人，直长 680 人，长人长上 20 人，直长长上 20，合计 2080 人；左右千牛卫各有千牛备身 12 人，备身左右 12 人，备身 100 人，主仗 150 人，合计 548 人。则京师番上（包括长上）宿卫将士总数达 10 万人以上。

十六卫府兵番上中央，承担仪仗和宿卫两方面的职责。参照《唐六典》卷二四《诸卫》、卷二五《诸卫府》，《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志》的有关记载，兹将诸卫职责列表如下：

表三

名　称	仪　　仗	宿　　卫
左右卫	大朝会：以黄质鏊甲铠……为左右厢之仪仗。 御坐正殿：黄旗仗，立于两阶之次，朝堂置左右引驾三卫六十人，以左右卫、三卫年长、强直能纠阂者为之。	内廊阁门外：分为五仗，号衙内五仗，皆带刀捉仗，坐于东西廊下。 承天嘉德二门之内：左右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 分兵守诸门：左厢诸门之外事，右厢诸门之内事。 皇城四面、宫城内外：与左右骁卫分知助铺之职①。
左右骁卫	大朝会：在正殿之前，以黄旗队及胡禄队坐于东西廊下。 御坐正殿：以队仗立于左右卫下。	承天门外：左右骁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 分兵守诸门：知左厢诸门之内事，右厢诸门之外事。 皇城四面、宫城内外：与左右卫分知助铺之职。
左右武卫	大朝会：被白质鏊甲铠，跸称长唱，警持跸队应跸为左右厢仪仗。 正殿前：以诸队次立于骁卫下。	在嘉德门内外：以挟门队坐于东西廊。
左右威卫	大朝会：被黑甲铠，弓箭刀盾旗等，为左右厢之仪仗，次立武卫之下。 在正殿前：以诸队列于阶下。	长乐永安门内：以挟门队列于两廊。 分兵主守：知皇城东西面之助铺。

① 左右卫是否承担分兵守诸门的职责史籍无考，但据《唐六典》卷二四：骁卫“分兵守诸门，则知左厢诸门之内事，右厢诸门之外事”，以理揆之，必有其他卫知“左厢诸门之外事，右厢诸门之内事”。我们知道，左右卫和左右骁卫一直是南衙诸卫中最重要的两个卫，再由骁卫“在皇城四面、宫城之内外，与左右卫分知助铺之职”的记载看来，左右卫与左右骁卫一向配合防守，担当“左厢诸门之外事，右厢诸门之内事”者，必属左右卫无疑。另外，所谓“左厢诸门”、“右厢诸门”，大概截止于太极殿以北朱明门一线，此门以内则为内朝，为皇帝燕寝之地，担当防卫任务的应以宦官为主。

续表

名　称	仪　仗	宿　卫
左右领军卫	大朝会：被青甲铠，弓箭刀盾旗等，分为左右厢仪仗，次立威卫之下。 在正殿前：以诸队立于阶下。	长乐永安门外：挟门队列东西廊下。 分兵主守：知皇城西面助铺及京城、苑城诸门。
左右金吾卫	坐朝日：引驾次飞六十六人引驾升殿，金吾大将军各一人押之。 车驾出人：先驱后殿，余依卤簿之法。 巡狩师田：知左右营卫之禁，南衙宿卫官将军以下及千牛番上者，皆配以职。	内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阁外。 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
左右监门	掌宫殿门及城门门籍之法。 行幸：依卤簿法，率其属于牙门之下。	
左右千牛卫	受朝之日：领备身左右升殿而侍列于御座之左右。 亲射于射宫：率其属以从。	

贞观十年的改制标志着唐初军队国家化的最终完成和府兵制的完备，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都被规范入南衙十六卫之中。番上宿卫的府兵力量强大，组织完备，分工明确，可以包揽长安的全部防务。

但是，问题出在此前已经长期存在的北门屯营。如前所述，北门屯营在玄武门之变后地位提升，由西府功臣担任统帅，士兵也经过相应的调整，遂由武德年间各种力量结集的北门驻军演变成为唐太宗的亲兵。贞观十年改制后，南衙宿卫制度充分完备，这支特殊的军队何去何从，便摆在统治者面前。

唐太宗决定保留这支军队，并将其改造为南衙军防体系之

外、以保护皇帝个人安全为旨归的又一支武装力量。其措施便是建立拥有独立建制的北门屯营。贞观十二年（638），“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①] 我们知道，屯营自武德以来一直存在，为士兵上番屯聚之处。贞观十二年屯营称为“始置”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和屯卫拉大距离，二是确立这支军队募兵的原则。先看第一点。贞观十二年以前，屯卫将军例领屯营；十二年后，虽然仍有以屯卫将军统领屯营的情况，但其他诸卫将军也加入到兼领屯营的行列中来[②]，这样，屯营和屯卫的关系就由原来的“直属”变为“文属”，独立性大大提高，屯营的指挥也就开始摆脱南衙的影响而归于皇帝。再看第二点。原来的北门屯营士兵来源复杂，有原来的秦府兵，也有从南衙诸卫中选拔的长上者，彼此身份并不一致。而新的屯营飞骑则全部由招募而来（说见下文）。这两种转变使得北门屯营成为完全不同于府兵的特殊军事力量，真正意义上的北衙禁军从此诞生了。

2. 贞观十二年后屯营的基本形态

高祖时期的北门屯营是骠骑府（后来的折冲府）级军事单位，兵力大约在1000人左右。玄武门之变后，屯营分为左、右两营，兵力增强，级别也有所提高。贞观十二年后屯营由百骑和飞骑两部分构成，其中百骑力量较弱，仅作为皇帝随从，所谓“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着画兽文衫。”[③] 飞骑是屯营的主力，负责宿卫仗内并随从出行。已知的下级军官如冯师训，贞观十三年（639）起家应材官之选，释褐拜左屯营飞骑队正，累迁飞骑校尉[④]。队正、旅帅、校尉都是南

①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1页。
② 从表四可以看出，即使是屯卫将军押领屯营，也要加“检校”二字。
③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2页。
④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5页。

衙十二卫中郎将府的军将名称，而被屯营所采纳，说明屯营比照内府对待，其基层组织与十二卫内府大体相当，有团、旅、队的建制。但是，屯营长官却以诸卫将军或大将军充任，明显高于内府，凸显出屯营较高的政治地位。

贞观年间可考的屯营将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四

时　间	姓名	职　衔	出　身	出　处
贞观元年至七年(627—633)	周孝范	左屯卫大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	西府功臣	周孝范碑
贞观元年至二十年(627—646)	张士贵	右屯卫大将军北门上下	西府功臣	补遗1—40
贞观初至龙朔三年(?—663)	张延师	左卫大将军典羽林兵	宗亲	旧83,2776页
贞观七年至仪凤二年(633—677)	契苾何力	左领军将军检校屯营事	姻亲、蕃将	旧109,3291页
贞观十至十九年(636—645)	阿史那社尔	左骑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左屯营	姻亲、蕃将	旧109,3288页
贞观十二至十八年(638—644)	姜行本	左屯卫将军押飞骑	幸臣	旧59,2333
贞观十七至永徽六年(643—655)	程知节	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	西府功臣,姻亲	补遗2—203
贞观十九至永徽四年(645—653)	郑广	检校右领军将军押左飞骑仗	西府功臣	补遗2—192
贞观二十至二十一年(646—647)	李思摩	右武卫大将军检校屯营	蕃将	补遗3—338

从以上所列将领的出身可以看出，他们都与太宗有着很近密的私人关系，其中又分为西府功臣、亲党和蕃将三种情况。有些将领且身兼两种关系。如程知节，本唐太宗西府功臣；另外，程知节子处亮尚太宗女清河公主，双方又成姻亲。

值得提出的是蕃将在屯营将领中占很大比重。蕃将在种落携离或破国亡家的情况下归附唐朝，他们留部落于边州而只身入朝，在朝廷之中并无奥援，对皇帝的依赖性转较一般武臣为高。如阿史那社尔，本突厥酋长，率众降唐后，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本人则留在长安，典领屯营。其他蕃将如契苾何力、李思摩也是如此。史载唐太宗坚信契苾何力“心如铁石，必不背我”，基本可以看作统治者对宿卫蕃将的整体评价。唐太宗还以通婚来加强和蕃将的联系，如阿史那社尔尚衡阳公主，契苾何力尚临洮县主。

屯营士兵由招募而来。其中，飞骑选取的标准是：取户二（疑为“六”之误，即中等以上户）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而百骑的来源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在飞骑中“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鞬，为游幸翊卫”[①]，即从飞骑中选拔；另一说则谓择官户番口为之[②]。其实，百骑作为皇帝的亲随，可能出身并不重要，因而这两种来源或许兼而有之。唐朝的户等分为九等，六等则为中户，飞骑的选取方式与西魏府兵初置之时“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③] 的原则颇为一致。府兵初设时是统治者的亲兵，均由富室强丁充任，以扩大统治基础。

---

①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1页。

②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2页。

③ 《玉海》卷一三八，第2569页。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2页，中华书局，1963年。

屯营飞骑的这种选取标准无疑体现了同一原则。

贞观十二年以后的屯营中当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士兵继承自原来的屯营，但是，继承的部分也必然经过了类似标准的筛选，这就使得屯营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唐太宗对于这支亲兵厚爱有加，致力于提高其文化和军事素质："（贞观十四年）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① 在提高飞骑文化素质的同时，太宗又令吕才作《教飞骑战阵图》，训练其作战技能②。

贞观时期的屯营主要承担北门宿卫和仪仗。屯营驻扎在玄武门外，玄武门内外的宿卫和仪仗便成为其最主要的职责。如周孝范在玄武门政变后迁太子右内率，检校北门诸仗；贞观元年授右屯卫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后又领玄武门内左右侧仗。

在君主出幸离宫别馆时，屯营也随同宿卫。如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庚午，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统飞骑劲兵从皇太子先还京，宿卫于延明门外③，可见此前飞骑一直跟随唐太宗在翠微宫。同样，以飞骑劲旅随从皇太子还京继位也清晰地显示出这支军队作为皇帝亲兵的特性。

其次是游幸侍从。唐代府兵制度完备，征调程序复杂。相应地，它所留下的自由空间便很小，不能满足君主制度外的需要。这样，唐太宗在府兵体系之外创设的飞骑便具有了非常强烈的侍从游幸功能。这一点在《旧唐书》卷五九《姜謩传》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太宗选骁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直屯营以充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53页。有关研究参严耀中《论唐前期的军府学官》，《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4—81页。

②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第2726页。

③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参见《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程知节墓志》，第203页。

仗内宿卫，名为‘飞骑’，每游幸，即骑以从。分隶于行本。”与之相应，统领这支军队的姜行本也被目为幸臣。

再次是执行一些君主个人的杂务。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取经归国，至凉州，太宗即手诏飞骑迎之[①]。由皇帝亲兵飞骑迎劳代表着皇帝个人的态度，体现的是对被迎者的私人感情，因而也是君主优礼臣下的表现形式之一。

飞骑还被作为皇帝的私人信使。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太子因请飞骑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②]。太子递表起居属于皇帝家事，因而由私兵飞骑来传递。

在特殊情况下，屯营飞骑和南衙诸卫一样，不仅有宿卫职责，还要参与征行。总的说来，如果君主亲征，则飞骑必然随行；即使并非君主亲征，飞骑也有可能作为皇帝派出的精锐部队协同作战。属于前者的如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阿史那社尔为右军大将军检校北门左屯营，“领屯卫飞骑及长上宿卫之兵奋不顾命，所向无前，……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③] 太宗从高丽还，从飞骑三千驰入临渝关[④]。在这种情况下，飞骑行使的主要是护卫皇帝的职责。后者如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薛延陀攻李思摩十部，兵部尚书李勣等出兵经略，右屯卫将军姜行本率左右飞骑及左右卫引强者数千人受李勣节度[⑤]。贞观十七年，齐王祐作乱，左右绐王曰：“英公统飞骑已登城矣。”[⑥] 虽是

---

① 《金石文考略》卷八。

② 《太平御览》卷一一〇《帝王部》三五，第528页。

③ 《册府元龟》卷三九六，第4698页。阿史那社尔征高丽时的官衔，《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作左骑卫大将军，终官为右卫大将军，此处右军大将军大概是右卫之误，以其终官称之。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条，第6231页。

⑤ 《册府元龟》卷一二五，第1501—1502页。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七年三月条，第6188页。

欺人之语，但必有当时的惯例作为基础。以飞骑来威慑敌人，反映出当时飞骑之骁勇善战。这时的飞骑，则具有君主派出武装的性质，显示出君主对于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视。

综上可知，北衙屯营是伴随着唐初军队国家化以及府兵制重建的进程而建立的。唐初仅仅作为地理概念的北门屯营到贞观十二年后演变为皇帝的私亲兵。在这一过程中，玄武门之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变后，秦府兵将进入北门屯营系统，使这支军队地位提高，并具备了亲兵色彩。另一方面，贞观十年府兵制的完备限制了它的适应度，君主需要在制度之外创建一种更为灵活、能够满足私人军事、娱乐需要的亲兵，这两种因素导致了贞观十二年屯营的建立。屯营飞骑的出现是北门禁军向独立化迈进的第一步，它本身就意味着对府兵制的突破。

第二章　羽林军——高宗朝到玄宗朝的变化

第一节　羽林军的诞生和职官系统的建立

有关羽林军的成立时间，现存史籍有三种记载。

一种记载谓在高宗显庆五年（660）前，如《唐会要》卷二六《讲武》：

> （显庆）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讲武于并州城北。……左卫大将军张延师为左军，左右、骁、武等六卫，左羽林骑士属焉。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为右军，领威、武、候等六卫，右羽林骑士属焉[①]。

既然有左右羽林骑士之称，似乎羽林军在此之前已经成立。这条记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屯卫改为威卫的时间。前引《唐会要》中不仅出现了羽林，还出现了威卫。唐代威卫由屯卫改名而成，改名的时间在龙朔二年（662），对此，学界并无异说。而这条记载谓在显庆五年已有威卫，与其他文献不符。二是显庆五年以后其他文献中还有关于北衙屯营的记载。据《资治通鉴》卷二

---

① 此事又见于《册府元龟》卷一二四《帝王部·讲武》，其中“城北”作“城西”，第1484—1485页；《通典》卷七六《军礼一》：“领威武候等六卫”作“左右威领武候等六卫”，当为文字讹误；《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也有关于显庆五年三月高宗讲武于并州的记载。

〇〇，龙朔元年（661）三月条，高宗宴群臣及外夷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屯营有教舞之举，应该是指北衙屯营。据此我们认为，显庆五年观羽林军讲武的记载有套用后期名称的嫌疑，不足为据。

另一种记载谓在龙朔二年（662），如《唐六典》卷二五《左右羽林军》："龙朔二年改为左右羽林军。"《通典》卷二八《左右威卫》："龙朔二年，改左右屯卫为左右威卫，而别置左右屯营，亦有大将军等官。"小字云："寻改左右屯营为羽林。"《新唐书》卷五〇《兵志》："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

还有一说谓在武后垂拱元年（685），见《唐会要》卷七二《京内诸军》："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军，领羽林郎六千人。"

对于这后两种说法，唐长孺、宁志新、张国刚等先生已有考辨，均谓以龙朔二年为是[①]。笔者完全同意诸位先生的意见，问题是高宗为什么要在龙朔二年设立羽林军。

据前引《通典》可知，屯营改为左右羽林军是伴随着屯卫改名为威卫进行的。事实上，龙朔二年改名涉及绝大部分中央官署。《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称："二月甲子，改京诸司及百官名：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左右仆射为左右匡政，左右丞为肃机，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自余各以义训改之。又改六宫内职名。"而据《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三，第90—91页；宁志新：《唐代羽林军初探》，《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第88—94页。张国刚认为羽林军创立于龙朔二年，垂拱元年则是取消以诸卫将军检校羽林军的制度，建立了羽林将军、大将军等职名。（《唐代北衙六军述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43—156页。）我们同意他关于羽林军创立时间的考证，但羽林军职官系统的建立并非在垂拱元年，而是要到武周天授二年，详见下文。

高宗龙朔二年二月条，同时改名的还有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

龙朔二年改百官名是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变革出现的。其所涉及的并非只是名称上的调整，而是还有内在政治结构的变化。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枢体制的变化。从隋朝开始，三省六部制逐渐确立。其中，中书门下二省为决策部门，而尚书省为行政执行部门。但是，直到唐初，尚书省仍具有宰相机构的色彩。从贞观中期开始，三省职权逐渐调整，到高宗龙朔二年二月，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左右仆射为左右匡政。这样，中书省正式成为出令机构；门下省负责审议，二省长官同为宰相；而尚书省单纯负责执行，尚书省的二十四司从名字到实质都成为各司其职的职能部门，不再作为宰相机构存在[①]。三省制的变化是唐代制度史上的重大问题，但本文的重点却并不在此，我们只是想考虑龙朔二年调整的内在原因，及其对唐朝军事防御结构可能发生的影响。

唐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贞观中，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权，双双被废，李治不次立为太子。但是，太宗对于年轻、懦弱的李治并不信任，屡欲废之，赖其母舅长孙无忌多方保护，方得幸免。长孙无忌保护高宗自有其个人目的，那便是利用自己母舅和顾命大臣的双重身份来控制李治，从而长保权位[②]。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遗诏以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遂使永徽年间（650—655），诸项政策一仍贞观。

---

① 有关制度转变，参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郭锋《唐尚书都省简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罗永生《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参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原载《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3期，收入《文史探微》，第203—219页，中华书局，2000年。

然而，高宗并不情愿接受大臣的监控，从永徽末年开始，以废王立武为引线，高宗开始集中清理高级官僚队伍，逼元老大臣下台。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显庆四年（659）长孙无忌自杀，其党羽被大量贬逐为止。对于这场斗争，陈寅恪先生将其提高到“关中本位政策”开始消解的高度来认识，即由宇文泰创立、经周、隋乃至唐初不变的君臣俱出自关陇集团、代表同一集团利益的统治方式至此开始动摇，而渐由一种更加全国化的统治结构取代①。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概念及其存在时间，学术界一直有不同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永年先生即利用主要官员籍贯的统计数字，提出关陇集团从隋代已经开始解体，到唐初即不复存在②。

笔者认为，“关中本位政策”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权提出并执行的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政策，必然随着统治的全国化而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很长，中间也存在反复曲折。具体说来，就是隋炀帝对这一政策过于急进的改造导致了隋政权的瓦解，继起的李唐王朝初年又有所收缩。到高宗时代，皇帝与元老大臣的矛盾以及元老大臣被贬逐的结局沉重打击了关陇集团势力，从而在客观上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场斗争引起的一个后果是，此后任职中枢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以顺旨起家，不具备元老大臣的威望，与高宗的距离拉大。同时，废王立武事件也使高宗和大臣之间产生了深深的裂痕，太宗朝君臣一体的感觉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关陇贵族政治的解体，一方面，皇帝的权威加强，皇帝个人决策对国家事务影响程度加深；另一方面，

---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8—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 黄永年：《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原载《学术集林》卷九，1996年12月；收入作者《文史探微》，第154—168页；《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原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收入《文史探微》，第169—182页。

皇帝家事与国事在制度上更加分开。以此为背景来看待中枢机构的调整，就是尚书省被逐出中朝范围，成为单纯的外廷；而中书和门下作为稳定的中朝势力，和皇帝的关系也在疏远之中；在这些系统之外，高宗组成了被称为“北门学士”的秘书班子，在内廷参与决策①。

中国帝制时代号称家国一体，但是，秦汉以降，随着统治职能的复杂化，负责处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廷机构和负责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外廷机构在总的趋势上却是逐渐分开。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大怒，责问房玄龄等道：“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②永徽六年（655），高宗问李勣是否应该顺从大臣们的意见而放弃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打算，李勣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③ 垂拱二年（686）四月，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到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怀义偃蹇不为礼，苏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④

显然，无论对于皇帝还是大臣，国事和家事、公和私的分别与专责都已经成为共识。在这种进一步明确划分内朝与外朝，区别皇帝的公与私的背景下，皇帝私兵的地位便凸显出来，由原来作为游幸侍从的制度外亲兵开始上升，在形式上向正规军队建制

---

① 北门学士之设，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元二年四月条。关于北门学士，传统史家大多注意他们和武后之间的关系，但是，北门学士出现在上元二年(675)，其时高宗在位，武后并未控制朝政。《旧唐书》卷一九〇《元万顷传》云：“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可见虽有武后的推动，决定起用北门学士的仍是高宗。参刘健明《论北门学士》，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 617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 6292 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 6441 页。

发展。这样，在龙朔二年（662），借助改百官名的机缘，屯营先是脱离屯卫，随即升格为左右羽林军。

有关羽林军的构成情况，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雷家骥先生在其《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一书中称：北衙禁军由羽林兵、飞骑、百骑（千骑、万骑）三部分构成，而总统于羽林军（卫），羽林卫的直属部队为羽林兵，而对于飞骑、百骑（千骑、万骑）则仅有相对的督摄权；张国刚先生则认为羽林兵并不存在，羽林军（卫）所统部队为飞骑，百骑系统则具有相对独立性[①]。笔者同意后一种看法。首先，羽林军是由原来的北门屯营发展而来，而飞骑正是屯营士兵的称号，因而，羽林军所辖士兵，应与飞骑有直接的承袭关系。其次，《唐六典》等文献所记羽林将军的职掌，对于飞骑的管理记载特详，而无一语及于对所谓羽林兵的管理方式。再次，《唐会要》卷七十二军杂录门载玄宗开元十三年敕云："四军枪矟，左飞骑用绿纷，右飞骑绯纷，左万骑红纷，右万骑碧纷"。可见，当时禁卫四军只有左右飞骑、左右万骑（由百骑发展而来），而不存在单独的左右羽林兵。又《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尚乘奉御直长职掌条云："仗外有左飞、右飞，左万、右万等四闲"，这四闲马从名称看来，也是为禁军的两个系统——飞骑和万骑配置。最后，在历次涉及羽林军的军事行动中，真正出场的只有飞骑和百骑系统。如《资治通鉴》则天后光宅元年（684）条记载，武后令检校左右羽林军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废黜中宗，参与此事的十余名飞骑因有不满情绪被杀，可见程务挺等人带的正是飞骑兵。又中宗神龙三年重俊政变中动用的兵力为"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中宗闻变后，迅速召集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玄武门楼下列守。既云"留军飞骑"，则知重俊等人率领的所谓羽林兵其

① 《唐代北衙六军述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43—156页。

实也就是飞骑。玄宗朝“安史之乱”爆发后，飞骑由高仙芝等人率领走上战场，后来随玄宗入蜀的则只有龙武军（原万骑）。由此可见，所谓羽林兵并不存在，羽林军统摄的力量只有飞骑和百骑两个系统。

羽林军独立建制后，相应的官署并未立即随之建立。在一段时间之内，羽林军长官依然由南衙诸卫的将军兼领。如《唐大诏令集》卷六二所载，龙朔二年二月三日《册张延师左卫大将军文》称：“唯尔左卫大将军检校羽林军上柱国张延师”，就是以左卫大将军检校羽林军。又据杨炯《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崔献，乾封二年（667）曾以右武卫中郎将检校左羽林军，总章二年（669），又守左武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军，仪凤四年（679），正任左武卫将军，仍检校右羽林军[①]；李孝同，咸亨元年（670）以右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军[②]；程务挺，“［永淳二年（683）］又以功拜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③] 和敬君弘被称为屯营将军一样，这些将领有时也直接被称为羽林将军。如乾封二年，高丽首领泉男生入朝，有诏所过州县传舍作鼓吹，右羽林将军李同以飞骑仗廷宠[④]。这里的右羽林将军李同即李孝同，以右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军。

羽林军所属飞骑营的长官也由南衙将领检校。如冯师训，原为左武候辅贤府左果毅，麟德二年（665），擢拜右骁卫郎将，令北门侍奉，押左营飞骑[⑤]。张仁楚，仪凤元年（676）授右卫定功府左果毅都尉，永昌元年（689）授左金吾卫函谷府长上折冲，

① 《全唐文》卷一九六，第1988—1990页。
② 《金石萃编》卷五七。
③ 《旧唐书》卷八三，《程务挺传》，第2785页。
④ 《新唐书》卷一一〇《泉男生传》，第4124页。
⑤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5—8页。

押左羽林军飞骑上下[①]。从上述两例看来，检校飞骑营的将领基本都处于南衙诸卫折冲（郎将）一级，与武德时代北门屯营的级别相似。

由于政局不稳，羽林禁军系统在武则天一朝迅速发展。武周天授二年（691）二月，左右羽林军更名为左右羽林卫，并建立了自己的职官系统[②]。羽林卫有大将军各一员，正三品，将军各二员，从三品（其中一员为大足年间增设）。又有左右翊府中郎将各一人，左郎将一人，右郎将一人，分别为正四品、从四品。此外，羽林军佐官有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曹参军事，品秩同于诸卫。有司阶、中候、司戈、执戟所谓四色官，品秩、人数同千牛卫[③]。这一职官系统与南衙十二卫内府极为相似。武周朝羽林军职官系统的构建使之取得了与南衙十二卫相同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标志着羽林军飞骑系统在唐前期发展的完成。

天授二年羽林军升格为羽林卫显然与此前一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密切相关。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和外廷之间一直关系紧张。为树立威信，她大开罗织之门，残酷清洗李唐宗室，大量诛杀宰相

---

①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382—383页。

②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第1291页。张国刚先生认为，羽林军职官系统建立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685），见前引《唐代北衙六军述略》。其依据在于《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所载“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军，领羽林郎六千人。”这种说法尚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唐会要》此条强调的是“领羽林郎六千人”，并未提到建制问题；其次，两《唐书》的相关部分都记载了天授二年羽林军改为羽林卫，同时设立大将军、将军等职；第三，《旧唐书》卷八九，确有垂拱中（685—688）苏干担任右羽林大将军的记载，似乎当时羽林军已经有专职的大将军，但是，早在屯营时期，押领屯营的军官就经常被简称为屯营将军，苏干也不排除以其他职位检校羽林军，因而被简称为羽林大将军的可能。而天授二年以后，明确记载为羽林将军、大将军的人急剧增多，以它官检校羽林军虽然仍旧存在，但已经成为少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羽林军职官系统的建立是在天授二年，而非垂拱元年。

③ 《唐六典》卷二五，第642—644页。

和武将[①]。时置制狱于丽景门内，派御史推覆，造成“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的局面[②]，朝臣人人自危，君臣之间的距离空前拉大。在威慑外廷的同时，武则天加强了君主个人对朝政的控制，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也要经武则天批准[③]。与此同时，武则天也加强了内廷军事机构的建设：由宦官统领的内飞龙厩建立，成为新的仗内六闲之一，皇帝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由此大为增强。与此同时，作为皇帝私兵的羽林军也升格为卫，从而提高了建制级别。羽林卫建立官署和前述其他政策一样，都是皇权加强的产物，也都起到了打击异己势力、维护武周政权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羽林卫虽然有了自己的职官系统，但是和南衙诸卫的联系仍然非常密切。武周时代，以南衙将军检校羽林军的情况继续存在，甚至贞观年间一度存在的飞骑旅帅、队正也不见踪迹，而改由南衙武官押领。如王珙，圣历元年（698）以左玉钤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卫事[④]；公孙思观，从武后圣历二年（699）开始，以陕州河北府折冲都尉的身份在左羽林军宿卫并押飞骑上下[⑤]；另外，《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中提到的押飞骑营中郎将李释、子总管押飞骑定远将军平原府左果毅长上穆仙童、押飞骑左玉钤卫队正长上贾楚珪、押飞骑左监门卫司戈窦九皋都是以南衙武官的身份押领飞骑[⑥]。这种现象与

---

① 参见汪籛《武则天》，《汪籛隋唐史论稿》，第118—1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王涤武《武则天时代》，第213—33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先昌《关于武则天杀害文武大臣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第23—29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71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76页。

④ 《全唐文补遗》第四辑，第399页。

⑤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99页。

⑥ 《文苑英华》卷六四七，第3328—3331页。

武周一朝使职的发展以及府兵制开始解体，府兵军官向其他军事系统分流不无关系。

第二节　羽林军的基本形态

1. 羽林军的将领与士兵

高宗即位之初，禁军高级将领基本承袭太宗旧将。如左卫大将军检校屯营兵程知节和左卫大将军典羽林兵张延师，都是从太宗时代就开始典领禁军的元老重臣。但是，从永徽后期开始，随着中央政局改变与北衙禁军力量的加强，高宗也开始起用自己的亲信担任禁军将领。与太宗参用旧将、蕃将不同，高宗选任的禁军将领更向蕃将倾斜。这种差别反映出二人不同的即位背景。太宗是李唐王朝的缔造者之一，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亲信武将，这些人在他即位后成为北衙将领的重要来源。高宗则不然，他继位以前一直笼罩在太宗的光环之下，无从确立自己的军事亲信，征高丽所得降将以及其他投诚蕃将就以其孤立无党而为高宗所信用。高宗朝可考的十六位北衙将领中，有八位出身蕃将。

天授二年二月，左右羽林军升为左右羽林卫，设置官署，不再由南衙诸卫将军兼领。这一时期的羽林军将领人选中，武氏宗族占据了很大比重。天授中，武则天堂侄武攸宁担任左羽林大将军，此后，担任此职的还有武则天的另一个堂侄武攸宜。加强北衙禁军以及以本家担任禁军统帅这两种措施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保证了武周政权的稳定。

武则天晚年多病昏聩，宠信张易之兄弟，引起朝臣的普遍怨愤。长安（701—704）末年，随着武则天控制力的减弱，以张柬之为首的宰相将亲信杨元琰、敬晖、李湛、桓彦范等安插进羽林军。北衙将领受外廷控制，不再代表皇帝利益，最终导致了神龙

元年（705）政变的发生以及武周政权向李唐政权的回归。

武周末年羽林军将领与皇帝关系疏远导致宫廷政变，这个教训给了新即位的中宗很深的刺激。即位之初，他很快清除了由宰相控制的禁军将领。如李湛，政变前任右羽林卫将军，神龙政变后改为右羽林军大将军，但旋即转为左散骑常侍[①]。中宗一朝，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中宗为首包括武韦二姓联合掌政的局面[②]。这一时期上任的左右羽林大将军张知謇、左羽林大将军韦湑、右羽林大将军武攸宜分别是中宗、韦后和武则天的亲党[③]，鲜明地体现出联合政权的特征。中宗死后，韦后控制朝政，力图效法武则天，改朝换代。为此，她将禁军高级将领全部换成韦家宗族。分别以韦播、韦睿和侄婿高嵩担任羽林将军。这些变化，可以从表五所列高宗至睿宗朝的禁军将领中得到清楚的反映。

表五

时　间	姓名	职　衔	得官缘由	出　处④
贞观初至龙朔三年(633？—663)	张延师	左卫大将军典羽林兵	宗亲	旧卷83,2776页
贞观七年至仪凤二年(633—677)	契苾何力	左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	太宗旧臣,姻亲	旧卷109,3291页
贞观十七年至永徽六年(650—655)	程知节	左卫大将军检校屯营兵	太宗旧臣,姻亲	补遗2—203

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附李湛传》，第2771页。

② 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7卷，263—2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张知謇在任房州刺史时有恩于被贬往庐陵的唐中宗，故中宗即位后加以擢拔。见《旧唐书》卷一八五，《张知謇传》，第5844页；韦湑为韦皇后从父兄，见《新唐书》卷二〇六，《韦湑传》，第5844页；武攸宜为武则天从侄，见《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攸宜传》，第5839页。

④ 表中“汇编”指《唐代墓志汇编》，“英华”指《文苑英华》，以下诸表同。

续表

时　间	姓名	职　衔	得官缘由	出　处
贞观十八年(651)	斛斯政则	左屯卫永乐府折冲都尉统百骑	太宗旧臣	补遗 2—231
永徽六年(655)	豆卢承基	右卫将军检校右屯营	不详	万年宫铭碑阴①
永徽六年	权善才	左武侯将军检校左屯营	不详	同上
显庆中(656—661)	阿罗憾	右屯卫将军北门□领侍卫	蕃将	汇编景云 001
龙朔中至上元二年(661—675)	阿史那忠	左屯卫将军检校左屯营，左骁卫大将军检校羽林军	姻亲、蕃将	补遗 1—50 阿史那忠碑②
乾封二年至仪凤四年(667—679)	崔献	左武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军	军功	英华卷 971，5107 页
咸亨四年(668)前	李孝同	右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军	宗室	李孝同碑③ 新卷 110，4124
咸亨三年后约至光宅元年(667—684)	韦待价	右武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军	姻亲	旧卷 77，2671 页
总章元年至仪凤二年(668—677)	泉男生	右卫大将军兼检校羽林军	蕃将	补遗 1—61
上元中至神龙三年(674—707)	李多祚	右羽林卫大将军	军功、蕃将	旧卷 109，3295 新卷 110，4124
仪凤元年至垂拱三年(676—687)	黑齿常之	左武卫将军(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	蕃将	旧卷 109，3295 页
永隆二年至永淳二年(681—683)	李谨行	右卫员外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	蕃将	补遗 2—291

① 《金石萃编》卷五〇。
② 《金石萃编》卷五八。
③ 《金石萃编》卷五七。

续表

时　间	姓名	职　衔	得官缘由	出　处
永淳二年至嗣圣元年(683—684)	程务挺	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	军功	旧卷 83,2783 页
嗣圣元年(684)	张虔勖	右领军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	军功	旧卷 83,2785
光宅元年至天授二年(684—691)	泉献诚	左卫大将军右羽林卫上下	蕃将、禁军将领子	旧卷 199,5358 补遗 7—20
垂拱中(685—688)	宗晋卿	典羽林军	武后亲族	新卷 109,4103
垂拱中(685—688)	苏干	右羽林大将军	姻亲	旧卷 89,2882
永昌元年至如意元年(689—692)	张仁楚	左金吾卫函谷府长上折冲押左羽林军飞骑上下	武将提升	补遗 2—382
天授二年(691)	武攸宁	左羽林大将军	武后亲族	新卷 206,5840
神功元年(697)	苏宏晖	左羽林将军	不详	旧卷 6,126 页
神功元年至景龙中(697—710)	武攸宜	左羽林大将军	武后亲族	新卷 206,5839 页
圣历元年(698)	阎敬容	左羽林大将军	不详	通鉴卷 206,6533 页
圣历元年(698)	王珧	左玉钤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卫事	武将提拔	4—399
圣历二年至唐隆元年(699—710)	公孙思观	陕州河北府折冲都尉左羽林军宿卫押飞骑上下	武举及第提升	补遗 1—99

续表

时　间	姓名	职　衔	得官缘由	出　处
久视元年前(700)	马神威	鹰扬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卫将军	武将提拔	补遗5—256
久视元年前	柳秀诚	左羽林卫将军	不详	补遗5—254
长安元年(701)	相王	右羽林大将军	武后子	旧卷7,152页
长安中至神龙三年前(701—707)	杨执一	右卫中郎将押千骑使	武后外家	补遗1—114 旧卷62,2381
长安中(701—704)	裴思谅	右卫亲府中郎将检校左羽林卫	武将	全唐文卷242,2451页
长安中至神龙元年(705)	田归道	左金吾将军押千骑	武后亲信	新卷197,5624页
长安三年(703)	王元奖	左武威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卫事	武将提拔	补遗5—266
长安四年(704)	杨元琰	右羽林卫将军	宰相亲信	旧卷91,2928
长安四年	敬晖	右羽林卫将军	宰相亲信	旧卷91,2932
长安四年	李湛	左羽林卫将军	宰相亲信	旧卷91,2928
长安四年	桓彦范	左羽林卫将军	宰相亲信	旧卷91,2928
长安四年	武攸宜	右羽林卫大将军	武后亲族	通鉴卷207,6578页
神龙初(705—)	李湛	右羽林大将军	神龙功臣	旧卷82,2771
神龙初	韦濬	左羽林大将军	韦后亲族	新卷206,5844

续表

时　间	姓名	职　衔	得官缘由	出　处
神龙初	程伯献	右卫郎将知左羽林军事	神龙功臣	补遗3—65
神龙二年(706)	乙速孤行俨	右武卫大将军检校羽林军	蕃将	全唐文卷234，2364页
神龙三年(707)	刘景仁	右羽林大将军	不详	通鉴卷208，6611页
神龙三年	李思冲	右羽林将军	不详	旧卷86，2836
神龙三年	李承况	羽林将军	不详	旧卷86，2836
神龙三年	独孤祎之	羽林将军	蕃将	旧卷86，2836
神龙三年	沙吒忠义	右武威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卫	蕃将	全唐文卷242，2451页
神龙三年	野呼利	羽林中郎将	李多祚婿	通鉴卷208，6612页
景龙二年(708)	张知謇	左右羽林大将军	于中宗有恩	旧卷185，4810
景龙四年(710)	韦播	羽林将军	韦后亲族	新卷206，5844
景龙四年	韦睿	羽林将军	韦后亲族	新卷206，5844
景龙四年	高嵩	羽林将军	韦后亲族	新卷206，5844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高宗到中宗时代，最高统治者都力图以任用亲信担任禁军将领的方法来确保禁军的忠诚，统治者的变换也必然带来禁军将领的变化，从而使羽林将领的选任鲜明地体现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色。在两个对最高权力具有狂热兴趣而又很难取得合法权力的宫廷女性——武则天和韦皇后主宰朝政

时期，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政局不稳，武韦时代在选择将领时对于政治可靠性的要求居于压倒地位，来自于非军事系统的将领增多。然而，这些根据时局需要临时委任的高级将领大多没有军事经验，在禁军的时间很短，与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将领乃至普通士兵隔阂颇深。唐隆元年（710），韦皇后任用宗族韦播、韦睿以及侄婿高嵩担任禁军统帅。这些人年轻资浅，而且并无在禁军系统任职的经历，因此作为禁军中级将领的押万骑营果毅李仙凫、陈玄礼、葛福顺不为所用，转而归心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清除韦皇后一党，导致唐统由中宗向睿宗一系嬗替，正是这种隔阂的结果。

与高级将领偏重于考察政治倾向不同的是，武则天设武举后，羽林军低级武官多由武举选拔而来[①]。如赵洁："公去垂拱中（685—688）武举及第，制授左羽林卫长上。"袁仁爽："应制天阙，阅武王庭。擢为上第，拜左羽卫长上。"董虔运："初应武举擢第，授右羽林军押飞骑引驾。"[②] 武举考试的项目和标准，根据高明士先生的研究，是以飞骑考试制度为蓝本创立的。它在武功方面略低于贞观十二年后飞骑的选拔标准，但偏重于统帅才能，且取消了贞观朝飞骑选拔的户等标准，这无疑与社会风气由

---

① 武举之设，《唐会要》卷五九兵部侍郎条、《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二年正月条均谓在长安二年，《旧唐书》卷四三《礼仪志》谓在长安三年。而《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二年条云："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以骑射及翘关、负米。"这一记载虽然被放在总章二年年末，但以"大略唐之选法"开头，表明是对唐代选举制度的概括，并不能据此认为武举在总章二年已经存在。今据《赵洁墓志》，志主在垂拱中已经武举及第，则武举之设立应当早于长安二年，但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刘琴丽《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称"武贡举创立于唐武周长安二年，……这在史学界已经没有异议"（《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91—100页），不知是否注意到这条墓志材料。

② 分别见《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41页；《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531页；《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397页。

尚武向尚文转变所带来的军人身份降低有关[①]。

羽林飞骑作为羽林军系统的第三个层次和低级将官一样，仍由招募而来，以武功作为选择的主要标准。如杨会："幼有奇表，长苞众艺，……以神功元年（697）九月十四日，授左羽林飞骑。"冯思顺："干能弧矢，艺绝武材。以开元二载（714）补右羽林军平射飞骑。"[②] 据《唐六典》卷五兵部员外郎条，平射是贡举的内容之一，"谓善能令矢发平直、十发五中、五居其次为上第，三中，七居其次为下第。"平射飞骑不知是否与贡举有关，但是，兵部贡举上第者，"前资见任见选，听减一次上，与官；勋散卫官、五品以上子孙，帖仗二年而选。次第者，其应选则据资优与处分，应帖仗，则三年而选。庶人之上第，亦帖仗，其年比次第；庶人次第，又加二年。"则除前资、现任、现选官外，都要经过帖仗的程序。所谓帖仗，应指以其他身份进入仪仗序列。北衙禁军从开始创建便有自己的仪仗队伍，高宗以后，随着北衙禁军体制的进一步完备，羽林仗也更加制度化。在这种情况下，贡举及第者通过帖仗的形式进入羽林系统也并非没有可能。

高宗朝羽林飞骑选拔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府兵出身者开始加入进来，并逐渐占据愈来愈大的比重。

《新唐书·兵志》称："龙朔二年（662），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这条记载明确标明了羽林军中的府兵成分。唐长孺先生对此持否定意见，理由是，《通典》卷二八《左右羽林军》云："龙朔二年（662），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则当

---

① 参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16—1069页，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② 分别见《全唐文补遗》第五辑，《杨会墓志》，第361页；《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冯思顺墓志》，第397页。

时羽林军所领兵士即为屯营之旧，并非取之府兵也。另外，先天二年（713）诏云“自今后，羽林飞骑并于卫士中简补”[①]，则“是年之先飞骑不自卫中选取”[②]。

对于这一考辨，宁志新先生提出了相反看法。他认为，《通典》所云仅仅表述了羽林军的渊源，并未涉及羽林军的成分，左右羽林军虽然主要成分来自屯营，但并不排除吸收新成分的可能。另外，先天二年诏书中所说的“羽林飞骑并于卫士中简补”应该理解为是年之后飞骑全部来自府兵，则在此之前，飞骑已经部分地从府兵中选取了[③]。笔者基本同意宁志新先生的看法。那么，依据《新唐书·兵志》的记载，龙朔二年就应该看作府兵大规模进入羽林军的开始。龙朔二年后，以府兵补充飞骑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除前面所引先天二年正月诏外，类似的规定还有《新唐书》卷五〇《兵志》所载开元十二年（724），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此处牵涉到对“京旁州府士”的理解问题。“士”作为男子的通称，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府兵。但是，联系开元十二年府兵制瓦解，其宿卫职责被招募而来的“长从宿卫”取代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诏令中的“士”更多的是指府兵（通常被称为“卫士”），颁行此诏书也正是唐廷解决府兵出路问题的办法之一。这样，经过从龙朔到开元数十年的发展，府兵逐渐成为羽林飞骑的主要来源。

事实上，府兵进入羽林军系统可能还要早于高宗朝。我们可以从现存石刻史料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马神威，“初以翊卫，

①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第1292页。
②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83—85页。
③ 《唐代羽林军初探》，第88—94页。

简充羽林飞骑，从班例也。”① 马神威卒于久视元年（700），寿79岁。如果他在20—30岁之间以内府翊卫的身份进入羽林系统，则仍在唐太宗贞观后期，尚早于唐高宗发布以府兵补充羽林军诏书的年代。另外，志称从班例，则表明这种转化在当时已成惯例，那么这种制度的起源也许就在羽林军初创之际，当时，一部分骁勇善战的内府兵首先被纳入这一新成立的亲军系统。以后，随着北衙禁军的不断发展与唐朝军事体制的调整，外府兵也逐渐成为羽林军的来源。

当然，即使在先天二年以后，府兵也并非飞骑的唯一来源，统治者不断选拔一般民户中的骁勇之士以充禁军。开元二年（714），吐蕃侵扰渭源，玄宗欲亲征，敕曰：“戎狄凭陵，每劳征戍。……今欲亲按边疆，躬行吊伐，宜令朝廷招募勇夫壮士拔萃逸群者，称为屯卫飞骑，且各量与赐帛，行回之日，简入羽林。”② 屯卫飞骑是羽林飞骑的早期形式，在这里则成为一种临时性称号，有可能将其编为独立组织投入战争。战争结束后，他们将作为经过考验的骁勇之士正式进入羽林军系统。开元二十四年（736）六月，郑县尉李詹被任命为“简募飞骑使判官”，向陕虢州点覆③，他所拣点的应该也是普通民户。天宝五载（746）三月十八日敕：“应募飞骑，请委郡县长官，先取长六尺，不足，即选取五尺九寸已上，灼然阔壮，膂力过人者申送。”④ 再次贯彻了简选骁勇的原则。

从飞骑和百骑的称号可以看出，羽林军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是骑兵。北衙骑兵的军事优势与唐朝马政紧密相连。贞观十八年，

---

① 《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256页。
②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第1407页。
③ 《金石萃编》卷七九，《李憕华岳题名》。
④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第1293页。

永乐府折冲都尉斛斯政则奉敕统百骑，此后累迁至左监门将军。此人同时检校骑骥厩，兼知陇右十四监等牧马事。仍统十闲之众。由此可知在太宗时期，北衙禁军已经和内外马厩相互配合，共同发展。此后直至玄宗朝，禁军与禁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在当时的各种攻防战斗中，发挥着巨大的优势。这是以步射诸兵为基础的南衙诸卫所难以比拟的。

2. 羽林军的兵额与待遇

对于贞观年间的屯营兵力，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唯一相关的数据是贞观十九年（645），太宗统飞骑三千人临渝关。这三千应当不是飞骑的全部。如果再加上留守太极宫的飞骑，总人数可能在五千以上。

有关羽林军人数最早的记载是《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条："垂拱元年（685）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军，领羽林郎六千人。"前面我们说过，羽林军之置当在高宗龙朔二年，《会要》这条记载存在时间上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许可以把《会要》对这六千羽林郎的记载理解为"增领"，即羽林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光宅元年（684）徐敬业起兵，给武则天造成相当大的震动。次年为加强中央防卫能力，扩大羽林军规模，增领六千人不无可能。睿宗景云元年（710）八月，受唐隆政变后禁军势力膨胀的影响，飞骑兵额再度增加[①]。到天宝七载（748）七月二十日，左右羽林军飞骑请准后加数，通旧一万五千人为定额[②]。对于这一万五千的兵额，李锦绣先生认为包括纳资代役者在内[③]。但是，如果前述垂拱元年增兵之推测成立，再加上景云元年所增兵额，那么天宝时期兵额达到一万五千

① 《册府元龟》卷四五，第512页。
②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第1293页。
③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三册，第1184—1186页。

也并不为过。

羽林飞骑分番服役，天宝年间实行六番制。按总数一万五千人记，每番有二千五百人当上，番期两个月。番上飞骑见于史实者如《大唐新语》卷四云："权善才高宗朝为将军。……有飞骑犯法，善才绳之。飞骑因番请见，先涕泣不自胜，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①]《太平广记》也记载了类似情况："京城东南五十里曰孝义坊，坊之西原常有怪。开元二十九年……有飞骑者番满南归。"[②] 但飞骑也和府兵一样，有长上者。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云："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③]所谓长番即是长上。此诗作于宝应元年，但它所反映的飞骑长上制度，应该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存在。考虑到这两种情况，则日常在京师宿卫的飞骑数量至少不会少于太宗时期随侍飞骑的数字，即三千员以上。

作为天子亲兵，羽林军受到若干优待，这使其在待遇上明显高于南衙府兵。

首先是家庭免于差科。《册府元龟》卷八六："（天宝六载）正月戊子，有事于南郊，礼毕，下制曰：'征行之家，每令存恤，差科之际，或未优矜。自今以后，并准飞骑例蠲免。'"据此可知飞骑之家的差科在此之前已经免除，而后才以加恩的形式推广到所有的征行之家。

其次，羽林飞骑本人也享受优待，其身份地位则大体类似于十六卫中郎将府卫官，二者在敕书中常处于同一等级。现将"安

① 许德楠、李鼎霞点校本，第56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② 《太平广记》卷三六一《牛成》，第2869页。
③ 《全唐诗》卷二一九，第2311页。

史之乱”前有关敕书内容列表如下：

表六

时　间	内　　容	出　　处
神龙元年（705）	正月当番三卫、监门等于武成衙内明福门外南衙及诸门者赐物十段。左右羽林及东宫北门厨供膳及匠准例各赐物十段。正月量追三卫细引、监门细引、直长，飞骑、杂技飞骑各赐物十段。	《唐大诏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
开元六年（718）	三卫、飞骑、万骑并仗内无品人等赐五段。	同上卷七五《亲谒太庙锡赐宗支庶官制》
开元十一年（723）	三卫、监门、黄衣长上、飞骑、万骑并仗内杂色人在斋宫宿卫……亦赐勋一转。	同上卷六八《开元十一年南郊赦》
开元十三年（725）	三卫、引驾、细引、黄衣长上、飞骑、骧骑先有武散官者加两阶，未给武散官者各赐勋两转。	《全唐文》卷二八七《东封赦书》
开元二十年（732）	南北衙行从三卫、飞骑、万骑、引驾、细引及监门直长、主帅、黄衣长上，各赐勋两转。	同上卷二八七《后土赦书》
开元二十一年(733)	三卫、细引、飞骑、万骑、监门长上及礼生有职掌者，各减一年劳。	同上卷二八三《敕皇太子纳妃》
开元二十六年(738)	今月番见上飞骑、万骑、监门直长、三卫引驾、细引、执扇、黄衣长上等各赐勋一转。	《唐大诏令集》卷二九《开元二十六年册皇太子赦》

从上表可知，在敕书中经常与飞骑、万骑并列的包括三卫、引驾、细引、黄衣长上、监门细引、监门直长、监门长上、主帅等。

三卫包括左右卫亲卫、勋卫、翊卫，太子左右率府亲勋翊卫

及诸卫之翊卫，在唐朝是一种身份性的职事，皆取五品以上子、孙和勋官上柱国、柱国子充。其中，亲卫为正七品上阶，勋卫、太子亲卫为从七品上阶，翊卫、太子勋卫为正八品上阶，太子翊卫为从八品上阶。

引驾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左右引驾三卫六十人，以左右卫三卫年长强直能纠劾者为之，分五番；另一种是金吾卫引驾佽飞六十六人，以佽飞越骑、步射为之，分六番[①]。二者都由金吾大将军统领。细引则是东宫的引驾，太子左右内率、左右司御率有细引。据《唐六典》卷二八《太子左右司御率》："凡仗卫之出入，置细引以导之，兼为之纠正。"注曰："凡五十人，用左右率之亲勋翊卫为之。分为五番，每番有主帅及中郎或左右郎将一人领焉。"此外，左右内率亦有细引仗，略同于金吾引驾佽飞。

黄衣长上的身份史籍无考，唯《册府元龟》卷一五二记载了开元中有关黄衣长上的一件刑事案件："（开元）十一年，帝谓宰臣曰：'昨闻万年县界崇仁坊有黄衣长上斫杀人，不见州县奏来，是何道理?'时左金吾卫黄衣长上杨骆持刀人乌那昇家，伤昇妻女，仅而免死，有司惧罪，将掩之。"由此可以推知其属于金吾卫，但出身、执掌、身份地位等情况均无考。

监门长上、监门直长都是左右监门卫的卫官。监门长上分长人长上和直长长上两种。其中长人长上二十人，直长长上各二十人。监门直长各六百八十人。

卫官中的主帅，据吴宗国先生考证，指校尉、旅帅、队正和队副[②]。品级由正六品上到从八品上。

---

① 《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上，第428页。

② 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第148—1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三卫）若有才用，考内得补主帅及监门校尉、直长。凡左右卫、左右率府三卫经三考以上者，得补引驾、细引，考满检视如三卫。"从选补情况看来，主帅及监门校尉、直长的地位高于引驾、细引，而引驾、细引又高于三卫。但是，据上述敕书，这些身份的人又常常被置于同一级别进行赏赐。显然他们之间有某些共通之处，可以相提并论。这种共通之处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他们都有一定品级；其二，他们的职务都比较接近皇帝，是皇帝的亲随近侍。羽林军能和这些身份的人员并列，应该也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羽林飞骑（包括百骑系统）在唐代属于有出身人，享受由身份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特权。前引《马神威墓志》，志主由翊卫从班例升为羽林飞骑，可见飞骑品级较翊卫为高，但具体节级安排情况，现已无从知晓。

从开元二十一年《敕皇太子纳妃》中我们看到"三卫、细引、飞骑、万骑、监门长上及礼生有职掌者，各减一年劳"的说法。唐代一般文武职事官以四考为满，而左右卫衙内五仗及引驾、细引考以五，左右卫之他职掌及左右率府之勋卫考以六，诸卫及率府之翊卫考以八。考满之后，先要由兵部校试，有文堪时务者送吏部参加铨选，无文则由兵部加年阶，以本色迁授[①]。"各减一年劳"即是减少一考的期限，以便提前进入仕途。从前引敕文看来，飞骑、万骑和三卫一样，也执行这种特殊的考第制度。

另外，羽林军和三卫都享受官厨待遇。《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条称："（神龙）二年（706）七月二日敕，左右羽林飞骑厨食，准国子监例，委军司自定官典押当。"而《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三卫骥骑病给食料敕》则提到上番三卫由三卫厨提供食料。

①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55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飞骑（万骑）在待遇上与三卫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却并不相同。三卫属于府兵的一部分，它在唐前期随着府兵制的瓦解而渐趋衰落；而飞骑则是在皇权逐渐摆脱贵族影响而提高的过程中兴起的皇帝私人势力，因而其待遇虽仿自三卫，却又表现出公私分别的特性。这一点，可以从羽林军厨食和药品的供应机构中得到体现。如前所述，羽林军厨食由军司自定，其药品则由尚药局供给。尚药局属殿中省，掌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之事，《新唐书》卷四七殿中省尚药局条云："左右羽林军给药，飞骑、万骑病者颁焉。"原本专门负责为皇帝制作药品的尚药局为羽林军提供药品，乃是对应其皇帝私兵的身份；而三卫所需药物来自太常寺下设的太医属，掌邦国医药，也充分显示出府兵作为国家军队的特征。

三卫来自官僚子弟，体现了皇帝与官僚贵族共制天下的原则，从本质上讲属于关中本位政策的遗俗，其身份、待遇也必然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与关中本位政策的消解而下降，让位给新兴的皇帝亲军。前面我们根据《马神威墓志》推知飞骑品级较翊卫为高，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

3. 羽林军的职能

羽林军升格为羽林卫后，其职能大大规范化：

> 羽林将军统领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摄左右廂飞骑之仪仗，以统诸曹之职。若大朝会，率其仪仗以周卫阶陛。大驾行幸，则夹道驰而为内仗。凡飞骑每月番上者，皆据其名历而配于所职。其飞骑仗或有敕上南衙者，则大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引驾仗官与监门奏覆，又降墨敕，然后得入[①]。

① 《旧唐书》卷四四，《羽林军》，第1903页；《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略同。

可以看出，羽林军的主要任务分为仪仗和宿卫，而执行任务的地点，则有北衙和南衙之分。

羽林军宿卫地点首先当然是宫城。唐代前期，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建立和启用，皇帝的听政地点不断变化。与之相应，羽林军也随皇帝游走于这三宫之间。具体说来，就是唐初到高宗前期以及中宗、睿宗、玄宗初年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以北，高宗龙朔三年（663）以后以及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开元十六年（728）在大明宫，开元十六年后在兴庆宫东。

大明宫的禁军驻防，北宋程大昌《雍录》卷八称，在九仙门西和太和门东，徐松《西京大明宫图》也将左右羽林军画在上述位置。但是，这种驻防方式是与飞龙厩的兴起以及大明宫稳定地成为统治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基本上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态势，高宗朝乃至玄宗初期是否已经如此值得怀疑。我们推测，高宗时代羽林军应该沿袭先朝的思路，驻扎于大明宫北门两侧。

玄宗开元时代，禁军的驻防格局仍无大的变化。《唐会要》卷七二载开元十年（722）九月二十七日敕：“驾在京，左右屯营宜于顺义、景风门内安置，北衙亦著两营，大明北门安置一营，大内北门安置一营。”如第一章所述，屯营是上直的士兵屯驻之所，本身并不代表任何军事系统。但是，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凡幸三（应为‘西’字之误写，因为与东都相对）京，即东都南、北衙，皆置左、右屯营，别立使以统之。若在都，则京城亦如之。”可知敕书中所提到的屯营分属于南衙卫兵和北衙禁军两个军事系统。其中，在顺义、景风门内安置的当属南衙屯营，而北衙屯营则在大明宫北门和大内（太极宫）北

①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32—38页，北京，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门。开元十年兴庆宫尚未起用，玄宗常住大明宫，禁军大概重点防护大明宫。具体说来，他们应该主要屯驻在大明宫以北的禁苑之中。但是，在这一敕书发布前，长安刚刚发生过一次未遂政变。政变的军人（属南衙系统）共一百多人经过顺义、景风门进入太极宫，最后在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以自溃告终。这次政变暴露出太极宫防守力量的虚弱，所以玄宗才强调南衙屯营在太极宫东西两侧顺义、景风门的防守。同时，大内（太极宫）北门和大明宫北门作为禁军的传统防护地区，也要各安置一营兵力。这种防护格局，仍然继承了唐初北衙禁军负责宫城北门防卫的传统驻防格局。

高宗以后，皇帝常驻洛阳。皇帝在洛阳期间，按照开元十年敕："驾在东都，左右屯营于宾曜、右掖门内安置，兼于玄武北门左右厢各据地界，绕宫城分配宿卫。"[①] 这里所说的屯营同样分为两部分，南衙屯营宿卫于宾曜、右掖门内；而以羽林军为主的北衙禁军则屯驻在玄武门外。

除宫城以外，羽林军还被分派到帝陵宿卫。《大唐新语》卷四云："权善才，高宗朝为将军，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有飞骑犯法，善才绳之。"此事发生在仪凤元年（676），两《唐书》、《资治通鉴》亦有记载，知权善才时为左威卫大将军检校羽林军，则昭陵亦有羽林军驻防。

再看仪仗。羽林军在大朝会中的位置是周卫阶陛。在飞骑仪仗出现之前，最靠近阶陛的是左右卫，以黄旗仗分立于两阶之次。飞骑仗形成之后，位次较之左右卫仗更前，并且改变了原来南衙十二卫在阶陛前纵向排列的形式，环绕于阶陛之前。这一立仗方式与朝会中供奉官和内供奉的位置颇有相似之处。据《新唐书·仪卫志》，凡朝会，文官列班于东侧，故称东班；武官在西

① 《唐会要》卷七二，第1292页。

侧，故称西班。在百官前横列的是供奉班，又称蛾眉班。中书、门下的官员以及翰林学士等供职内廷者都属于供奉班。宦官则谓之内供奉。因为他们的队伍在御前横列，所以又称为横班[①]。羽林军横陈于南衙诸卫仪仗之前，似乎表明他们和供奉官一样，属于更为接近皇帝的力量。

据《唐六典》，南衙十二卫仪仗之旗帜、铠甲、枪矟、弓箭颜色、图案各不相同。大体说来，左右卫、左右骁卫以黄，左右武卫以白，左右威卫以黑，左右领军卫以青；而羽林军属于禁军，故而“旗帜名数，秘莫得知，略之。”[②]《唐六典》不载禁军仪仗，反映出其作为官方文献对于国事和皇帝家事的严格区分。幸而编纂档案而成的《唐会要》保存了一些相关记录。据《唐会要》所载玄宗开元十三年敕云：“四军枪矟，左飞骑用绿纷，右飞骑绯纷，左万骑红纷，右万骑碧纷。”[③] 在严整肃穆的南衙仪仗之内，又形成鲜艳而具有强烈内廷色彩的内仗。这是在原有的仪卫基础上又增加的新仪仗，是对原有制度的补充。

还有一些职能则是取代了原有的制度。如奇日视朝勘验木契之职：

> 侍中奏“外办”，皇帝步出西序门，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开。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将军一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通事舍人赞宰相两省官再拜，升殿。内谒者承旨唤仗，左右羽林军勘以木契，自东西阁而入。内侍省五品以上一人引之，左右卫大将军、将军各一人押之[④]。

《新唐书》这段记载，颇有含混不清之处。首先应该明确，

---

① 参周良霄《皇帝与皇权》，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赵冬梅《唐五代供奉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9—67页。

② 《唐六典》卷二四《诸卫》，第610—624页；卷二五《诸卫府》，第643页。

③ 《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门，第1299页。

④ 《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志》上，第489页。

这段记载说的是唐代的内朝制度。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八引宋庠所考：

> 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曰丹凤，丹凤之内曰含光（元）殿，每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曰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殿，则唤仗于东西阁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

之所以言入阁者，是因为宣政殿之左有东上阁门，右有西上阁门，入阁，即由此而进入紫宸殿[①]。紫宸殿乃便殿，其礼杀，只有在皇帝不御宣政而改御紫宸时，才将在正衙排列的仪仗传唤自阁门而入。在阁门勘验木契原本是监门卫的职责，但是，阁门是宫廷中内朝与外朝的连接点，因而当代表内廷势力的羽林军发展起来后，便取代了监门卫这一职责。

随着北衙禁军的发展以及皇帝听政场所的改变，羽林仗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宋之问在《秋莲赋》中提到了东都洛阳羽林仗的存在：

> 天授元年（690），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入阁，每鸡鸣后，至羽林仗，阍人奏名请龟契，伫命拱立于御桥之西[②]。

高宗后期以及武周时代，以洛阳为统治中心，故而立羽林军仪卫于洛阳。羽林军立仗则有仗院，其作用和百官待漏的金吾仗院相似。洛阳的羽林仗院，据《秋莲赋》，知在城西禁苑之内。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胡注，第7783页。参《文昌杂录》卷六；《山堂考索》卷二四，《礼门·朝仪类·入阁》。

② 《全唐文》卷二四〇，第2428—2429页。

在西京长安，羽林仗院的分布则随皇帝听政地点的不同有过几次变化。据《周孝范碑》：唐初屯营在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立仗，屯营升格为羽林军后，立仗位置不变。龙朔三年（663），大明宫建成，高宗听政于此，羽林军应该也移至大明宫立仗。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以后居南内兴庆宫，羽林军也随之进驻。兴庆宫羽林军仗院史籍无考，但《陕西通志》所绘《兴庆宫图》，在兴庆宫内东北角有“金花落”。据《长安志》卷九《兴庆宫》：“金花落，在宫之东，俗所传，盖卫士所居。”或许就是禁军仗院。此外各处的行宫也都有羽林仗院存在。如华清宫，“华清宫集贤院在宫北横街之南，临羽林仗院。”①

问题是羽林军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立仗。按《唐六典》规定：

> 其飞骑仗，或有敕上南衙者，则大将军、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引驾仗官与监门奏覆，又降墨敕，后得入②。

所谓敕上南衙，指的是进入宫廷正衙。具体说来，就是太极宫的太极殿、大明宫的宣政殿和兴庆宫的兴庆殿。我们在史料中所看到的南衙列羽林仗通常是为迎接周边民族首领，如景龙中（707—710），娑葛遣使入谢，中宗为御前殿，引万骑、羽林二仗引见劳赐③；开元十八年（730），吐蕃名悉猎等至京师，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见之④。显示出皇帝对于四夷来服的重视。

南衙是国家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而羽林军则是天子私兵，在常规情况下不应进入南衙仪仗。他们被派往南衙立仗基本被视为一种特殊需要，因而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严格的程序反

① 《职官分纪》卷一五。
② 《唐六典》卷二五，《左右羽林军》，第643页。
③ 《玉海》卷一五四，《唐前殿劳赐》，第2842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5231页。

映出北衙与南衙严格区分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原来纯粹的皇帝私兵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参与国家公共生活并且成为一项制度，也反映出这支力量的逐渐壮大以及君主私属力量对于国家政治参与力度的加深。

虽然如此，羽林仗更广泛的用途可能还是内朝仪仗。宋之问在《秋莲赋》中提到他在天授元年以北门学士的身份分直于洛城西入阎，每鸡鸣后至羽林仗的情形，所谓入阎即进入内朝，这里的羽林仗应该是内朝仪仗。高宗以后，唐朝皇帝在内朝或便殿议事增加，羽林仗的应用也日益频繁，影响力超过了南衙诸卫仗。

天子居曰衙，行曰驾。按照《新唐书·仪卫志》，南衙十六卫各司其职，有很繁复的制度规定。其中，最靠近皇帝的武装力量是金吾卫组成的清游队。羽林仗出现后，形成内仗，位置较清游队更为近密。在开元六年（718）谒太庙、开元十一年（723）南郊祭祀、开元十三年（725）东封泰山、开元二十年（732）祭祀后土等活动中，都有飞骑的参与，大概正是作为内仗存在。事实上，在一些仪轨程度不强的皇帝巡游中，飞骑已经成为唯一的从驾士兵。如开元二年（714）九月十一日《幸新丰及同州敕》中称："宜以今月二十五日幸长春宫，……发日唯量将飞骑行，更不须别遣兵马及妄有科唤。"①《亲征安禄山诏》："既缘剪除凶逆，暂赴东京，宫掖侍从，并令减省。……其扈从文武官及飞骑、闲厩马家并诸色人等，应食公粮者，并以官物支供。"②

飞骑（万骑）代替府兵成为主要扈从人员，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皇帝办事机构向内廷转移以外，还可以从府兵制破坏这一角度加以考虑。

唐初制度规定的仪卫制度是以府兵制为依托的。从武周时代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七九，第451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第626页。

开始，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以及均田制的堕坏，府兵制逐渐解体。由于府兵人数不断萎缩，开元前期已经出现宿卫不给的局面，开元十三年（725）宿卫府兵正式被招募而来的骕骦取代。这样，原来由府兵将士承担的一些仪仗职责也就难以为继，有些转入骕骦，有些则由北衙禁军承担。府兵制是唐代作为律令制社会的基础之一，这一基础破坏后，与之相应的律令便被逐渐放弃。对于这一点，雷家骥先生解释为刚性体制和柔性体制之间的对立与互补[①]。具体到我们所关心的仪卫制度，便是府兵之外的北衙禁军作为仗内宿卫被写进《唐六典》，进而在现实中又成为皇帝非仪轨性活动中唯一的宿卫者。

高宗武则天时代，边镇长驻军还在发展之中，不能完全独立承担地方防务，羽林军仍然作为精锐部队参战。如《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中提到参战者有：押飞骑营中郎将李释、子总管押飞骑定远将军平原府左果毅长上穆仙童、押飞骑左玉钤卫队正长上贾楚珪、押飞骑李言忠、押飞骑沮忠扬、押飞骑唐景休、押飞骑左监门卫司戈窦九皋、押千骑三交戍主董玄景、押千骑队杨待封[②]。在这场战役中，羽林军系统显然是独立编制的战斗部队之一。这次和突厥的战争发生在万岁通天元年（696），指挥者中包括左羽林将军苏宏晖。羽林军很可能就是在苏宏晖率领下参加了战斗。

4. 羽林军与政变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指出：唐前期由于内重外轻的格局，故唯有中央革命可以成功，而中央革命之成功与否，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的禁军之手。我们在第一章提到武德年间的北门屯营在玄武门之变中并不

①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445—461页。

② 《文苑英华》卷六四七，第3328—3331页。

占据最重要地位。但是，随着太宗朝军队国家化的完成，飞骑这支府兵制度外的皇帝亲兵，便与政变结下不解之缘①。

羽林军频繁参与宫廷政变，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

首先，羽林军作为皇帝私兵，所受监控较为薄弱。雷家骥先生在《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中指出，唐代南衙兵受军政系统——兵部和军令系统——十六卫的双重控制，十六卫有兵，但无权调动，兵部有部分调动权，但本身无兵，因此可以收相互牵制之功。北衙禁军则不然，作为建立在十六卫制度之外的武装力量，虽然兵籍分掌于兵部和本军，但兵部除招募士兵外，并不能对它实际行使职权。这就使得它在理论上受控于皇帝，实际上则掌握在将军之手。无论是皇帝还是其他人，掌握了羽林将军也就等于掌握了整个羽林军。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羽林军发动政变需要经过的环节少，相对容易取得成功②，这一解释十分中肯。

其次，羽林军所处位置较为接近皇帝的起居之处，同时兼具地形上的居高临下之势。玄武门在军事地理上的优势，陈寅恪先生已作过精辟论证，兹不赘述。虽然这两项优势在玄武门之变中尚未完全凸显，但在此后的政变中，北衙禁军的地位愈来愈重要，成为政变成败所系的关键。

飞骑第一次和政变联系在一起是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发动的废黜李显（后来的中宗）政变。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程务挺与右领军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张虔勖同受武则天密旨，帅兵入殿庭，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为皇帝，武则天临朝称制。事后，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

---

① 黄永年先生认为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玄武门本身地位并不重要，只是因为禁军屯驻于此才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见《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但是就自然地形而言，玄武门本来就有居高临下之势，这也是唐前期禁军长期屯驻玄武门的原因。

②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445—461页。

奉庐陵。”① 可见二人所帅之兵便是羽林飞骑，他们也正是掌握政变成败的关键人物。

飞骑作为政变力量再次受到重视则是在武则天的权威动摇之后。武则天晚年多病，宠信张易之兄弟，引起朝廷各派系普遍不满。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倒周势力开始谋求拥立太子李显，结束二张对政治的影响。为此，他们将亲信杨元琰、敬晖、李湛、桓彦范安插进羽林军，并争取到长期统帅羽林军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的支持，掌握了羽林军的统帅权。政变之前，已经致仕的前冬官侍郎朱敬则对左羽林将军敬晖说：“公若假皇太子之令，举北军之兵诛易之兄弟，两飞骑之力耳。”② 可见，羽林飞骑作为一支可能调动的机动兵力已经受到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神龙元年正月，“（桓）彦范与敬晖及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讨易之、昌宗于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东宫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门，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兵士大噪。时则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斩易之、昌宗于廊下。”③参战的羽林军包括飞骑和千骑两支，此外，还有司刑少卿兼相王府长史袁恕己和相王统帅南衙兵仗以备非常。政变成功后，武将系统中羽林军将领李多祚赐爵郡王、李湛赐国公，王同皎为右千牛卫将军、郡公，杨元琰为云麾将军、弘农郡公、实封五百户，千骑系统则有杨执一进封河东郡公，赐实封四百④。从封赏情况看来，飞骑显然是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8页。

② 《册府元龟》卷四六六，第5551页。

③ 《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第2928—2929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神龙元年春正月庚戌条，第6582页；卷二〇八，神龙元年三月乙酉条，第6590页；《杨执一墓志》，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63。参见贺忠辉《唐〈杨执一墓志〉记事考补》，《碑林集刊》第2辑，西安碑林博物馆，1994年。

三种武装力量中的主力。

此后，神龙三年太子重俊政变，唐隆元年诛韦后政变都有飞骑参与其中。但随着禁军体制的进一步演进，政变的主力已经变为千骑（万骑），飞骑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章　龙武军与玄宗朝禁军体制的完备

第一节　百骑系统的发展与武周末到玄宗初的政变

对于百骑系统的发展，史籍有两种记载。

一是《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对这支军队的来源、装备等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解说：

> 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十二年（638），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鞬，为游幸翊卫。……武后改百骑曰“千骑”。中宗又改千骑曰“万骑”，分左、右营。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

二是《唐会要》卷七二的记载，标明了每一次演进的具体时间：

> 贞观十二年十一月三日，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其兵名曰“飞骑”，中简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为“百骑”。……至永昌元年（689）十月二十八日，改“百骑”为“千骑”。至景云元年（710）九月二十七日，改“千骑”为“万

骑”。……（开元）二十六年（738）十一月，析左右羽林军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①]。

二者之间的分歧有二：一是千骑改万骑的时间，二是龙武军的创建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千骑改为万骑的时间。支持《新唐书·兵志》记载的还有《旧唐书·中宗本纪》：“（景龙元年九月）壬戌，改左右羽林卫千骑为万骑，仍分为左右。”《资治通鉴》景龙元年的记载也持同样看法。这次改制的直接背景是神龙三年（707）太子重俊政变的失败。神龙三年七月，太子重俊率飞骑、千骑进攻玄武门，中宗组织兵力于玄武门楼下列守，并据槛俯谓李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于是千骑斩李多祚、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余众皆溃[②]。千骑的倒戈对于政变的瓦解起了决定性作用，故而政变后升格为万骑。此后景龙四年（710）中宗死后，韦后欲效法武则天专政，遂以亲族韦播、高嵩分押左右营万骑[③]。诛韦氏政变中，主要军事将领则为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鸟、陈玄礼等人[④]。依据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万骑的名号在中宗朝已经存在，因而《唐会要》所谓“景云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之“景云”应是“景龙”之误。

再来看万骑改为龙武军的时间。《兵志》所记，从上下文语气来看，当在睿宗景云年间。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旧唐书·睿宗本纪》：“（景龙四年夏六月）癸卯，殿中兼知内外闲厩、检校

---

① 因为百骑系统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长期隶属于羽林军，故而上述记载在《唐会要》中被分置于“羽林军”之下，本书为行文方便起见，将其缀合在一起叙述。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景龙元年秋七月辛丑条，6611—6612 页。又，《资治通鉴》本条所记“独孤祎”又写作“独孤祎之”，今据《全唐文补遗》第 3 辑《唐故左骁卫将军羽林将军独孤公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知应以“祎之”为确。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四年六月条考异引《景龙文馆记》，第 6642 页。

④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 166 页。

龙武右军，仍押左右厢万骑平王讳（李隆基）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及《旧唐书·王毛仲传》：“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改左右万骑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但是，我们看到，《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门载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敕云：“四军枪矟，左飞骑用绿纷，右飞骑绯纷，左万骑红纷，右万骑碧纷。”可见当时仍有左右万骑，他们和左右飞骑平级，共隶羽林军下。《唐会要》汇聚当时档案而成，可信度极高。但更为直接的证据则是一些万骑将领的墓志，如薛莫，任右骁卫大将军押左万骑使，卒于开元十五年（727）；白知礼，任左监门将军兼右万骑使，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现存墓志中，第一次出现龙武军的名号是在开元二十八年，墓主雍智云终官为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①]。显然，龙武军成立于景云元年的记载并不可信，因而，当以《唐会要》所载开元二十六年（738）为准。

至于《旧唐书·睿宗本纪》中所谓李隆基（玄宗）检校龙武右军的说法，唐长孺先生认为是检校羽林之误[②]。但这一推测与政变后以彭城王隆业任右羽林大将军的记载冲突[③]，因而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在相关文献中，《新唐书·玄宗本纪》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记载。纪云：“乃拜玄宗殿中监，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陇右群牧大使，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中，与《旧唐书》不同的是以“陇右群牧大使”代替了“右龙武将军”。事实上，如果按照《旧唐书》的记载，李隆基一方面检校右龙武军，一方面却仍押左右厢万骑，揆之情理，已有不

① 分别见《薛莫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49页；《白知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15，第1443页；《雍智云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69页。

② 《唐书兵志笺正》卷三，第92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睿宗景云元年六月条，第6648页。

合。而《新唐书》记载为“陇右群牧大使”，则显示出李隆基在政变后立即控制了马政。以优良的战马配合精锐禁军，方能形成强大的武力威慑，从而巩固地位，左右政局。这是李隆基作为优秀的政治家所了然于心的。事实上，在玄宗以后的统治岁月中，禁军和军马一直都由他最亲信的下属把持，而这些下属都有和他一起参加政变的背景，这也可以反证政变甫定之际，李隆基为稳定政局，一人独揽禁军、军马大权的事实。以此看来，《旧唐书》中有关“右龙武将军”的记载当为“陇右群牧大使”之误，龙武军的建制在这时尚不存在。

明确了龙武军建立的时间，再参照前两章有关屯营和羽林军的讨论，我们基本就能勾画出唐前期北衙禁军的一个发展脉络。

表七

贞观初	贞观十二年(638)	龙朔二年(662)	永昌元年(689)	天授二年(692)	景龙元年(707)	开元二十六年(738)
北衙屯(七)营	屯营(飞骑部分)	羽林军(飞骑部分)	同左	羽林卫(飞骑部分)	同左	羽林军
百骑	屯营(百骑部分)	羽林军(百骑部分)	羽林军(千骑部分)	羽林卫(千骑部分)	羽林卫(万骑部分)	龙武军

百骑系统和飞骑都是北衙禁军，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同属羽林军番号，那么，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认为，二者的区别存在于出身和职能两个方面。

先看出身。前面讲过，飞骑由选拔而来，在高宗以前从一般民户中选拔，龙朔二年后出身于府兵者不断增加。百骑的来源，文献中则有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新唐书·兵志》中有关贞观初百骑经拣选而来的记载，但拣选对象并无特殊规定。第二是拣自飞骑。如《新唐书·兵志》及《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羽林军”条。第三则是拣自户奴。《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

"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鞴，著画兽文衫，谓之'百骑'。"《通鉴》卷二一〇睿宗景云元年九月条："又停以户奴为万骑。"同条胡注谓："户奴为万骑，盖必起于永昌以后。"似乎以户奴补充百骑（千骑、万骑）的做法从贞观中一直持续到睿宗即位初。其实，万骑作为皇帝侍从，拣选标准在于骁勇善骑射，出身并不重要，因而来源相当复杂。大概在贞观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既有选自飞骑者，又有选自户奴者[①]，但当时因为规模尚小，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武后永昌元年，百骑改为千骑，兵额增加数倍。遂大量补充骁勇的官奴，从而奠定了这支军队"奴"的基调。现有史料中，看不到百骑（千骑、万骑）士兵或低级将领的记载，或许与这支军队特殊的出身有关。

再看职能。太宗贞观初，从元从禁军中"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选材力骁壮者，置"北衙七（屯）营"。这两支武装不同的分工侧重，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后代北衙禁军的基础。相对而言，飞骑一系更趋近于正规军，以宿卫为主要职责。由百骑发展起来的一系则更多的偏重服务于皇帝私人娱乐生活。

由于有这些区别，百骑系统虽然隶属羽林军，享受与飞骑基

---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43页。汪篯先生在《玄宗时代之禁军及其统帅》一文中则认为，以户奴补充百骑系统只能出现在中宗以后，理由有三：首先，《新唐书·兵志》和《通典·职官典》都记载贞观中百骑由飞骑选拔而来。其次，胡三省注释严谨，他既云户奴为万骑起自永昌以后，必有所本。第三，贞观中兵法未坏，人民尚无贱视兵士之心理，不当以官户充亲近侍卫。（载《汉唐史论稿》，第247—2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汪先生这一看法或可商榷。首先，第一条理由同样可举《旧唐书·王毛仲传》驳证。第二条理由推测性过强，不能作为依据。第三条理由则有隋炀帝时代屯驻于北门、由官奴组成的给使营作为反证。隋代同样没有贱视兵士之心理，但并不妨碍皇帝以官奴充当侍从。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隋恭帝义宁元年条，第5780—5784页。

本相同的待遇①，却一直保持相对独立性，他们由专使统领，兵额和军粮也自己掌握。百骑系统设使，《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谓在中宗改千骑为万骑后。但是，据《杨执一墓志》，志主在神龙元年就已经是右卫中郎将押千骑使，则置使时间至少应提前到千骑时代。千骑（万骑）使之下还有营长，则其建制大约和屯营时代的飞骑相似。千骑（万骑）使独立负责本军内政，玄宗开元十八年敕云："应补万骑宜待本使挟名录奏，敕下然后给食粮者"，可见一斑②。

由于其特殊的出身和职能，百骑系统较之飞骑更具私密性，这使得他们在中宗朝以后崇重内廷的氛围中获得巨大发展，势力逐渐超过飞骑。百骑力量的不断壮大得力于几次宫廷政变。前面我们提到过神龙元年（705）政变中的几支参战武装，当时，飞骑居于政变的主导地位，《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甚至只提出了羽林兵（飞骑）的力量："（神龙元年正月）癸卯，柬之、玄暐、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

《通鉴》不述千骑之功是因为这样一条材料：

> 张柬之等讨张易之也，殿中监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敬晖遣使就索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与。事宁，晖欲

① 从第二章第二节看来，百骑系统在封赏时常常与飞骑处于同等地位，故猜测二者享有大体相同的待遇。但是，《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云："至德二年十月十四日，左右神武两军，先取元扈从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中简取二千人为定额。其带品人并同四军例，白身准万骑例。"张国刚先生认为，所谓带品人同四军例，是说那些官员子弟中的有身份者（如因为门荫而得官者）可以比照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中同类人员的情况，给以相应的品阶、职位。如果是没有官品的"白身"（指还没有取得做官资格者），则与普通万骑的待遇相同（《唐代禁卫军考略》）。既然单独提出万骑，可以推知飞骑和万骑的待遇还是有所差异，但具体情况则不得而知。

② 《唐会要》卷七二，第1292页。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编，第1184—1186页。

诛之，归道以理自陈，乃免归私第，帝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①]。

这是千骑不与政变的强证。但今据《杨执一墓志》，知神龙政变实借千骑之力：

转右卫中郎将押千骑使。既而长乐弛政，辟阳僭权，厌钮之兆未从，左袒之诚先发。安刘必勃，望古斯崇。中宗践祚，以佐命匡复，勋加云麾将军，迁右鹰扬卫将军，封弘农县公，食邑一千，实赋四百。赐绢二千匹，杂彩五百段，金银器物十□。无何，进封河东郡公，增邑二千户，加冠军大将军，特赐铁券恕死者十。并厩马、金银、瑞彩之类[②]。

赐铁券事在《资治通鉴》卷二〇八记载为："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杨执一也是这十六人之一。赐爵和实封则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在神龙元年正月庚戌："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汉阳郡公；鸾台侍郎兼检校太子右庶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崔玄暐为守内史，封博陵郡公；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封南阳郡公；敬晖为纳言、平阳郡公；桓彦范为纳言、谯郡公：并加银青光禄大夫，赐实封五百户。右羽林大将军、辽国公李多祚进封辽阳郡王，赐实封六百户；内直郎、驸马都尉王同皎为云麾将军、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并赏诛张易之兄弟功。其余封各有差。"第二次在四月癸巳：侍中敬晖封为平阳郡王；侍中桓彦范扶阳郡王，赐姓韦氏；中书令张柬之汉阳郡王；中书令袁恕己南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神龙元年春正月条，第6582页 。

② 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114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又张说《赠户部尚书河东宫杨君神道碑》所记与此大体相同，见《张燕公集》卷一九，第203—206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

阳郡王；特进崔玄暐海陵郡王；并加授特进，罢知政事。[①] 无疑，封赏的多少取决于政变中功劳的大小，而能够建立怎样的功勋又取决于依赖于所掌握的军事实力。从封赏情况看，杨执一在这场政变中发挥的作用相当巨大，如果说李多祚等功臣主要代表了羽林飞骑系统的话，那么杨执一当代表参战的千骑系统。

其实，田归道与杨执一的材料本不矛盾。千骑分左右两厢，田归道与杨执一或各为一厢统帅，或田归道以官高为总领而杨执一为分帅，在政变中采取了不同态度而已。雷家骥先生认为杨执一所率当为千骑之番下者，而另一半千骑则由田归道统领，番上宿卫于玄武门，也是一个比较通达的解释[②]。当然，此时的千骑还只是这次政变的参与者，主力部队还是羽林飞骑。

至神龙三年太子重俊政变，千骑已经成为主导力量。“秋，七月，辛丑，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并亲党十余人”，知政变的军事力量仍由飞骑和千骑两部分组成。但是，政变士兵进至玄武门后，中宗“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祎之、忠义，余众皆溃。”[③] 从中宗据槛瓦解千骑以及“千骑斩多祚、承况、祎之、忠义，余众皆溃”的描述看来，这次政变虽然有羽林飞骑和千骑两部分参与，但主力已经变成千骑。

唐隆元年（710）政变中万骑发挥了最主要作用。

> 至六月，中宗暴崩，韦后临朝称制。……上（李隆基）乃与（薛）崇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

① 《旧唐书》卷七，第136、139页。
②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462—469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景龙元年秋七月辛丑条，第6611—6612页。

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僧普润等定策诛之……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钟绍京又率丁匠百余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①]。

在政变中，葛福顺领左万骑攻玄德门，李仙凫领右万骑攻白兽门，二人斩关而入，与李隆基所率人马在两仪殿前会合。太极殿前宿卫梓宫的诸卫兵、万骑、飞骑，闻乱皆披甲响应。韦后惶恐之中，按照中宗在太子重俊政变中转危为安的成功经验走入飞骑营，寻求庇护。但事异时移，此计未能奏效，终为乱兵所害。“于是分遣诛韦氏之党，比明，内外讨捕，皆斩之”[②]。次日，殇帝重茂下台，睿宗登基。随即，李隆基被任命“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③]。

与前三次相比，先天政变动用的军事力量显得比较含糊。《旧唐书·玄宗本纪》云：

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雍州长史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余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李慈于北阙。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萧至忠、岑羲于朝，皆斩之[④]。

似乎政变的参加者主要是家人童仆，禁军无所作为，但事实并非如此。

---

①②《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66—167页；《册府元龟》卷二〇，《帝王部·功业》二，第212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云元年六月庚子条，第6646页。

④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69页。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先天元年（712），王琚与右羽林将军张玮曾经密谋以禁军诛讨太平公主，结果谋泄，政变流产。先天二年再谋政变时，荆州长史崔日用给玄宗的建议仍是："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① 显然，禁军特别是万骑一直是玄宗一派认真考虑的首选力量。很难想像他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竟会抛弃万骑，而去起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家人。《旧唐书·郭元振传》于此事便有不同记载："及萧至忠、窦怀贞等附太平公主潜谋不顺，玄宗发羽林兵诛之。"羽林兵并无确指，但唐隆政变后，玄宗在万骑系统中已经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政变的主要将领葛福顺、陈玄礼等人都留在万骑系统，王毛仲也保留了对万骑相当大的影响②。在宫廷斗争的关键时刻，万骑仍然会是玄宗的首选力量。只有他们有实力由北向南斩关而入，直逼睿宗避难的承天门下，并将临时聚集起来的诸卫兵拒之门外，最终取得政变的成功③。

通过对以上四次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间段内，禁军一直是历次政变的主导力量。但是，在不同时期，禁军的两个分支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前期特别是神龙元年政变以羽林飞骑兵为主，从神龙三年开始，千骑的力量凸显，并扩充为万骑。在唐隆政变以及后来的先天政变中，万骑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势力得到充分发展。

最后还应当交代一下的是，我们说禁军是政变的主力，并不意味着南衙卫兵完全无所作为。事实上，在这几次政变中，每次都有南衙的力量活动其中。神龙元年政变的重要组织者之一袁恕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开元元年六月条，第6682页。

② 见《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附陈玄礼传》，第3252—3255页。

③ 参李锦绣《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新唐书之部〉》，载《中国文化》1991年5期，第209—212页；同作者《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载《原学》第三辑，第160—17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己，即从相王统南衙兵以备非常之变，并担任了收捕韦承庆、房融、崔神庆等张易之外朝党羽的工作。太子重俊政变，先安排党羽左金吾卫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方能顺利地从东宫出广运门，经永安门、肃章门，直入内廷。政变失败后，太子所经诸门守者皆坐流，也反证出南衙卫兵在太子起兵中的作用。唐隆政变的策划者之一麻嗣宗即为京兆利仁府长上折冲，其他政变功臣如薛莫、鲜于廉、白知礼、宋知感也都出自诸卫系统。他们参与政变对于诸卫兵的倒戈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总的说来，由于受屯驻位置和管理体制的影响，诸卫兵在政变中只能起协助作用，而难以充当主力。

第二节　前期唐元功臣集团的形成及挫折

1. 唐隆政变后功臣集团的出现

汪篯先生在《玄宗时期之禁军及其统帅》一文中认为，玄宗时代的禁军统帅由两类人物组成，一类是玄宗的私人奴隶，如王毛仲；另一类则是出自官户之龙武功臣。这两类人物与玄宗的渊源，要归结于唐隆元年诛韦后政变和先天二年消灭太平公主势力的政变[①]。这一说法无疑极有见地。但是，我们认为，唐隆政变是唐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变，它的成功直接导致了万骑营地位的突起乃至万骑立功将士成为玄宗时代禁军将领的主要来源。相比较而言，先天政变基本上是一场兵不血刃的政变，它所动用的军事力量规模不大，并未改变唐隆政变后所形成的禁军态势。另外，唐隆政变立功者在当时有一个专称叫做“唐元功臣”，它已经囊括了汪先生所说的两类人物，因而，我们在这里采用“唐元

① 《汉唐史论稿》，第247—258页。

功臣”这一称号，来指称唐隆政变所诞生的一批武将，他们作为玄宗朝禁军将领的主要来源，极大地影响了玄宗一朝禁军系统的格局。

唐隆政变的参与者，大体可以划分为谋臣、僧道、司农寺丁匠以及武人力量等四个系统。谋臣以刘幽求、钟绍京为代表。政变之时，刘幽求为前朝邑尉，钟绍京为苑总监，地位都比较卑微，依靠政变之功骤历显贵。但是，由于不具备相应的行政经验和能力，加之受到正统大臣的排斥以及玄宗本人对功臣的猜忌，他们迅速被玄宗抛弃，在开元初年即罢知政事，不再对政治发生影响。僧道之流中，目前已知有僧普润、道士冯道力和王晔。这些人虽然是政治和尚、政治道士，但毕竟不可能步入政治前台，无法长久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司农寺丁匠身份卑微，为正统仕途不齿。立功后，这些人还是本色迁转，固定在特殊系统之内。

真正在历史上发生影响的是武人力量。他们以万骑将士为主，包括玄宗家奴、飞骑、南衙府兵以及殿中省、太子仆寺的上直者。其中，万骑出身者是本章重点所在，此处暂不置论。玄宗家奴有王毛仲和李守德。十二卫系统有薛莫、鲜于廉、宋知感和白知礼。政变前，薛莫为左领军卫蒲州奉信府折冲，鲜于廉为右卫明光府果毅，宋知感为邠州公刘府左果毅长上，白知礼为原州彭阳府左果毅都尉。仆寺系统如方元瑾，时为仆寺典牧丞。殿中省当直者如《东城老父传》中贾昌之父，时为中宫幕士，属殿中省尚舍局；章令信时直殿中省[①]。无论作为玄宗心腹，还是作为帝国军事力量的一部分，他们基本都是武人，在当时的政治体制

① 分别见《薛莫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 349 页；《鲜于廉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171；《宋知感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362 页；《白知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415，开元 529；《方元瑾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 370 页；《东城老父传》，《太平广记》卷四八五，第 3992—3995 页，中华书局，1961 年。《章令信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 106 页。

下，不会真正影响中枢决策。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唐隆政变成为玄宗最可信赖的爪牙。这两个特点使他们在玄宗一朝免于猜忌，获得极大发展，形成我们所说的“唐元功臣集团”①。

作为专有名词的“唐元功臣”，以《旧唐书·王毛仲传》的界定为最详：

> 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龙武官尽功臣，受锡赉，号为“唐元功臣”。

这段话前一句述玄宗为太子时已改万骑为龙武军，其误在上一节已经辨明。后一句称以龙武官为“唐元功臣”，也存在着概念理解的问题。

“龙武官”这一概念，按照当时的建制，可以比定为万骑官。万骑系统所能容纳的官员数量极其有限。按照惯例，万骑官员均由它官兼任，其职任已知的有押万骑使和营长，其他或许还有队正，总数不会太多。即使后来龙武军正式设立官署后，在“安史之乱”前武职中也只有大将军二人、将军四人、司阶四人、中候六人、司戈十人、执戟十人，共三十六人。若仅以万骑官员为唐元功臣，则为数殊少②。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开元后期组建的龙武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唐元功臣子弟，那么唐元功臣就该有相当的数量，而不仅限于少数官员。显然，把“唐元功臣”和万骑系统官员等同起来并不符合事实。

但是，假如我们将“龙武官”理解为原属万骑系统，后因参加政变而得官者，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玄宗时代的赦文中，我

---

① 唐隆政变后，李隆基成为太子，随后又荣登大宝，做了皇帝。他名字中的“隆”也成为避讳字，唐隆因此改称“唐元”。参汪籛《玄宗时代的禁军及其统帅》，及拙作《开天政局中的唐元功臣集团》，《文史》2001年第4期，第95—118页。

② 参《唐六典》卷二五，《左右羽林军》，第642—644页。

们看到“唐元年两营立功官”的提法[①]，这两营立功官，指的是参加政变的左右万骑将士，他们因政变立功而获得官职，从而成为所谓的唐元功臣。

仅举两条墓志为证：《唐元功臣故冠军大将军张公（登山）墓志铭》谓其“献策金门，遂受腹心之寄。唐隆元载，解褐授游击将军，宁州静难府右果毅。”《张德墓志》称“公唐元功臣”，立功后“初任左骁卫庆州同川府左果毅”[②]。都是以万骑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政变，并由此出仕，同时被授予唐元功臣的称号。那么，唐元功臣就应该像我们在上文中所表述的那样，理解为因参加政变而立功的万骑将士。

其实，不仅万骑系统，其他政变立功者也享有这一徽号。《赠钟绍京太子太傅制》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发布的诰文称：“唐隆功臣、故光禄大夫、中书令、户部尚书、上柱国、越国公、食实封五百户钟少京。”[③] 玄宗统治结束后，“隆”字不再避讳，因而建中时期的“唐隆功臣”也正是前面所说的“唐元功臣”，以之加于文臣钟绍京，表明“唐元功臣”原本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泛指所有政变参加者，这和《旧唐书》的定义显然有很大差距。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开天之际，其他系统的政变者对于政治的影响力都非常微弱，而以万骑将士为主的武将则相当活跃。因而当人们提到这些功臣时，注意更多的是其中的武人力量。同样，本章所要探讨的“唐元功臣集团”，指的也是这批以万骑两营为主的立功武臣。

钩沉有关史料我们看出，这些功臣拥有共同的出身和基本相

---

① 唐玄宗：《谒陵大赦文》，《全唐文》卷三九，第427页。

② 分别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103页；《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98，第1669—1670页。

③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第1页。

似的经历，从而能够在以后的宦海生涯中共同进退，形成利益相关、荣誉与共的集团力量。

先看出身。如前所述，万骑来源相当复杂。那么，来自于万骑营的唐元功臣也应反映同样的情形。依据传统史料和相关墓志，我们将 38 位万骑系统功臣的籍贯和祖辈仕宦情况列表如下。

表八

姓　名	籍　贯	曾祖、祖官	父　官	出　处
葛福顺	京兆泾阳人	无官	元城府左果毅赠郎将	《赠郎将葛君墓志铭》①
陈玄礼	不　详	不详	不详	两《唐书·陈玄礼传》
周思忠	京兆奉天人	隋冠军大将军 唐右卫将军	冯翊司马	《补遗》5—375
高　德	京兆人	不详	不详	《汇编》天宝 008 《补遗》2—527
万　行	京兆泾阳人	无官	开元初赠博平郡司马	《补遗》5—379
王守节	京兆泾阳人	无官	赠平原太守	《补遗》2—25
田福仙	京兆高陵人	不详	不详	《补遗》5—385
施　宝	京兆华原人	无官	赠衢州司马	《补遗》3—80
李　怀	长安人	无官	赠清原郡司马	《补遗》1—156
李仪凤	京兆人	无官	不详	《补遗》6—407

① 《全唐文》卷二三一，第 2339 页；参见《唐元城府左果毅葛公神道碑》，《张燕公集》卷一七，第 182 页。

续表

姓　名	籍　贯	曾祖、祖官	父　　官	出　　处
王思泰	京兆人	不详	不详	《王荣神道碑》①
宋　庄	洛阳人	不详	不详	《汇编》开元 242 《补遗》2—468
张　德	洛阳人	隋赠宣州刺史 唐赠梓州别驾	赠游击将军	《汇编》天宝 198
茹义恩	扶风代人	无官	无官	《补遗》5—350
李玄德	陇西成纪人	无官 左卫郎将	赠五原郡司马	《补遗》5—402
李忠义	陇西成纪人	无官	赠梓潼郡司马	《补遗》3—76
董怀义	陇西人	无官	赠游击将军	《汇编》开元 235 《补遗》2—468
王　泰	太原祁人	无官	赠通州司马	《补遗》5—372
王崇礼	太原祁人	后周司马 无官	赠博州司马	《汇编》开元 340 《补遗》2—489
王元楷	太原人	不详	平州刺史，诸军节度使	《补遗》6—57
薛　义	河东汾阴人	无官	赠安化郡都督府司马	《补遗》5—382
王守言	弘农郡人	不详	不详	《补遗》5—373
张安生	南阳人	无官	赠扶风郡司马	《汇编》天宝 264
张金刚	南阳人	不详	赠洛交郡司马	王育龙文②

① 《文苑英华》卷九〇九，第 4784—4784 页。

② 王育龙：《唐长安城东出土的康令恽等墓志跋》，《唐研究》第六卷，第 395—40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续表

姓　名	籍　贯	曾祖、祖官	父　　官	出　　处
索思礼	其先敦煌人	无官	赠陇西郡司马	《汇编》天宝 050
张登山	敦煌人	隋雍州石台府折冲 左卫郎将上柱国	穆州司马	《补遗》3—103
刘　感	彭城人	无官	赠南溪郡司马	《汇编》天宝 229
刘玄豹	彭城人	高平郡莘城令 宁州罗川府折冲	宋州医博士，赠邢州司马	《补遗》1—186
史思礼	武威人	右卫中候 右卫司戈	赠青州司马	《补遗》3—75
屈元寿	临海人	无官	赠右领军卫翊府右郎将	《补遗》3—77
承嗣	鲁郊人	无官	赠朝散大夫，邠州司马	《补遗》3—74
智云	平原人	无官	赠徐州司马	《补遗》5—369
李安乐	赞皇人	无官	赠云南郡司马	《补遗》5—388
朱　保	会稽人	无官	唐元功臣，绛郡新田府折冲	《补遗》5—377
何　德	庐江人	无官	赠朝散大夫，普安郡司马	《补遗》3—97
张伏生	不详	不详	洛交郡长史	《汇编》天宝 011 《补遗》1—152

续表

姓　名	籍　贯	曾祖、祖官	父　　官	出　　处
齐　子	不　详	无官 皇左清道率府率	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汇编》天宝 203 《补遗》2—552
李仁德	乐浪人	不详	赠定州别驾	《汇编》开元 370

在这 38 人中，墓志直书籍贯京兆的有 9 人，相对较多。另外，考虑李氏必书陇西、赵郡，王氏必书太原等现象和假托阀阅的时代风气，墓志所书大多应指郡望（或虚拟的郡望），而非立功前的实居地，若以实居地计，可能京兆的比例还会高些。有 29 人的父亲有官职，但其中 24 人的父亲明确为子贵后的赠官，另外 3 人（张登山、张伏生、周思忠）的父亲分别为穆州司马、洛交郡长史、冯翊司马。而从墓志材料来看，唐元功臣的父亲例赠郡司马或郡长史，因此怀疑这三人的职衔亦是赠官。只有五位的父亲曾任实职，且其中二位本身即是唐元功臣。曾祖、祖辈则有 30 人无官或不详。

这样看来，唐元功臣绝大多数应是从京兆或附近地区选拔而来的平民，但不排除部分唐元功臣立功后隐瞒其官奴出身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蕃人在唐元功臣中占很大比例，如何德：志称其本姓韩，因避难江淮，改姓何氏。但其母姓安，封酒泉县太君，而为其撰墓志者姓米氏。何、安、米都是典型的粟特姓氏，他们又有民族内部通婚和交往的传统。何德的经历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民族特性，因而当是昭武九姓何国裔。又有史思礼，武威人，从姓氏和籍贯看来，亦当属昭武九姓[①]。再如高德，本辽阳人，太宗平高丽后入唐，父祖并宿卫禁军，显然是高丽裔。使用

① 参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六卷，第 27—8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蕃人是唐代宿卫制度的一大特色，无论唐初南衙宿卫还是唐后期的神策军中都有大量蕃人存在，并且形成固定制度①。这固然与蕃人骁勇有关，但也是唐代统治者追求四夷来服的“天可汗”心理在仪卫上的外化反映。

此外，父子并为禁军也是唐元功臣的鲜明特色。上表中，朱保父为唐元功臣、绛州新田府折冲；齐子父为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当俱出于万骑系统；高德的父祖也都“属乎仗内，侍卫紫宸”②。如此多的父子兵反映出万骑终身制、世袭制的倾向，它所隐含的“世受国恩”的意义也是保证禁军忠诚的重要手段之一。

再看唐元功臣在玄宗朝的经历。结合传世文献和墓志，我们基本可以勾画出 37 位功臣在玄宗朝的发展状况。

表九

姓　名	解褐官	历　　官	终　　官	卒　年
葛福顺	不　详	万骑果毅	左领军将军押万骑	不详
陈玄礼	不　详	万骑果毅	右龙武军大将军	不详
李安乐	不　详	不详	左龙武军将军员外同正	不详
王思泰	不　详	不详	左龙武军将军	
张安生	果　毅	折冲—郎将—中郎将	右龙武军将军	天宝十四载
李玄德	不　详	不详	右龙武军将军	天宝十四载

① 唐代投诚的部族将领或周边政权的质子常常被安排宿卫；德宗贞元三年又拣括胡客，使之分隶于神策两军。参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第 35—105 页；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第 39—44 页。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 238—257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

②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 008，第 1536 页；《全唐文补遗》第 2 辑，第 527 页。

续表

姓　名	解褐官	历　　官	终　　官	卒　年
张登山	宁州静难府右果毅	岐州义伏府左果毅—华州郑邑府左果毅—京兆元城府折冲—甘泉府折冲—京兆大明府折冲—左骁卫翊府右郎将—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左清道率府率—右龙武军大将军	左龙武军大将军	天宝十四载
刘玄豹	资州夷牢镇副	洛州伊川府果毅—京兆丰安府果毅—华州丰原府折冲—河南岩邑府折冲—左领军卫翊府右郎将—左龙武军翊府中郎将—左龙武军郎将	左龙武军将军	左龙武军大将军
何　德	延安郡敦化府果毅	京兆平乡府折冲—左威卫翊府右郎将—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右龙武军将军	天宝十三载
张金刚	夏州塞门镇官	洛州同轨府左果毅—右武卫翊府左郎将—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左龙武军将军	天宝十三载
刘　感	兴州大挑戍主	右卫宁州彭池府左果毅—左卫陕州曹阳府折冲—左领军卫同州襄城府折冲—左武卫翊府右郎将—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左龙武将军	天宝十二载
王守节	上党郡从善府别将	雁门郡凤池府左果毅、典禁兵—宝鼎府果毅—彭池府果毅、典禁兵—银川郡龙川府折冲—左威卫翊府右郎将检校三宫使	右龙武军将军	天宝十一载

续表

姓　名	解褐官	历　官	终　官	卒　年
齐　子	晋州羊邑府左果毅	华州定城府左果毅—陕州忠孝府折冲—陕郡上阳府折冲—右骁卫郎将—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右龙武军将军	天宝十一载
张　德	庆州同川府左果毅	泾州纯德府折冲—右武卫郎将—右武卫翊府中郎将—右监门率府副率	右龙武将军，	天宝十载
屈元寿	洋川郡上川戍主	平阳郡晋安府果毅—冯翊郡宣化府果毅—华阴郡义津府折冲—右武卫翊府左郎将—右龙武军右郎将—本军中郎将	右龙武军将军	天宝九载
薛　义	绛郡长祚府左果毅	不详	左龙武大将军员外同正	天宝八载
田福仙	凉川镇副	绛州景山府左果毅—右领军卫华州神水府左果毅—折冲	左龙武将军员外同正员	天宝八载
李忠义	阳城郡延俊府别将	扶风郡玉泉府左果毅—水衡府左果毅—扶风郡邵吉府折冲—左威卫右郎将—左龙武军右郎将—左龙武军中郎将	左龙武军将军同正	天宝七载
朱　保	汉州玉津府左果毅都尉	宁州高望府折冲—右领军卫左郎将—左龙武军中郎	左龙武军将军同正员	天宝六载
施　宝	河南王屋府果毅	京兆居义府果毅—陕郡安戎府折冲—京兆甘谷府折冲—京兆崇仁府折冲—京兆甘泉府折冲—京兆大明府折冲—右武卫郎将—左领军卫中郎将—左龙武军中郎将—左内府率	左龙武军将军	天宝五载

续表

姓　名	解褐官	历　官	终　官	卒　年
李　怀	扶风郡积善府左果毅、长上	河南洛汭府折冲—左领军卫翊府右郎将—左龙武军翊府中郎将、检校东京左屯营	左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天宝四载
索思礼	不　详	检校冯翊郡沙苑监三马坊使并营田使	左清道率	天宝三载
周思忠	咸宁右果毅	天古府折冲—加游击将军—右威卫郎将—翊府中郎	□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天宝三载
史思礼	平阳郡仁寿府左果毅	冯翊郡唐安府左果毅—伏龙、洪泉二府折冲—京兆神鼎府折冲—左武卫翊府右郎将	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天宝三载
徐承嗣	扶风郡文城府右果毅	左武卫郎将	左龙武军中郎将	天宝三载
王守言	雍州布政府左果毅	华阴郡义津府折冲—左骁卫中郎—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射生供奉	左骁卫将军员外同正	天宝二载
万　行	河东寿贵府果毅	京兆甘泉府折冲—左龙武军郎将—左龙武军中郎将	左龙武军中郎将，天宝五载，追赠将军	天宝二载
王　泰	不　详	不详	左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天宝元年
高　德	平州白杨镇将	鄜州龙交府、祁州杜阳府果毅—陕州万岁、绛州长平、正平、怀州怀仁、同州洪泉等五府折冲—右武卫翊府郎将—右龙武军翊府中郎、长上内带弓箭	右龙武军翊府中郎	天宝元年

续表

姓　名	解褐官	历　官	终　官	卒　年
张伏生	不　详	左骁卫郎将	左龙武军中郎将	天宝元年
雍智云	静州烈山镇将	太州罗文府左果毅—京兆甘谷府右果毅、长留宿卫—京兆闻义府折冲—京兆仲山府折冲—京兆匡道府折冲—京兆通乐府折冲—右领军卫翊府右郎将—右武卫翊府中郎将	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	开元二十八年
王元楷	泾州仁贤府折冲	左武卫翊府中郎将	左武卫大将军	开元廿四年
李仁德	右屯卫翊府中郎将	不详	右威卫将军	开元廿一年
王崇礼	松州牛头镇副	不详	左领军卫河南金谷府折冲、上柱国	开元十九年
茹义恩	岐州三交府左果毅	同州连邑府折冲、仗内供奉	同州连邑府折冲	开元十七年
宋　庄	匡道府折冲、长上内供奉	不详	左领军卫匡道府折冲	开元十五年
董怀义	龙交府右果毅	洛安府折冲—右威卫翊府中郎将	行右威卫将军	开元十四年

37 位万骑系统唐元功臣中，有 16 位解褐授果毅都尉，另有 13 人分别为中郎将、折冲、别将、镇将、镇副和戍主。不同品级的划分，大约依据功劳大小而定[①]。大多数墓志中墓主解褐入仕的时间不详，只有三志留下了具体记载：史思礼，“七月十三日，恩敕授君平阳郡仁寿府左果毅都尉”；王崇礼，“唐隆元年七月十六日，制授松州牛头镇副”；田福仙，“景云元年八月六日凉川镇副”[②]。既然功臣数目众多，大概政变后颇有一段授官无虚日的时期，从六月底一直持续到八月。功臣们初授的官职都在长安城以外的军府和镇戍，《通鉴》卷二一〇景云元年八月载：“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基本是赏罚大定后一个总结性的说法，以上墓志，正可作为这句话的一个注脚。

功臣们出仕后大部分沿着果毅（中郎将、折冲、别将、镇将、镇副、戍主）→折冲→（十六卫郎将）→（龙武军郎将）→龙武军中郎将→（龙武军将军、大将军）的方式升迁[③]。在进入中央诸卫郎将的序列前，每个人都有一段折冲府武官的经历。唐代折冲府的一个基本任务便是番上宿卫中央，但唐帝国幅员辽阔，许多军府与两京相隔玄远，番上十分不便。这样，作为权宜，两京周围地区的军府可能更多地承担了中央宿卫任务，甚至

---

① 如李仁德，“当昔中宗晏驾，韦氏乱常，……（公）发皇明，披紫闼，……心冠鹰，手刃枭獍，……是用拜公云麾将军行右屯卫翊府中郎将，金城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370，第 1427 页）“枭獍”是传说中食父食母的恶鸟，志文中，“手刃枭獍”很可能是指其斩首安乐公主一事。中郎将为正四品官，李仁德由一白身释褐即升此高位，大概就是为赏其消灭政变首要敌人之功。

② 分别见《史思礼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 75 页；《王崇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340，第 1391 页；《田福仙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 385 页。

③ 未加括号官职为绝大部分唐元功臣必然经历的职位，加括号官职则为部分唐元功臣所历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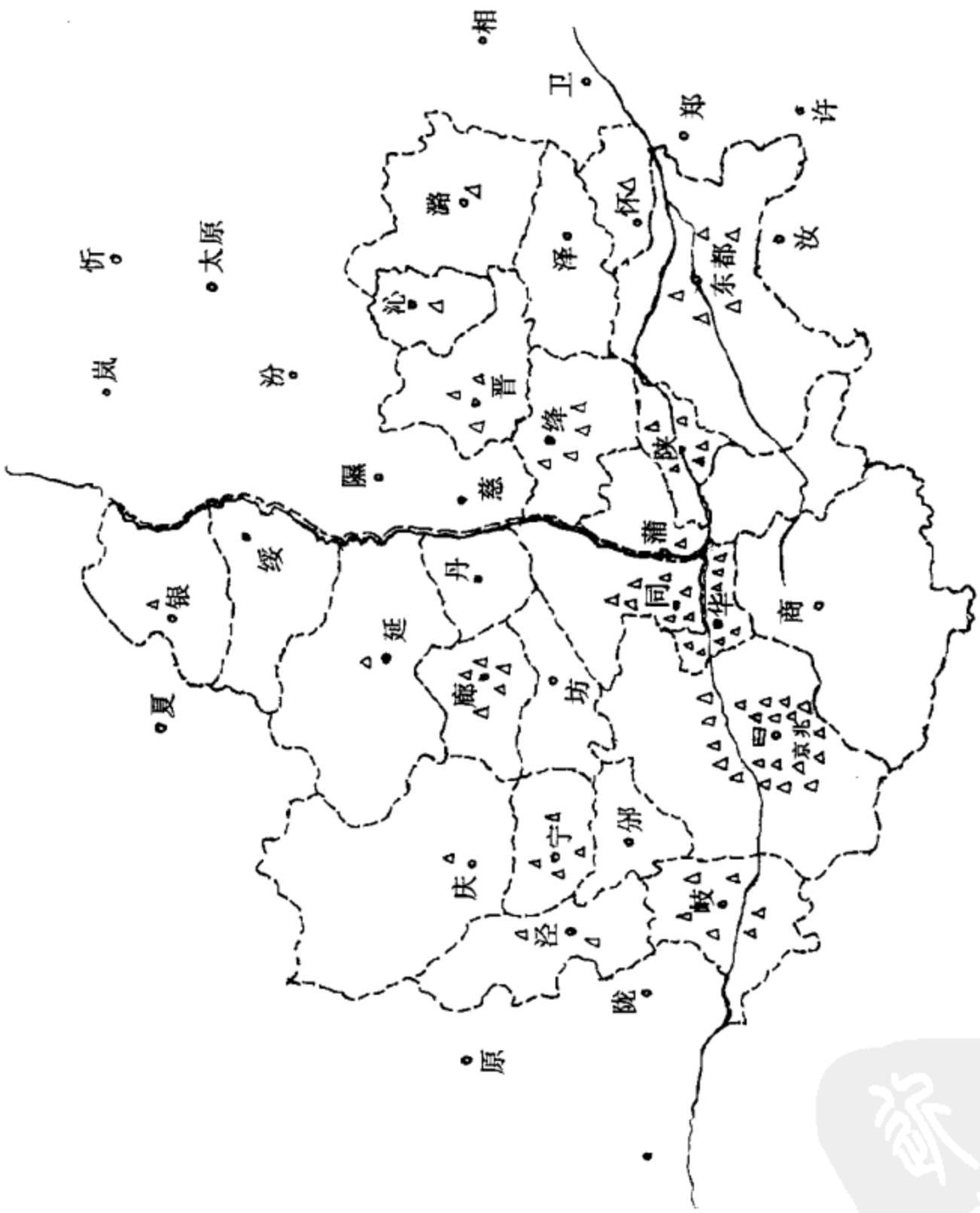
被留下来“长上宿卫”①。值得注意的是，在37位功臣曾经任职且所驻州确切的78个折冲府中，关内道独占54府，特别是京兆府、岐州（扶风郡）、华州（华阴郡）、同州（冯翊郡）等京畿四州就达40府。这一布局与长上军府的区域范围大体吻合②。从墓志来看，部分功臣就是通过长上的形式长期供职于中央。如李怀，释褐即为右卫扶风郡左果毅长上；宋庄，释褐左领军卫匡道府折冲，长上内供奉。（参见附图一）

玄宗朝又是一个府兵制逐步崩溃的时代。先天二年（713）府兵服役年限已由21—61岁缩减到25—50岁。开元六年（718）又诏折冲府兵每六年一简。开元十一年，因府兵逃亡，宿卫不给，唐政府遂抛弃府兵番上体制，募12万人，号“长从宿卫”，次年改称“骕骦”。开元十三年，以“骕骦”分隶十二卫，于是府兵更不简补，直至天宝八载（749）正式废弃。在这种情况下，折冲府虽职名不废，但却走上虚官化的道路。折冲、果毅只作为寄禄之衔，武官本人则转入禁军、藩镇等其他系统效力。这一渐变过程从武周时代即已开始，可能在开元十一年前后达到高峰。如雍智云，释褐后再迁至京兆甘谷府折冲，长留宿卫，此后累迁四府折冲，俱长留宿卫；茹义恩，官同州连邑府折冲，仗内供奉；王守节，释褐后累迁至彭池府果毅，而“职典禁兵”；王崇礼，累仕至河南金谷府折冲，墓志称其开元十九年从驾东都寝疾，薨于新丰，可见亦在长安宿卫。此外如高德，历任镇将、果毅、折冲，而墓志称其“虽官授外府，而身奉禁营”；张安生，历官果毅、折冲，墓志唯称其“帝居内宫，则警卫严肃；驾行外仗，则旗队克齐”。

---

① 参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8页；毛汉光《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5卷第1期，第111—171页，台北中正大学，1994年10月。

② 参毛汉光《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第111—171页。



附图一　唐元功臣所在军府示意图

如果以此为背景来考察唐元功臣，则不仅前述诸例，其他功臣虽未明言宿卫中禁，也不应排除早已脱离地方军府可能。特别是表九中万行、雍智云、李怀、刘玄豹、史思礼、何德、张登山、施宝、张金刚等人，在晋升至诸卫郎将之前都已迁入京兆或洛阳诸军府。而两京军府，据爱宕元先生分析，实为任职中央的武官寄禄之渊薮[①]。诸志之中，张登山转入京兆军府的时间明确为开元十年，这也许可以作为了解功臣整体活动状况的一个参照。如第二章所述，开元十年，玄宗曾经因为一场未遂政变而加强了宿卫制度，那么张登山等原本出自万骑系统的政变功臣，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京兆军府将领的身份回到北衙禁军系统，成为宫城宿卫的主力。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对于各项制度的调整告一段落，开始陶醉于亲身开创的盛世景象中。他频行大礼，告成天下，奖赏功臣成为其夸耀于世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年随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唐元功臣，此时作为一个整体不时享受特殊优待，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超迁机会。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泰山，“内外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赐一阶，登山官封赐一阶”[②]。功臣李怀、董怀义、王守言、王守节等都以扈从迁官。此后涉及对唐元功臣封赏的还有开元十七年十一月，拜五陵，“其唐元年两营立功官，三品已上与一子官，其四品已下选日优与进改”[③]。《朱保墓志》记载“廿二，主上亲谒五陵，授右领军卫左郎将，赐紫金鱼袋”，此次谒陵不见于正史记载，或为十七年之误。那么，它所反映的正是功臣们在这次谒陵活动中的收益。

•

① 氏著《唐代府兵制的考察》，《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第172—213页，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1995年。

②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88页。

③ 唐玄宗：《谒陵大赦文》，《全唐文》卷三九，第427页。

相似的出身、经历和职任使得唐元功臣在开元年间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频繁的赏赐和升迁又使得功臣们拥有了相当的政治实力，他们中的上层逐渐结合起来，形成我们所说的“唐元集团”。

2. 前期唐元集团的活动及其挫折

玄宗朝唐元集团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集团的形成始于开元初，中心人物是王毛仲。王毛仲在开元前期的活动，也基本可以代表当时唐元集团的整体情形。

王毛仲本官奴出身，高丽人。中宗景龙中，作为李隆基和万骑之间沟通的中介起到很大作用，故政变后擢为将军。玄宗即位后，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王毛仲在玄宗朝所居官职，正是玄宗本人在唐隆政变后掌握的两项关键性职务之一——“陇右群牧大使”的变相。“陇右群牧大使”和“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虽然属于不同的马政系统，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马政的不同归属与侧重，但其核心内容都是对于战马的控制。而战马和禁军，就是玄宗用以维持统治的核心军事力量。史称王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玄宗对他亦恩宠有加：“每入侍燕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塌而坐，玄宗时或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① 至开元十九年前，王毛仲已累加至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霍国公，内外闲厩监牧都使。

如前所述，王毛仲权力的来源是对马匹的管理。唐代马匹分为国马和禁马两个系统。所谓国马，是指由太仆卿以及嗣后的群牧使掌管的陇右九使六十五监以及京西八马坊所养马匹，禁马则

①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七年三月乙卯条，第6735页。

主要是殿中监及后来的闲厩使所掌握的仗内外闲厩[①]。开元以来，代表宫廷势力的闲厩使成为全国马政的最高首长，控制了马匹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部环节[②]。政变起家的玄宗深知这一使职的重要意义，因而在政权稳固以后，就直接将之交由心腹担当。王毛仲主持马政成效卓著，至开元十三年已使马匹总数由开元初的24万匹提高到43万匹。他对禁马的管理更为精心，史载其虽有外第，常居闲厩侧内宅。王毛仲通过控制禁马对禁军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再凭借与玄宗的特殊关系，遂成为前期唐元集团，即所谓“北门奴官”的核心。

被指为王毛仲党羽的有左领军将军押万骑葛福顺、万骑将军马崇以及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葛福顺唐隆政变之前为万骑果毅，立功后累擢左领军将军，仍押万骑。王毛仲以女嫁葛福顺子，二人遂成亲家。葛福顺等倚仗王毛仲多为不法。开元八年，葛福顺之子举明经及第，玄宗听说此事，特意专门对他进行考试，其子不知所对，考功员外郎李纳因此贬官[③]。考功员外郎不惜以身试法，对葛福顺网开一面，由此可以看出功臣们势力的强盛。另一功臣马崇在开元年间同样不可一世。史载“有万骑将军马崇正昼杀人，时开府、霍国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将鬻其狱”[④]。可见这一集团相与跋扈的情形。其余几人仅看官职都属南衙系统，但从“毛仲为上所信任，言无不从，故北门诸将多附之”[⑤] 以及“北

---

① 参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三部，《军事制度·唐前期马政》，第328—338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参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二章，《不断变革的马政机构》，第9—32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 《册府元龟》卷六五一，第7801页。

④ 《新唐书》卷一三〇，《裴漼传》，第4487—4488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七年五月条，第6785页。

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等记载来看，亦极有以诸卫将军押万骑的可能。前引薛莫、鲜于廉的情况可为佐证：薛莫玄宗朝累迁右骁卫大将军、左万骑使，开元十五年十二月死于任上；鲜于廉立功后迁右领军卫将军、北军使，开元十一年死，追赠右领军卫大将军。二人俱以南衙将领押北军。此外还应注意一下董怀义。董怀义，陇西人，父祖并不仕。政变立功后，解褐授游击将军，左卫龙交府右果毅。开元十四年薨于云麾将军、右威卫将军之位。董怀义政变后方解褐入仕，到开元十四年已升至三品将军，这种非同寻常的升迁速度得益于他的姻亲王毛仲的帮助。董怀义妻侯氏，“左羽林军郎将侯楚金之姊，霍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行殿中大监王毛仲之甥”①，董怀义显然就是凭借与王毛仲的关系，得以致身通显。就官职和出身而言，薛莫、鲜于廉、董怀义也都应是前期唐元集团的重要人物。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前期唐元集团的成员就其出身而言，并非都出自万骑两营，而是来自于万骑、十二卫与皇帝家奴三系统。他们在政变发生之前大都已经出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变的决策者或核心。政变成功后，他们没有像普通万骑士兵那样被外放，或短期外任后即回到中央，成为万骑高级将领以及与之配套的禁马长官。早年的同志经历是他们相与一心的基础，联姻又加固了这种关系，遂形成一种被称为“北门奴官”的政治势力，并在开元十三年东封后渐渐达到顶峰。

前期唐元集团存在的下限是开元十九年。开元十七年王毛仲求为兵部尚书，标志着前期唐元集团的势力已经溢出北衙，企求向南衙伸展。唐元集团相互联结的局面以及发展的强势引起了玄宗的警惕，并最终导致了前期唐元集团的覆灭。开元十九年春正月壬戌，玄宗下制，贬王毛仲襄州别驾，葛福顺壁州别驾，卢龙

① 《董怀义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235，第 1318—1319 页。

子、唐地文辰州别驾，李守德严州别驾，高广济道州别驾，并员外置，毛仲四子亦贬官，连累数十人。后诏杀毛仲于永州①。

对于这一集团的覆灭，有关文献都记载了其与宦官势力发展的冲突。“是时，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唯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官矣。杨思勗、高力士尤贵幸，思勗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而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其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② 为此，高力士等恨之入骨。史载王毛仲“妻产，尝借苑中亭子纳凉，玄宗借之。中官构之弥甚，曰：‘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③ 后王毛仲向太原军器监索要甲仗，玄宗恐其党为变，因皆贬官。王毛仲与高力士俱是玄宗家奴出身，北门禁军和宦官集团也都属皇帝私人体系，两集团在势力上扬的过程中产生势力之争实属必然④。

但是问题又不止如此，削弱功臣势力也是唐玄宗基于理性政治的一贯选择。从开元初到开元十九年，玄宗集中打击功臣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开元元年到二年，刘幽求、钟绍京等谋臣系统唐元功臣离开中枢机构，贬往地方。第二次从开元十年到十二年，姜皎、刘承祖、王守一等先天政变功臣坐王皇后之废，相继

---

① 参见《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 3254 页；《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第 4335—4336 页；以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九年正月条，第 679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八年末，第 6792 页。

③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 3254 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条有关王毛仲妻产子事所记与此略有不同，但实质则无异。

④ 参见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一章第三节，《唐代宫廷之兵马与宦官》，第 29—48 页，北京，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又氏撰《唐代宫廷防卫与宦官权力渊源》，载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第 45—58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贬死。第三次即开元十九年贬逐以王毛仲为首的一批武将系统唐元功臣。

历经宫廷变乱的玄宗对禁军的力量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唐隆政变后即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牢牢抓住禁军的兵权。真正掌权后，这一权力被一分为二，由家奴出身的王毛仲掌管禁马，万骑功臣掌管禁军，俱有得国之功，是最可靠的心腹，借以维护自身统治的安全。然而，这种安排存在着隐患，那就是两派有着共同渊源的势力结党。臣下结党是中央集权之大忌，掌握禁军与掌握禁马的人结党则尤其危险。一旦其忠实发生动摇或为人所用，就会成为皇权的强大威胁。王毛仲与葛福顺联姻使得这一隐患表面化，引起时人的普遍担忧。开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齐澣上奏："福顺典禁兵，不宜与毛仲为姻。毛仲小人，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患。"① 与高力士的言论如出一辙。玄宗对这一集团有着深厚的个人感情，但感情不能代替现实政治。一旦这一集团的利益威胁到统治，前期唐元集团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此外还应看到，虽然三次打击的对象都是功臣，但是，前两次的功臣都是处于决策中心的文臣，他们的沉浮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运作。事实上，如何认识唐玄宗开元年间中枢机构的政治斗争，一直是学术界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汪篯先生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认为："在姚崇用事的期间，匡赞玄宗的大臣，如刘幽求、张说之流，都相继被贬逐流窜。这主要的原因，较为明显地，是为了使玄宗的皇位更加安定。但是，在骨子里面，姚崇和这些功臣中间的互不兼容，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关于这一点，他们自己是否已有一种自觉，现在无从知道，可是这种冲突，却一定是存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七年五月条，第6785页。

在着的。”[①] 亦即用吏治与文学的不同出身和政见来解释开元前期中枢机构的人事纠纷与人员调整。而孙英刚先生认为，政变骤进与正统官僚之间基于出身背景和行政能力的矛盾，才是两个官僚集群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具体说来，就是姚崇等人是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正统官僚，这批官僚在维持政府职能运转、安定皇位、保持政局稳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特点是：级别较高、属能臣干吏、倾向稳定政局但是坚持使用合法的政治手段。与他们相对的是跟随玄宗用政变夺取政权的功臣们。这批功臣大多级别低、政治才干差、热衷于政治投机。玄宗意识到只能任用前一类官僚，才能开辟一个新的政治局面，这才是玄宗一朝功臣难得善终的主要原因[②]。笔者认为，这两派官僚之间确实存在基于出身、行政经验等方面的矛盾，但从皇帝的居中运作调度方面考虑，后一种解释无疑更有其合理性。在中央决策层面，玄宗不想顾及私人感情而任非其人。

唐元集团则不然，作为曾经共患难的亲兵将领，他们仍是玄宗可以信赖的力量。玄宗对于王毛仲集团的清洗，只是警戒其活动不得突破预定的权限范围，而无意将这一势力全部铲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开元十九年后对唐元功臣的继续封赏以及相关唐元功臣的个人经历中得到体验。

开元二十年十一月，玄宗祠后土，赐武德以来功臣后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③]。天宝六载祀南郊，功臣预奉方檀，咸陪大礼，受益颇多：李忠义由左龙武军中郎将升任将军，封渭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屈元寿由右龙武军中郎将升将军，封南浦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何德由右龙武军中郎将升将军，封庐江

① 《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② 参其惠赠笔者之《论相王府僚佐与唐前期的政局》，未刊稿。
③ 《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第 137 页。

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其他如刘玄豹受封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登山升冠军大将军，经城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加右龙武军大将军疑均在此时①。显然，对于王毛仲等人的惩罚只针对其个人，唐元功臣作为一个整体，依然不断受到奖赏。

另外，在打击王毛仲等人势力的同时，玄宗仍然选用唐元功臣作为禁军将领。这里仅举三例为证。首先是陈玄礼。陈玄礼在唐隆元年时任万骑果毅，是唐元功臣中级别较高的一个，但他在政变中的作用似乎并不突出②。陈玄礼性格淳厚，和前期集团保持着距离，因此得以在开元十七年后继续掌握禁军。此外还有白知礼。开元十五年，驾幸东都，白知礼留押玄武北门左厢屯营使。开元十九年，王毛仲等人被贬逐后，改任左监门将军兼右万骑使，直至开元二十二年薨于任上。章令信颇疑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政变后累拜右龙武军大将军，“宿卫玉阶，五十余年。”一生未离开禁军系统。这三个人物的仕途经历清楚地表明：虽然有部分人升降沉浮，但是玄宗并不想改变唐元功臣作为禁军将领的整体地位。就唐元功臣自身而言，这批人数众多的武将在玄宗朝的近二十年间已经分布于武官系统的各个层次，仅仅打击这个集团的上层并不会真正消除其势力，事实上，他们在禁军的发展还在方兴未艾之中。

---

① 分别见《李忠义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 76 页；《屈元寿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 77 页；《何德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 97 页；刘玄豹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 186 页；张登山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 103 页。

② 《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政变事云：“上乃与重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鸟、宝昌寺僧普润定策诛之。”《新唐书·玄宗本纪》及《册府元龟》略同。陈玄礼不预其中。

第三节 龙武军的建立与后期唐元功臣集团

1. 龙武军的建立与将领内部迁转机制的形成

前期唐元功臣集团的成员来自于万骑、十二卫和帝奴三个系统，并以帝奴为其核心，表明当时万骑系统唐元功臣的势力还不够强大，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势力。但是，以开元二十六年龙武军的建立为标志，唐代禁军体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龙武军的高级将领全部来源于当年的万骑系唐元功臣，内部迁转机制首先在龙武军系统建立。这些将领继续经营自己的势力，以集体的形式稳步发展，形成我们所说的“后期唐元功臣集团”。

开元二十六年是唐前期各项制度调整基本结束的时期。在军事方面，节度使制度已经确立并单独承担起边防任务。府兵制的瓦解以及由此引发的府兵番上宿卫制度的废弃，使得唐廷需要建立一支专职军队来承担戍守中央的使命。开元十二年骧骑的出现正是建立这样一种新制度的尝试。但是，骧骑出现在南衙禁军日渐没落的时期。在南衙府兵番上宿卫制度渐至废毁后，不断发展的北衙职业禁军已逐渐担负起原来南北衙共同负责的防务。这样，骧骑作为取代原来南衙卫兵的新生力量，其出现就显得不合时宜，因而也必然迅速地衰落下去①。

为了加强中央防卫力量，从唐元政变后已经取得心腹地位的万骑便从羽林军中脱离出来，正式成立为左右龙武军。

开元二十七年，龙武军正式设立官属，其将领来源，正是当年的唐元功臣。这批“后期功臣”在唐隆政变发生前大都还只是万骑的普通士兵，依靠政变之功解褐入仕；随着龙武军的独立

① 参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26—2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他们占据了中郎将的位置，并在天宝年间真正活跃起来。表八中，王泰、王守节、周思忠、李安乐、张德、朱保、万行、薛义、田福仙、雍智云、李玄德、张伏生、高德、齐子、刘感、张安生、李怀、刘玄豹、何德、史思礼、李忠义、屈元寿、张登山、徐承嗣、施宝、张金刚、王思泰等 27 人属于我们要探讨的这个集团。其中，张登山、张伏生、朱保三人留下了进入龙武军系统的具体时间。张登山，原任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开元二十七年授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张伏生，原任左骁卫郎将，开元二十九年授左龙武军中郎将；朱保，原任右领军卫左郎将，开元二十九年授左龙武军中郎将。这三人基本代表了后期功臣的状况：在前期唐元集团被贬逐时，他们大多都还处于折冲都尉一级（根据上文分析，不排除以折冲官职押领万骑的可能），大体也就在同一时期，他们被授予十六卫郎将，但只有到开元二十七年或稍后，他们才正式进入龙武军系统，担任中郎将一职。对照其卒年与终官可以看出，卒于天宝五载（746）之前的人终官均为中郎将，天宝五载开始有追赠的将军，而卒于天宝六载（747）之后的人无一例外是将军或大将军。显然，天宝六载祀南郊给了这批功臣普遍的升迁机会，使他们都进入高官行列。那么，天宝六载以后，当可视为后期功臣的鼎盛期。从这时起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期功臣依然作为一个内部联系紧密的集团存在，这一点可从表十根据诸功臣墓志所开列的宅居与婚姻情况得到证明。

表十

姓名	居　地	婚　姻	子　嗣
高　德	洛阳道政坊	不详	怀州怀仁府别将
李　怀	洛阳道政坊	王氏	智通：别将
刘玄豹	洛阳道光坊	高氏，县尉女	崇曜：龙武宿卫 崇晔：龙武宿卫 崇晖：别将 崇俊：左龙武宿卫

续表

姓名	居　地	婚　姻	子　嗣
李安乐	洛阳清化坊	不详	李亘：平阳郡羊邑府别将 李献：致果副尉、行右骁卫冯翊郡兴德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左龙武军宿卫
张　德	洛阳思恭坊	不详	荣琛：左领军卫威宁郡长松府左果毅，宿卫 荣芝：左武卫广陵郡新林府别将，宿卫 荣崇：左威卫河南府洛泉府别将，宿卫
齐　子	洛阳徽安坊	不详	景金：上郡义合府别将 景之：右骁卫高平郡沁水府别将右龙武军宿卫 景俊：西河郡陆壁府别将 景珍：河南府王屋府别将 景绣
张伏生	洛阳	广平宋氏	孝胤
王　泰	长安真安坊	李镇恶女	大琛
王守节	长安真安坊	斛斯氏 朱氏	元俊：京兆府圌谷府别将
周思忠	长安普宁坊	扶风太守云弘嗣从孙	庭玉、庭俊、庭诲
朱　保	长安普宁坊	不详	庭玉：常选 齐儿：左卫别将
雍智云	长安金城坊	不详	行忠：右龙武宿卫，别将
薛　义	长安金城坊	不详	光大、光俊

续表

姓名	居　地	婚　姻	子　嗣
徐承嗣	长安醴泉坊	不详	义进：别将 义礼：常选
李仁德	长安醴泉坊	不详	思敬：右骁卫中候 思让：右骁卫司阶
田福仙	长安翊善坊	不详	文超：常选 文质：别将
李玄德	长安翊善坊	不详	庭玉
屈元寿	长安翊善坊	王氏：麟山郡司马女	乾意：翊麾校尉，扶风郡雍北府别将 乾泰：致果校尉行右领军卫京兆府欢乐府别将 智海：兵部常选 智言、璨、琼、瑶
李忠义	长安翊善坊	屈氏：赠右领军卫翊府右郎将屈雅之女 南氏：东莱郡司马南彻之女	敬仙：常选 敬福：别将 敬寿：别将，宿卫
张金刚	长安大宁坊	李氏：赠常山郡司马李岑之女①	仙鹤：洛交郡银方府别将 仙周：冯翊郡郊城府别将 仙童：京兆府义丰府别将 仙宝：京兆府伏波府别将
方元瑾	长安大宁坊	不详	不详

① 《唐陇西郡李夫人墓志》，王育龙：《唐长安城东出土的康令恽等墓志跋》，《唐研究》第六卷，第395—4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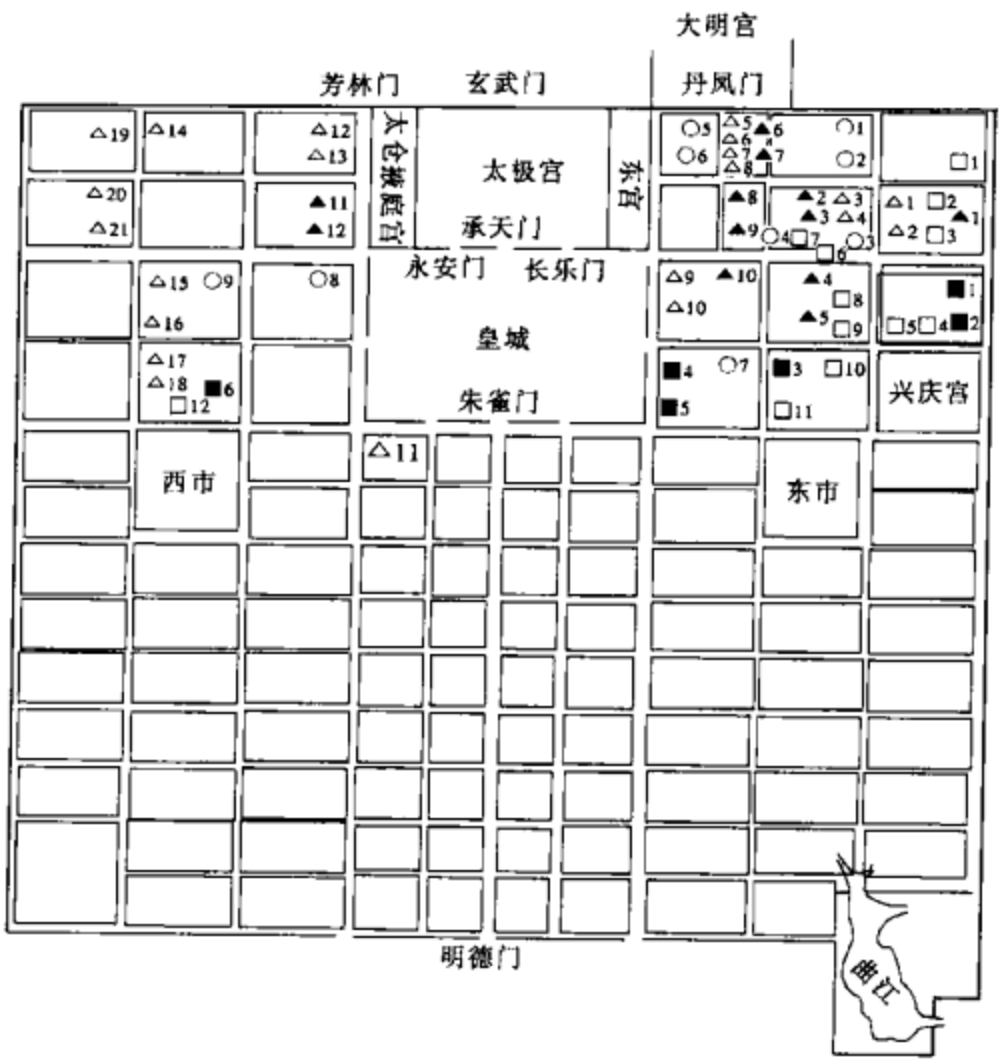
续表

姓名	居　地	婚　姻	子　嗣
史思礼	长安兴宁坊	苏氏	元柬：长上，闲厩修造 元谅：别将 元忠：别将
刘　感	长安永兴坊	不详	秀
万　行	长安永兴坊	南阳秘氏	万岁
施　宝	长安太平坊	张氏	贤秀：左龙武执戟
何　德	长安金光坊	不详	神想：长上果毅
章令信	长安浐川坊	不详	不详
张登山	不详	不详	仲仙：别将 景仙：折冲 皓然：别将
张安生	不详	王氏，太原郡君	庭训

通过表十我们注意到，功臣们的居住地相当集中。在长安者聚集于承天门街以北的各坊中，其中又以翊善里最为密集，住田福仙、李玄德、李忠义、屈元寿四户；其次，真安里[①]、永兴里、大宁里、普宁里、金城里各住两户。在洛阳者则居住于洛水北岸宫城和皇城东侧相互连接的道政（两户）、道光、清化、思恭四坊[②]。（参附图二、附图三）

① 传世文献所载长安里坊中无真安，而有贞安里，武后朝改为修德里，疑即此。参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第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 参见诸人墓志及《增订两京城坊考》相关诸坊。



附图二　唐前期内廷（准内廷势力）在长安的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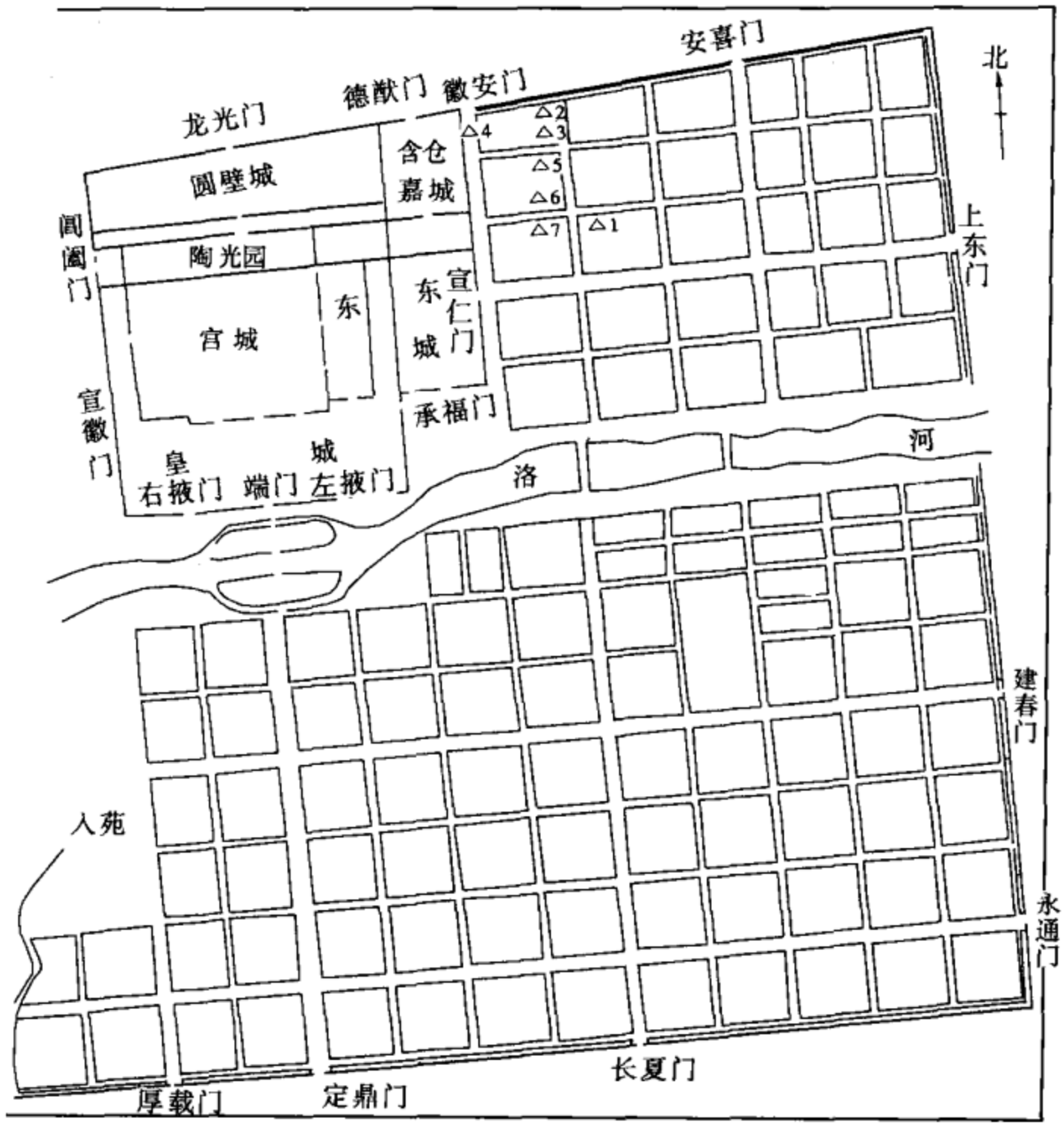
△　禁军宅
△1 王毛仲宅
△2 史思礼宅
△3 方元瑾宅
△4 张金刚宅
△5 李忠义宅
△6 田福仙宅
△7 屈元寿宅
△8 李玄德宅
△9 万行宅
△10 刘感宅
△11 施宝宅
△12 王泰宅
△13 王守节宅
△14 鲜于廉宅
△15 雍智云宅
△16 薛度宅
△17 薛莫宅
△18 徐承嗣宅
△19 葛福顺宅
△20 周思忠宅
△21 朱保宅

▲　宦官宅
▲1 高力士宅（华封观）
▲2 常无逸宅
▲3 俱慈顺宅
▲4 苏思勖宅
▲5 孙常楷宅
▲6 杨思勖宅
▲7 高力士宅（保寿寺）
▲8 高廷福宅
▲9 孙志廉宅
▲10 王睿宅
▲11 雷氏宅
▲12 陈忠盛宅

□　王子宅
□1 十王院
□2 庆王院
□3 荣王宅
□4 成王千里宅
□5 申王捴宅
□6 岐王范宅
□7 宁王宪宅
□8 恒安郡王宅
□9 申王捴宅
□10 宁王宪宅
□11 薛王业宅
□12 申王捴宅

■　公主宅
■1 凉国公主宅
■2 蔡国公主宅（九华观）
■3 建平公主宅
■4 长宁公主宅（景龙观、玄真观）
■5 太华公主宅
■6 太平公主宅（陕王府）

○寺观衙属
○1 大安国寺
○2 左教坊
○3 兴唐寺（罔极寺）
○4 太清宫（玄元皇帝庙）
○5 右教坊
○6 光宅寺
○7 礼会院
○8 昭成观（太平观、太清观魏国观、大崇福观）
○9 太清观



附图三　唐元功臣在洛阳的宅居示意图

△1 张德　　△2 高德　　△3 李怀　　△4 王元楷

△5 刘玄豹　　△6 宋知感　　△7 李安乐

居住地的相对集中可能出于上直方便的考虑，但也反映出功臣们彼此联系的紧密。特别是居住于翊善里的李忠义前妻即同居一里的屈元寿之妹，他们二人以及住兴宁里的史思礼墓志均由申屠洮撰写[①]，更显示出后期唐元集团成员关系的非同寻常[②]。此外，李忠义继夫人南氏、屈元寿夫人王氏、张金刚夫人李氏俱为郡司马之女。通过墓志我们知道，唐元功臣的父亲例赠郡司马，因而这三位夫人亦令人怀疑是唐元功臣的姊妹。联系前期功臣中王毛仲与葛福顺、董怀义联姻的情况，也许暗示着唐元功臣之间存在着一个通婚圈，而婚姻关系也正是他们加强联系、巩固地位的一个手段。可以说，高力士等人描绘的“北门奴官，豪者皆一心”的状况依然存在。

然而，这一时期，唐元功臣集团却已经不再引起皇帝的疑惧，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北衙禁军内部迁转机制的建立中得到解答。

所谓“内部迁转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北衙禁军将领的专职化，即禁军将领不再向其他军事系统发展；其次，北衙禁军特别是龙武军将领都从本军内选拔，从而保证了系统内的仕进特权。

唐玄宗以前，北门禁军时而作为精锐之师开赴疆场，北门将领也多有战争经历，可以出征入宿。这种情形是与唐前期整体防务形势相一致的。唐自贞观四年后成为东亚共主，边疆没有强势的敌对民族，因而在边境仅维持小规模的镇戍部队，遇有战事则

---

① 参见史思礼、李忠义、屈元寿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75—77页。

② 事实上，前期功臣集团的居住地也很集中。在长安者如葛福顺，住修真坊；鲜于廉，住安定坊；薛莫，住醴泉坊；王毛仲，住兴宁坊；都在承天门街以北宫城和皇城东西诸坊。在洛阳者如宋知感，住洛阳道光坊；王元楷，住洛阳道政坊；都在洛水北岸宫城和皇城侧近（参见附图二、附图三）。这种分布格局和后期功臣完全一致，反映出唐统治者对于功臣宅居和整个长安城空间布局的整体规划。

临时征兵派将。对于将领而言，出征只是临时性的差遣，战争结束后，他们将回到中央宿卫。这一点，对于十二卫将军如此，对于北门禁军的将领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才能一方面典领禁军若干年，另一方面又频频参加边地战斗。但是，随着吐蕃、后突厥汗国以及东北契丹等族的兴起，唐朝边疆压力大增，被迫在边境长期屯驻，与之相持。这种需要最终促成了开元年间节度使制的形成。节度使长驻防区，在任职期间不可能还朝宿卫，这就使得边将和禁军将领成为两个系统，不再能够互相转换。禁军将领专职化的趋势在开元前期已经出现。我们看到的前期功臣中，只有王毛仲曾在开元九年以太仆卿身份担任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参与讨伐康待宾。并且，王毛仲的这种身份基本属于礼仪性质，实际工作则主要由王睃和张说负责①。

史籍中还记载有三次禁军将领在开元时率军出征之事，但细检前后史实，可以判定这三个相反的例子都不能证明禁军将领是单独出征。

第一次是开元二年（714）十月，吐蕃侵扰渭源，玄宗欲亲征，遂任命“卫尉卿兼简（检）校左金吾大将军王毛仲为左一军总管，右金吾将军康海源为副；左武卫大将军李昌为右一军总管，左武卫将军马卫为副；左羽林大将军赵成恩为左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卫（当为“右领军卫将军”之误）秦义礼为副；右羽林将军杨敬述为左三军总管，右领军将军鲜于庭诲为副；左羽林将军马崇为右三军总管，右监门将军执失善光为副。”② 其中，至少王毛仲、马崇可以明确为前期功臣，其余如赵成恩、杨敬述也在禁军系统。但是，这次针对吐蕃的战争是以玄宗亲征的形式

① 参见《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卷九七《张说传》，第3049—3057页；卷九三《王睃传》，第2985—2989页。

②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第1407页。

安排的，禁军作为亲兵随从皇帝原本属于分内之事，不能作为禁军将领参加边地战争的证据。并且，随着边境警报的解除，玄宗也取消亲征的计划，因而当初安排的随从将领也并未成行。

第二次是开元二十年（737）九月。《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年九月条记载葛福顺曾于是年参与讨伐勃海靺鞨："勃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如其可信，确实可以证明前期功臣中不止王毛仲一人参与边地战争。但是，此事在《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靺鞨传》记载为："二十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靺鞨传》的记载基本与此相同，则这次讨伐大武艺的战争中，唐朝作为宗主国仅仅是表明立场，具体的战斗则以当地少数民族军队为主，葛福顺不与其事。

究竟孰是孰非呢？我们不妨先揣摩一下唐朝对于这次冲突的整体态度。按大武艺此次兴兵登州，与此前他和其弟大门艺的矛盾有关。开元十四年，大武艺征黑水靺鞨，大门艺与之意见相左，并因此投唐，授左骁卫将军。大武艺寻遣使朝贡，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玄宗密遣门艺往安西，而谎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此后其事泄露，武艺追论不已，玄宗又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①]。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唐朝当时对东北地区采取消极战略，并不想认真与大武艺为首的粟末靺鞨结怨，在二者之间的纷争中也一直采取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第5361—5362页。

调和策略[①]。因而，我们推测，这次讨伐大武艺，朝廷也不会立场鲜明地支持大门艺。换言之，唐廷只是任由挑起事端的大门艺到幽州募兵，并以新罗酋长率本国军队配合，从而将这场战争限制在蕃部之间；而不会派遣禁军将领出征，轻易地卷入东北部族之间的矛盾。

另外，在此前一年，葛福顺刚刚因为党附王毛仲被贬为璧州员外别驾，短短一年之后复为右领军将军出征，也令人怀疑。对于此事，胡三省认为："去年春，葛福顺方以党附王毛仲贬，今则仍为宿卫，盖毛仲既诛，福顺等复叙用也。"汪篯先生也持同样看法[②]。我们不否认唐朝一直有犯罪官员复蒙起用的例子，但是，葛福顺此前从未有边地作战的经验，又是王毛仲最重要的同党，朝廷是否急于起复他参加东北边境的战争值得怀疑。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谓开元二十年葛福顺领兵出征的记载并不可信。

第三次是关于左监门将军充右万骑使白知礼参战的记载。白知礼传世文献无载，但有两方墓志存世，俱藏于千唐志斋。其中一方是与后夫人张氏合祔志，写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张氏死后。志称：

> （唐隆政变后），拜游击将军，行右卫原州彭阳府右果毅都尉。寻迁忠武将军行右金吾卫翊府中郎将。顷以边烽相望，虏骑纵横，……天子闻陴择帅，按剑厉军。谁其当之？公是拜也。……彼三鼓而势衰，我百战而气勇。浃旬献囚，帝实嘉之，乃降诏曰："卿忠烈与国同忧，闻扫贼徒，固多

① 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第136—137页。陈寅恪先生虽然重点分析唐朝与高丽的关系，但就"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而言，靺鞨与高丽有相似之处。

② 汪篯：《玄宗时期之禁军及其统帅》，第247—258页。

庆快。”擢右清道率府率，借紫金鱼袋。又奚霫背叛，实多侵略，公授钺龚伐，群凶殄歼。重下诏曰：“小番无仪，比存含养，忽致翻动，天实诛之。塞下边人，从兹无事。”授左监门卫将军，仍充右万骑使①。

似乎白知礼至少两次参加边地战争。是否真的如此呢？在白知礼的另一方墓志中，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

唐祚中兴，授公为游击将军、右金吾郎将，复转中郎。开元十三年，东封登檀，改右清道率府率。十五年，驾幸京，留押玄武北门左厢屯营使，赐紫金鱼袋。……十七年，敕令内使送紫袍金带……十九年，銮舆幸洛，改左监门卫将军兼右万骑使。寻廿一年，特加三品，制授可左监门卫将军，勋使如故。其年幽府破奚，以表贺，皇帝批云：“卿尽忠列，与国同忧，闻扫贼徒，固多庆快，所贺知。”②

这方墓志写于开元二十二年（734）白知礼死后，是他与前夫人刘氏的合祔志。从志文看来，白知礼迁右清道率府率是在开元十三年东封后的恩奖，与战争无关。而皇帝有关“闻扫贼徒，固多庆快”的诏书，也并不是对白知礼战功的称赏，而是对他所作破奚贺表的回复。

究竟以哪方墓志为准？我们看到，前引第一方墓志在首次表彰白知礼战功时，并未具体指明作战对象。但从下文看来，战争的目标似乎也是奚人。如果我们相信白知礼迁右清道率府率（无论因何种缘故）是在开元十三年，那么，这次战争当发生在这一年以前。而求诸典籍，我们看到，开元十年，唐朝册封奚首领饶乐都督李鲁苏为饶乐郡王，并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出降李鲁苏。开元十四年春正月癸亥，改封契丹松漠郡王李召固

① 《白知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529，第1519—1520页。

② 《白知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15，第1443页。

为广化王，奚饶乐郡王李鲁苏为奉诚王，封宗室外甥女二人为公主，各以妻之。在此期间，唐朝与奚一直关系良好，没有战争发生。唐朝与奚交恶是在开元十八年，“五月，契丹衙官可突干杀其主李召固，率部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亦随西叛。奚王李鲁苏来奔，召固妻东华公主陈氏及鲁苏妻东光公主韦氏并奔投平卢军。制幽州长史赵含章率兵讨之。”战争直至开元二十年才有结果，“三月，信安王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① 由此可见，白知礼的第一次战功并不可靠。

另外，从墓志书写时间来看，前引第二方墓志写于开元二十二年白知礼刚刚去世后，所载白知礼经历无疑应该较七年之后的另一方墓志为准确。

据此我们推测，两志都引用的皇帝诏书实下于开元二十年，为玄宗对白知礼贺表的批答，第一方墓志中所谓“小番无仪，比存含养，忽致翻动，天实诛之。塞下边人，从兹无事”的诏书，看起来并不像给白知礼本人，而是对于这场战争的总体评价。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白知礼并未参加对奚人的战争，作为典领禁军的唐元功臣，而只是以朝官的身份向皇帝表示了祝贺而已。

通过对上述北衙禁军将领参与边境军事行动的考辨我们可以确认，开元前期禁军将领专职化的趋势确实已经出现。北衙禁军不再担负征战之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皇帝宿卫部队。与之相应，其将领也因此远离战争，以政治忠诚度而不是军事能力为主要考查指标。

如前所述，从唐初开始，统治者一直依靠任用亲信担任禁军将领来保证禁军的忠诚。但是，这种方式在韦后临朝时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景龙三年（709）中宗去世，韦皇后称制。她将

①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第166页。

禁军高级将领全部换成韦家宗族，分别以侄韦播、韦睿和侄婿高嵩担任羽林军将领。韦播等人都兴起于中宗一朝，没有军事经验，对禁军缺乏了解。押万骑营果毅李仙凫、陈玄礼、葛福顺得不到重用，于是归附了在野的相王之子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导致唐统由中宗向睿宗一系嬗替。

唐隆政变表明，仅仅依靠私人关系掌握禁军的上层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机制来确保整个军队上下同心，共同忠诚于皇帝。开元元年（713），唐玄宗亲政。玄宗依靠两次政变取得权力，对于禁军力量有着深刻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也通过武后末年以来的历次政变看到了禁军不稳的症结所在，开元年间禁军内部选官体制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的。

在禁军中建立内部选官体制的努力首先从万骑营开始。目前已知万骑营时期明确可考的将领有左领军将军押万骑使葛福顺、左骁卫大将军押左万骑使薛莫、左监门将军兼右万骑使白知礼和右领军卫将军兼北军使鲜于廉[①]，都出身于唐元功臣。龙武军时期可考的中郎将以上官员共 28 人，则全部具有唐元功臣的身份。这 28 位将军通过唐隆政变步入仕途。开元前期，他们已经以府兵将领的身份（如折冲、果毅）典领禁军，龙武军建立编制后则正式转入这一系统，从此不再向其他系统迁转，最后终老于龙武军高级将领之位。

综合前后两期的将领人选情况可以看出，从开元初开始，万骑系统将领由唐元功臣中选拔大约已经成为惯例，龙武军的建立更使这一惯例制度化。一方面，龙武军将领都在军内产生；另一

---

①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 3255 页；《薛奠墓志》，《全唐文补遗》第 5 辑，第 349 页；《白知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415，第 1443 页；开元 529，第 1519—1520 页；《鲜于廉墓志》，《全唐文补遗》第 2 辑，第 454 页。按《墓志》，鲜于廉任北军使，北军即北衙禁军，原则上既可以指羽林军，也可以指其分支机构万骑。但是当时羽林军已经有专职将军，因而这里的北军使应该同于押万骑使。

方面，任职于龙武军的将领也不再向其他军事系统发展。这种将领选任体制，我们不妨称之为“内部迁转机制”。

龙武军将领“内部迁转机制”的形成，最终导致了员外官在龙武军中的合法存在①。通过对龙武系统员外官合法化过程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龙武军在这一时期的定位。员外官开创于高宗时代，它在中宗、睿宗两朝使官员数量大增，导致国库空虚，吏治败坏。玄宗一朝，曾经五次颁下诏书整顿员外官，其中两次涉及准许保留员外官的特殊部门。开元二年（714）五月，“敕诸色员外、试、检校官，除皇亲及诸亲五品以上，并战阵要籍、内侍省以外，一切总停”②。这条诏书涉及三类人员。其中，“皇亲及诸亲五品以上”是对皇室及其姻亲的特殊照顾；“战阵要籍”则指在边地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将士③。这两类员外官的设置作为优奖措施，可能遍布于南衙各个职官系统。

内侍省的情况则不同。唐代内侍省已经成为完全由宦官所把持的独立机构，其品官员额不足百人。虽然少数宦官可以进入监门卫等其他系统，但是，大部分宦官还是任职于内侍省，或者以内侍省官职为阶官。这就使得内侍省成为一个基本封闭的官僚系统，其有限的品官员额与数量庞大的宦官群体升迁需要之间的矛

---

① 有关员外官的研究，参见朱长义：《唐代前期的员外官制》，《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63—67页；《唐代少数民族员外官制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第69—72页。

② 《唐会要》卷六七，《员外官》，第1179页。

③ 要籍，唐后期节度使属官名，在唐前期则指某项事物所特殊需要的人才。《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二月条胡注云：“要者，须其用；籍者，借其力。”《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其在军镇要籍，不得赴选，委节度使诠试”；《唐大诏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音声人及丁匠等，非灼然要籍，并量事减省”等均指此，《唐会要》此处所云战阵要籍亦指此。

盾，主要通过设置员外官的方式加以解决[①]。与前述两类不同的是，内侍省员外官只能设置于系统内部。开元二年敕文在废除大部分员外官的同时将内侍省员外官合法化，就是鉴于内侍省作为封闭的职官系统所形成的特殊需要。

天宝七载（748），合法使用员外官的范畴又发生重大变化："内外六品以下员外官，至考满日，一切并停，各依选例。自今以后，更不得注拟。其皇亲幼小及诸色承优授官、军功、伎术、内侍省、左右龙武军并诸蕃官等，不在此例。"[②] 这道敕文中，皇亲幼小及诸色承优授官大体相当于开元二年敕中的第一项；军功相当于战阵要籍；内侍省不变；诸蕃官、伎术和左右龙武军则为新增项目。诸蕃官即少数民族首领归附唐朝者，他们被授予员外官，一方面可以表明唐王朝对其政治地位的认可，另一方面则保证他们不能够对唐朝的官僚体制及其政治运作产生实质性影响。伎术官指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部门掌握专业技能、从事专门性工作的官员[③]。《唐会要·伎术官》云："故事，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唯得本司选转，不得外叙。"伎术官被限制分流，面临着和内侍省相同的正员官员额不足问题，员外官的合法化便也成为必然。

龙武军的情况有类于内侍省和伎术官。龙武军由万骑发展而来，军额当在万人左右。左右龙武军各设大将军一员、将军二

---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第4755—4756页；参见余华清《中国宦官制度史》第五章《隋唐时代的宦官制度》，第225—2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唐会要》卷六七，《员外官》，第1179—1180页。

③ 《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第1183页。参见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1—45页。

员、中郎将二员、郎将二员、校尉以下至队副五十五员①。虽然没有像伎术官那样明确的制度规定，但从实际操作来看，龙武军将领也是“本司选转，不得外叙”。这就使得取得任职资格的人远远多于官员总数，只能用设员外官的方法加以解决。换言之，允许员外官的合法存在也就在客观上承认了这一系统的内部迁转特质。由此看来，天宝七年敕的意义就在于以法律形式将龙武军业已存在的内部迁转机制明确下来并予以保障。

龙武军将领的内部迁转机制保证了他们的仕进特权，只要忠诚于皇帝，他们的升迁就有可靠的制度保障，不必再希求政变带来的非分之福。这种机制最大限度地使得具体禁军将领对于皇帝的忠诚演变为整个禁军体制对于皇权的忠诚，促成了玄宗一朝的政治稳定。

当然，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建立并不能完全消弭变乱，事实上，天宝十一载（752）还发生过一次涉及龙武军的变乱。有关这次事件，以《旧唐书》卷一〇五《王鉷传》记载最详：

> （天宝）十一载四月，锷与故鸿胪少卿邢琦子绛情密累年，绛潜构逆谋，引右龙武军万骑刻取十一月（当为日）杀龙武将军，因烧诸城门及市，分数百人杀杨国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陈希烈等。先期二日事发，玄宗临朝，召鉷，上于玉案前过状与鉷。鉷好弈棋，绛善棋，鉷因锷与之交故，至是意锷在绛处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贼官捕之。万年尉薛荣光、长安尉贾季邻等捕之，逢锷于化度寺（在义宁坊，金城坊西侧）门。季邻为鉷所引用，为赤尉，锷谓之曰：“我与邢绛故旧，绛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请足下勿受其言。”荣先等至绛门，绛等十余人持弓刃突出，荣先等遂

① 《唐六典》卷二五《羽林军》，第642—644页；《新唐书》卷四四，《职官志》，第1903—1904页。

> 与格战。季邻以锌语白铁，铁谓之曰："我弟何得与之有谋乎！"铁与国忠共讨逐绰，绰下人曰："勿损大夫下人。"国忠为剑南节度使，有随身官以白国忠曰："贼有号，不可战。"须臾，骠骑大将军、内侍高力士领飞龙小儿甲骑四百人讨之，绰为乱兵所斩，擒其党善射人韦瑶等以献。国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铁委任深，必不与之知情，铁与锌别生，嫉其富贵，故欲陷铁耳。

《新唐书·王铁传》以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相关部分略同于此。从有关记载来看，这次变乱的主使者是南衙官员，政变针对南衙宰相，而不是皇帝，它凸显出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但毕竟不威胁皇位本身，故而玄宗对于这次变乱处罚较轻；其次，政变的组织者邢绰、王锌都不是龙武军官，他们利用龙武军士兵起事，甚至还要先期杀死龙武将军，可见在他们看来，龙武将军不可能与之合谋；再次，变乱者的进攻目标是诸城门及市，反映出他们的实际目的是制造混乱，而非攫取皇位。这些都与此前北衙禁军的历次政变有本质的不同。龙武军士兵参与其中，应视为随着北衙禁军的壮大，它已成为京城最主要的武装力量，无论什么性质的政变，都要假手于这支军队。由此看来，这次政变的发生并不妨碍我们对于龙武军建立准内廷体制发挥了稳定皇权作用的判断。

另一方面，内部迁转机制也限定了禁军在其他系统的发展。检索有关史料和墓志，从开元二十七年（739）到"安史之乱"爆发，没有任何一个龙武将军有在外作战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一个边镇将领入朝为龙武将军。由于远离战争，龙武将军们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荣誉，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明显小于前朝，从而能够在玄宗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远离猜嫌之地，安享天宝繁华。

2. 玄宗朝后期分层禁卫体系的构建

与此同时，原来势同水火的宦官和奴官也找到了彼此势力的

平衡点，不再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具体说来，就是以宦官统领的内飞龙兵为内核、禁军的两个分支为中层和外围的分层防务体系在开元天宝时代逐步形成。

玄宗朝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是内飞龙兵的兴起。内飞龙兵是随内飞龙厩发展起来的武装。唐代前期禁马系统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分合过程。唐初天子之御有左右六闲和左右六仗两个系统。有关左右六闲，《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尚乘局条记载为："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骃骝，五曰驮骟，六曰天苑。"在此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左右仗厩系统："左右仗厩：左曰奔星，右曰内驹。两仗内又有六厩：一曰左飞，二曰右飞，三曰左万，四曰右万，五曰东南内，六曰西南内。园苑有官马坊，每岁河陇群牧进其良者以供御。"① 赵雨乐先生根据左右飞骑、左右万骑名称类似于左右仗厩之左飞、右飞、左万、右万，而左右骁卫及左右武卫之飞黄旗、驮骟旗类似于左右六闲之飞黄、驮骟，推断唐初禁军整编时，以所骑马匹来标明军队性质②。是则唐初左右仗厩所供马匹，主要为配合玄武门新置之禁军；而左右六闲之马匹，则用来装备南衙卫队。

但是，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左右六闲发生变化，演变为飞龙、祥麟、凤苑、鹓鸾、吉良、六群，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对于这种变化，赵雨乐先生认为是由于武则天以女主专政，不满其统治的官兵甚多，单单依靠北门禁军、禁马系统不足以维护统治，故立意提拔一新的防卫系统，在仗内六闲之诸厩内选取飞龙厩为宫廷保障，遂以宦官为之主管。他还认为，飞龙厩出现之后，仗内六闲成为亲信，而原有亲信意

①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页。

②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32—38页，北京，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李锦绣也有类似看法，参见《唐代财政史稿》上编，第1152—1155页。

味的左右仗厩转成为疏远的仗外闲厩。

笔者同意赵雨乐先生关于左飞、右飞、左万、右万分别对应于左右飞骑和左右万骑的判断。但是，左万、右万作为厩马的名号必定出现在中宗神龙三年万骑改名后，此后不久，左右万骑便通过唐隆政变而获得势力的极大上升。那么，为之供应马匹的仗厩地位转低的说法就难以成立。因此我们认为，从现有材料能看到的只是内飞龙厩的崛起，所谓仗内六闲与左右仗厩亲疏关系颠倒的时间还要大大后延。

内飞龙厩崛起的时间虽发端于武后朝，但似乎一直未能发挥重要作用。从武周朝直到开元十九年以前，史料中提到飞龙厩仅有两处。一是《雍录》卷五玄宗平内难条："临淄王遂与幽求等出苑南门，……韦后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后首。或曰：后入飞龙厩，为厩士所斩。"有关此事的记载又见于两《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相关部分，均取入飞骑营说。笔者也支持入飞骑营说。因为在此之前的神龙三年，太子重俊政变中，中宗即因为登上玄武门楼，获得留军飞骑的支持而幸免，这对于韦后来讲，应属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其次，《雍录》中有关韦后入飞龙厩的说法可能受代宗即位过程的影响。据《旧唐书》卷一一，肃宗弥留之际，张皇后欲发动宫廷政变，代宗进入宦官统领的飞龙厩，发动反政变成功，取得帝位。《雍录》作者对于韦后的记载很可能掺入了此事的影子。另一条有关飞龙厩的记载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开元十八年）二月丙寅，大雨雪，俄而雷震，左飞龙厩灾。"除了证实飞龙厩的存在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直到玄宗开元十九年（731）王毛仲被贬，内飞龙厩以及其背后的宦官势力才开始凸显出来。王毛仲被贬之前担任内外闲厩监牧都使，这一职务的管辖范围包括内外十二闲、八坊、四十八监、沙苑等监及诸牧。内飞龙厩虽然自武周朝即由宦官统领，但在王毛仲权势高涨的情况下，其独立性必然大大削弱。所以以高

力士为首的宦官才会排挤王毛仲等功臣势力，并最终导致开元十九年前期功臣集团的覆灭。在此之后，内飞龙厩的势力得到迅速增长，这从高力士所带“三宫内飞龙厩大使”一职中可以看出来①。

“三宫内飞龙厩大使”之职，据赵雨乐先生的解说，与太极、大明、兴庆三宫之间夹城的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三宫联防系统有关。配合以夹城为主的东、西、南三内联防系统，内飞龙厩被分别设置在三内之侧，以备万一出现的紧急情况。他引用了《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760）六月条胡注的说法：“夹城，开元二十年（732）所筑”，但又认为“由大明宫往兴庆宫之夹城，若自开元二十年始兴筑完成，则兴庆宫外之飞龙厩，当亦至早成立于此年以后。兴庆宫为玄宗登位为帝后，最先听政之地方，其间长达数十年，然后始转往大明宫，则大明宫北，夹城以外之飞龙厩则建造得更晚了。”并推断大明宫北之飞龙厩大概建造在开元天宝之际②。这一推断是有问题的。检索史料我们知道，玄宗即位之初住在西内，从开元二年（714）起住大明宫，直到开元十六年（728）才迁居南内兴庆宫。大明宫以北飞龙厩的设置，很可能早于兴庆宫。如果我们把开元二十年作为兴庆宫外飞龙厩的建立时间，则“三宫内飞龙厩大使”大约也就出现在同一时期，恰恰与前期唐元功臣受到挫折的时间吻合，其中透露出的政治信息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内飞龙厩中负责养马者称为飞龙小儿。按《通鉴》卷二一九胡注：“凡厩牧五坊禁苑给使者皆谓之小儿。”现在我们所知唐玄宗时期的飞龙小儿只有宦官李辅国，这似乎意味着飞龙小儿是由宦官组成的。尽管如此，飞龙小儿被称为“甲骑”，为武装骑兵，

① 《高力士神道碑》，《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35—37页。

②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15—29页。

也就成为一支可以随时起用的机动兵力。前面我们说过，王毛仲等前期功臣集团被贬首先是宦官对奴官的胜利，以亲信高力士出任这样一个使职，显示出皇帝对于这支力量异乎寻常的重视。①

内飞龙厩真正显示力量是在天宝十一载（752）。当时，邢縡与龙武万骑谋杀龙武将军，以其兵作乱，被高力士带领的四百飞龙小儿讨平②。这意味着到了天宝时代，内飞龙厩系统已经成长为一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禁军的力量。这支力量由中官统领，较之武臣更得皇帝信任，万骑作为天子贴身警卫的地位也就被由宦官统领的内飞龙兵取代。开元初期，王毛仲权倾朝廷，诸王每相见，假立引待。开元十九年后，北门奴官中再也没有产生像王毛仲那样的人物。相反，高力士地位如日中天，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二人地位的嬗替清楚地反映了内飞龙兵接替万骑成为最亲密内帷防护力量的过程。

龙武军退居中层，羽林军也随之退后一步，成为外围防护力量。两军之间分别作为中层与外围的关系，可以隐约由玄宗一朝二者士兵选拔区域的不同得到体现。开元十二年（724），玄宗诏曰：“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这里“京旁州府”无疑应该指京师及其周围地区。其具体范围，我们可以从一些实例略作推测。开元二年，玄宗欲亲征吐蕃，诏曰：

> 戎狄凭陵，每劳征戍，比兴师旅，犹未扫除。……今欲亲按边疆，躬行吊伐，宜令朝廷招募勇夫壮士拔萃逸群者，称为屯卫飞骑，且各量与赐帛，行回之日，简入羽林。……

① 赵雨乐《唐代宫廷防卫与宦官权力渊源》，《唐代的历史与社会》，第45—58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三月条，第6911页。

仍令兵部侍郎韦抗、紫微舍人王珪即于朝堂简募，十日内具所得人姓名奏闻①。

既然在朝堂选拔，且需十日内完成，知应募者必定出自京师附近。这次选拔虽然属于临时性质，却与开元十二年作为制度的“京旁州府”范围暗合。

又，开元二十四年（736）六月六日，郑县尉李詹被任命为“简募飞骑使判官”，“向陕、虢州点覆，其月十四日事了回”②。其中，陕州距长安 510 里，距东都洛阳 350 里；虢州距长安 430 里，距东都 453 里。按照唐代府兵上番制度，500 里以内都属于临近京师地区，番期相同，这一距离标准大概也适用于北衙禁军。与之相应，龙武军的士兵却选自“唐元功臣子弟并外州人。”③ 我们认为，此处所云“外州”，是与“京旁州府”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现存墓志中可以找到相关例证：徐思倩，父乾昌，青州北海县令兼渔阳军行军。“天宝中，幽州联帅选崇德懋勋之裔子，宾于王庭，入为羽卫，授公右龙武军宿卫。”④ 徐思倩由幽州进入龙武军宿卫，当可算作龙武军选自“外州人”的一个注解。

这种针对不同地域招募禁军的方式很可能与羽林、龙武二军不同的防务范围有关。汉置南北军以相伺察，其中，南军掌管宫城门内之兵，负责宫内的门户及宫殿内警卫，因其屯驻的未央宫在长安城西南，故以“南”称之。北军则掌外城门内之兵，屯驻于城北的营垒中，负责防卫京师，戒备非常。南军的兵源，以官僚、豪富子弟及郡国民为之，北军则调之于三辅良家子。盖“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

①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第 1407 页。
② 《金石萃编》卷七九，《李憕华岳题名》。
③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 1904 页。
④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 136—137 页。

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踞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①

从汉到唐，历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唐代的羽林军和龙武军无疑不能简单比附为汉之南北军，但是，内外相制的原则却并无不同。依据与汉代相同的原则，与皇帝关系亲密的唐元功臣子弟和外州人所组成的龙武军可能更多地承担宫廷防卫的任务；而来自于京师周围的羽林军则在府兵制渐趋瓦解之后更多地承担护城的职责。开元十六年（728），唐廷调整中央军制，改十二卫骁骑弓手为羽林飞骑，从而改变了部分骁骑的隶属关系，成为职业禁军的一部分②，骁骑本来承担的防卫任务也必然有一部分转加给羽林军。羽林军同时承担禁、卫双重责任，这与我们前述推测是吻合的。

羽林飞骑进一步向外围发展还表现在部分羽林军将领成为虚衔，专任羽林将军则使职化。唐初以来，羽林军将领经常参加边地战争，如号称典禁军三十年的李多祚，就分别于垂拱三年（687）击突厥，延载元年（694）击室韦，万岁通天元年（696）击契丹③；程务挺、张虔勖、阎敬容也都是名将裴行俭麾下的得力战将。出征入宿，成为羽林将军的两项基本职责。

武周以后，边地形势的变化以及几大节度使区的形成使得军队逐渐土著化，将领常驻军区，不再能够还朝宿卫。与此同时，府兵制的瓦解也使十二卫将军成为闲职，变为节度使的加官。武

---

① 《文献通考》卷一五〇，《兵》二，第1311—1312页。

② 参见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第五章《开元之治》，第153—17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垂拱三年七月条，第6445页；卷二〇五，则天后延载元年正月条，第6493页；卷二〇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条，第6505页。

周天授二年（692）羽林军建立自己的职官系统后，这一趋势渐次扩展到羽林军，羽林将军或成为边地节帅叙衔之阶，或被授予少数民族酋长。尤其是到玄宗朝，我们在传世典籍中看到的羽林军高级军职几乎全部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前者如开元二年（714）以薛讷为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①]。后者如玄宗朝《剑南节度使破西山贼露布》中提到八国招讨副使左羽林军大将军董当、左羽林军将军董旁郎、董毕郎、右羽林将军董利、董哥弄、左羽林军大将军兼静□郡太守董元智、右羽林大将军兼彭山郡太守董怀恩等七人，都是如此[②]。到天宝时代，羽林将军甚至成为授予不合格边将的惩罚性职衔。天宝六载（747），玄宗命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王忠嗣不肯用命，云："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③] 清楚地显示出羽林军职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羽林军作为禁军的职能依然存在。这样，到玄宗朝，羽林军职便产生了实职和阶官的区分。担任实职的羽林军官专司宿卫，不再参与征行。已知开元中宿卫中央的羽林将军有赵承（成）恩、薛莫、葛福顺、李思训、崔日知、张昉及程伯献[④]。其中李思训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崔日知俄迁太常卿；程伯献仅在

---

① 《旧唐书》卷九三，《薛讷传》，第2984页。

② 《文苑英华》卷六九八，第3334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十月条，第6878页。

④ 《新唐书》卷一九一，《李登传》："冠军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光禄卿天水县公赵承恩"，赵承恩为神龙政变功臣，见《新唐书》卷四，《中宗本纪》。此赵承恩即《册府元龟》卷一一八所云"左羽林大将军赵成恩"。其余人物分别见《薛莫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49页；《葛德威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〇，第4788页；《李思训传》，《旧唐书》卷六〇，第2346页；《崔日知传》，《旧唐书》卷九九，第3087页；《张昉传》，《旧唐书》卷一〇六，第3247页；《程伯献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65页。

玄宗出巡北都期间负责宿卫，都属于临时性质。其余四人中，赵承（成）恩为神龙政变功臣，薛莫、葛福顺为唐元功臣，张韪则是唐玄宗先天政变功臣。

担任实职的羽林军将领至迟到开元、天宝之际已经使职化[①]，其标志在于“知军事”的入衔。天宝元年（742）茹义忠墓志中，其子茹元曜署衔“左羽林大将军知羽林军事”[②]。这是“知军事”一词在史料中第一次出现。此后，羽林将领中只有加“知军事”者才真正统领禁军。茹元曜之父茹义忠是唐元功臣茹义恩之兄，茹元曜即是唐元功臣子弟，甚至本身也是唐元功臣。从薛莫、葛福顺、张韪和茹元曜等人的经历推测，真正在中央负责宿卫的羽林将军和龙武将军一样，主要选自于玄宗掌权有功的唐元功臣或先天功臣。虽然如此，但是，羽林军毕竟未能建立龙武军那样的内部迁转机制，它所走的阶官化与使职化的发展道路更类似于南衙诸卫，这反映出其与龙武军不同的背景、职责乃至亲密程度。

这样，大体以龙武军的建立为标志，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分层防务体制已经形成。处于内帷地位的是内飞龙兵，他们由宦官统领，兵源可能也来自宦官。其外是龙武军，其将领都来源于唐

---

① 张国刚先生在其《唐代北衙六军述略》中认为：“从龙朔二年到嗣圣元年，左右羽林军都毫无例外地以诸卫将军‘检校’，还没有设立羽林将军、大将军，而实际的羽林军的领兵军官则称羽林军使。《全唐文》卷一一高宗《免岐王珍为庶人制》：‘其同谋……右羽林军使刘从谏……等九人，特宜处斩。’”似乎羽林军将领的使职化在高宗朝即已开始。但是，岐王珍为玄宗之侄，他作为证据所引用的《免岐王珍为庶人制》并非高宗上元二年（675）所下制书，而是肃宗上元二年（761）所下，因此，这一结论仍值得商榷。

② 《忠武将军茹义忠碑》，《文苑英华》卷九〇九，第4782页；参见《茹义恩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50页。

元功臣，兵源以唐元功臣子弟为主，包括外州选拔的骁勇之士[①]。最外围是羽林军，常任将领以唐元功臣和先天政变功臣为主，兵源则由南衙士兵（府兵、骠骑）转化而来，或直接募自京师附近地区。这种按照与皇帝亲密程度排列的分层防务体制的出现，给禁卫系统内部不同集团划分了清晰的势力范围，解决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样，不断加强内帷势力的防务格局也反映出同时期皇权的强化。

① 从附表十子嗣一栏可以看出，唐元功臣的子嗣都任武职。天宝年间官阶最高者为折冲，但更多在别将一级，达 21 人。有 5 人标明为龙武宿卫或龙武军系统的官职，其他虽未明言，但也不排除实际任职于龙武军的可能。这证明《新唐书·兵志》中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的说法确有实据。

第四章　皇帝与皇家——唐前期禁军向内廷化之变迁

第一节　北衙与长安北城——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建立

如前所述，真正意义上的北衙禁军出现在贞观十二年(638)，以屯营飞骑的建立为标志。唐代南衙诸卫系统的宿卫体制虽然也以维护皇权为宗旨，且最高指挥权属于皇帝，但是，中古社会毕竟已经不能说是绝对意义上的“朕即国家”，皇家和政府之间的距离无疑存在并在不断扩大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卫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公义，而非皇帝个人的利益和要求。其所驻防的南衙是政府所在地，这一驻防地点兼具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它标明了诸卫国家军队的性质。这支军队的职任已经著于律令，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北衙屯营则不然，他们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屯卫，但并不受兵部——卫府系统的过多制约，而是直属于皇帝，它承担皇帝私人的保卫工作，对皇帝个人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皇帝的家兵。

贞观十二年屯营的建立使得唐朝中央出现了北门与南衙两种不同的军事力量，它意味着皇帝私人防护系统与国家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事实上，唐前期北门禁军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它不断脱离南衙、向内廷靠拢的过程。

北衙禁军最早的形态——屯营隶属于南衙屯卫，屯营将领多

由屯卫将军兼任。高宗龙朔二年（662）羽林军建立后，北衙禁军在建制上独立于南衙之外，但人事权仍不独立，羽林将军由南衙诸卫将军兼领。武周天授二年（692），羽林军改制成为羽林卫，同时建立官署，有了专职的羽林将官。羽林军取得了和南衙十二卫并立的地位，保卫皇帝的禁军和保卫国家的卫军从此正式分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①。

但是，禁卫分离仅仅意味着禁军有了独立的指挥系统，禁军将领仍然被纳入南衙职官体系之中，与南衙其他官员之间迁转无常。如天授二年，纳言武攸宁被任命为首任左羽林大将军，不久复为纳言；桓彦范先任司刑少卿，神龙元年（705）转右羽林将军，神龙政变后拜纳言；敬晖，本中台右丞，神龙元年转右羽林将军，政变后擢侍中②。在这种情况下，北衙禁军虽然号称天子亲军，却仍与南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南衙控制。正因为如此，身为宰相的张柬之等人才能将亲信安插到禁军系统，从而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推翻皇帝。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龙武军建立，次年设立官署，北衙禁军形成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四军建制。龙武军系统在人事上彻底脱离南衙，形成与内侍省相似的内部迁转机制。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详细论证，兹不赘述。

北衙禁军在玄宗朝向内廷靠拢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独立司法系统的建立。按唐代制度规定，中央唯大理寺得置狱，其余省、

---

① 参张国刚《唐代北衙禁军述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43—156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

② 《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攸宁传》，第5840页；《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第2928页；《敬晖传》，第2932页。

台、寺、监等以及东宫、王府均不得置狱[①]。但是，早在高宗朝羽林军建制后，负责监禁北衙禁军的羽林狱就已经存在[②]。光宅元年（684），武后令检校左右羽林军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废黜中宗后，闻知参与此事的十余名飞骑不满，遂将其逮捕入羽林狱[③]。羽林军有内部监狱，但是并没有内部审判权，还要受制于国家司法系统。如天授二年，左卫大将军左羽林卫上下泉献诚受来俊臣罗织，下制狱，由三法司推鞫定罪；开元前期，万骑将军马崇白日杀人，为刑部员外郎裴宽所执[④]。

开元后期龙武军内部迁转机制建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至德二载（757），唐肃宗回到新从安史叛军手中收复的长安，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曰：

> 其京城内外文武官，有受贼补署，……顿忘臣节。或有守旧官者，请奉料为贼判事，或判事之际，中间得替，并有摄贼伪官，兼知执掌。其中有京官外官及前资白身，皆受擢用；……色类既广，人数又多，宜令御史台、宪部、大理三司，据状勘责，条件奏闻。

这道诏书涉及京城文武官、外官、前资官、白身受伪官者等种种身份，涵盖了南衙系统全体官员。他们在“安史之乱”中的不同表现，都由御史台、刑部、大理三法司勘责处理。与之相应，北衙禁军则被纳入另外一个系统：

---

① 《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第188页。参刘俊文《唐代狱讼制度考析》，《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242—2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参王素《唐五代的禁卫军狱》，《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第117—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二月条，第6418页。

④ 《泉献诚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七辑，第20页；《新唐书》卷一三〇，《裴宽传》，第4489页。

其内侍省及左右龙武羽林军，闲厩飞龙诸武官，应先合从驾人等，其中临行潜避，遂受贼驱使，并使各委本司括责，量情状轻重奏闻[①]。

显然，内侍省、龙武、羽林军、闲厩、飞龙系统的武官被视为南衙之外的特殊系统独立存在，其过犯的审理不必通过三法司，而在“本司”进行。在这之中，闲厩为禁军提供马匹，是禁军的配套机构；飞龙厩则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由中官统领。因而，这一赦文所规定的内容实际以内侍和禁军两个系统为主体。作为天子私属力量，他们的违法行为被视为家事，在内部解决，与南衙所代表的国家系统无涉。赦文颁发于至德二载，但是，这一新体制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开元二十七年后禁军在人事上脱离南衙。

如前所述，龙武军系统内部迁转机制建立的原因和作用都类似于内侍省，而至德二载敕书也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再联系同时期宦官掌领的内飞龙厩系统对皇帝防卫的介入，我们会发现，到开元天宝之际，北衙禁军在脱离南衙的同时与内侍系统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如果把内侍省作为绝对意义的内廷，那么，北衙禁军可以算作一种准内廷势力。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唐玄宗时代，唐元功臣们宅居最为集中的承天门横街以北和宫城、皇城两侧诸坊，也正是宦官居住最密集的地带，据统计，唐玄宗时代以前宅居可考的宦官共八位（包括一对父子高延福和高力士），全部居住在这一地带[②]。宦官和北衙禁军的定居使得承天门横街以北演化为皇家势力集中的地区（参见附图二）。

---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收复京师诏》，第 65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

② 宦官住址参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期，1996 年，35—74 页；杜文玉《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 4 期，第 79—94 页。

唐代长安城承自前朝，但增加了两处新的宫殿区——大明宫和兴庆宫。高宗龙朔三年后长住大明宫和玄宗自开元十六年（728）后住兴庆宫，都对长安居民的居住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官员的宅第随政治中心的转移也逐渐向东部迁移，形成城东住官、城西住民的大致格局。对此，自徐松以来治长安历史的人多有注意，妹尾达彦先生更是做了精确的解说，在确认长安城街东是官僚区，街西是庶民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亲王、宦官、禁军将领等高官住在三宫周围的东北部诸坊，文官住在东中部诸坊，一般小官僚住在街东南部和街西诸坊。另外，非汉人官吏住街西西市周边诸坊，宦官住街西宫城侧诸坊，但这种宦官一般较街东大明宫南部诸坊的宦官品级要低[①]。这个结论证据确凿，正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关心的是另一条分界线——以朱雀门街为界的街北和街南作为两个大区的分工以及这一分工形成的时间。

依据妹尾先生有关官人住宅的统计，618—661 年，城北有官员宅 21 所，官员夫人宅 1 所，宦官宅 1 所，公主宅 2 所。662—711 年，城北有官员宅 41 所，夫人宅 7 所，公主宅 4 所，亲王宅 6 所。712—763 年，城北有官员宅 58 所，夫人宅 5 所，宦官宅 10 所，宦官夫人宅 2 所，亲王宅 23 所，公主宅 7 所。无疑，妹尾先生这一统计的着眼点与本文并不相同，他将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并不特别区分他们内部身份的差异；在时间上，他更加关注兴庆宫的建成对于官员宅第的影响，将玄宗统治开始

① 参氏著《唐代长安的街西》，《史流》第 25 号，第 1—31 页，1984 年 3 月；《唐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期，第 35—74 页，1996 年 9 月；《中唐的社会与大明宫》，载《中唐文学的视角》，第 339—356 页，东京创文社，1998 年 2 月。

直到“安史之乱”结束划作一个时期①。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清楚地看到，玄宗朝是一个明显的转折，从此之后，宦官、亲王、公主、宫廷音乐歌舞人等皇帝私属势力成为长安北城的主要居民②。据第三章表十的统计，已知唐元功臣中便有 21 人住在城北诸坊中，而他们入住的时间，也都在玄宗时代。

玄宗朝北衙禁军、宦官、亲王、公主、宫廷音乐歌舞人等皇帝私属力量大量住进长安城北部地区并非完全是自发形成的，而极有可能出自玄宗的有意安排。这可以从《文苑英华》卷五八九，李揆《谢赐光宅坊宅表》可以约略窥之：“古制，宫阙近地，公卿不居，唯信臣密戚时闻诏赐。所谓北阙甲第者，盖由远近差之。”李揆生活的时代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而以肃宗朝最为显贵，官至宰相③。他的《谢赐光宅坊宅表》大约就作于肃宗时期。李揆赐宅在光宅坊，正在我们所要探讨的区域之内。但是，文中所谓“宫阙近地，公卿不居”的情况并非古制，事实上，玄宗朝以前，长安城北宫城与皇城两侧诸坊一直有达官居住。如唐初右领军将军王君廓住安定坊，太宗朝大理卿孙伏伽住大宁坊，右卫大将军段志玄住醴泉坊，宰相魏征住永兴坊，太子少师李刚住永嘉坊，高宗朝司农卿韦机住普宁坊，宰相戴至德住义宁坊，户部尚书许圉师、宰相陆敦信住大宁坊，宰相许敬宗住永嘉坊，宰相张文瓘住永嘉坊，宰相薛元超住崇仁坊，左卫将

---

① 妹尾达彦先生对宦官的统计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据妹尾先生考证，在 712—763 年，长安北城有宦官宅 12 所，宦官夫人宅 2 所；但是，据其所列宦官居住表三，这一数字已经越出了他的时间界定（《唐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期，第 35—74 页，1996 年 9 月）。今据笔者统计，在玄宗朝（712—755）住在这一地区的宦官（含夫人）共 11 人，有宅 12 所，参见本书图二。

② 音乐歌舞人如《新唐书》卷八一：“（汉中王）瑀知音，尝早朝过永兴里，闻笛音，顾左右曰：是太常乐工乎？”知永兴里有乐工居住。永兴里乃朱雀门街东第二街之东自北向南第三坊，也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③ 《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揆传》，第 3560 页。

军独孤开远住胜业坊，武周朝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住居德坊，司礼卿崔神庆住兴宁坊，尚书左仆射韦安石住安兴坊等，均在长安城北部地区[①]。因而李揆所言，更多地反映了玄宗一朝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唯信臣密戚时闻诏赐”一句。前述北衙禁军、宦官、亲王、公主、音乐歌舞人等五种身份中，亲王、公主宅无疑都是诏赐，相当于表文中的“密戚”，而所谓“信臣”赐宅，大约便以禁军将领和宦官为主。《东城老父传》中，斗鸡小儿贾昌之父贾忠的情形颇能反映这一问题。贾忠中宗朝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710）持幕杆，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②]《传》中所谓“景云功臣”便是我们在第三章论证的“唐元功臣”，用睿宗年号“景云”来代替殇帝年号“唐隆”，只是表明由睿宗一系传承下来的皇帝不承认殇帝法统而已。东云龙门是东内苑之北门，也是北衙禁军的驻防之处。贾忠并非政变的重要人物，不会受到皇帝的特殊眷顾。那么，我们推测当时接受类似诏命的功臣或许有很多，属于皇帝的整体安排，则玄宗时代以唐元功臣为主的禁军将领居住在承天门街以北皇城与宫城东西两侧诸坊中，也应视为同样的情况。

宦官的情形也是如此。玄宗朝大宦官高力士在兴宁坊、来庭坊、翊善坊有宅，均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空间范围内。虽然无法断定高力士宅是否玄宗所赐，但是，“安史之乱”后，在长安北城安排宦官则有例可循。如敬宗曾在永兴坊赐宦官阎志和、朱惟亮、周文晟、杨文晟宅各一区[③]。

---

① 参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相关诸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② 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太平广记》卷四八五，第 3992—3995 页，中华书局，1961 年。

③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第 7965 页。参见杜文玉：《唐代长安城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第 79—94 页。

除宅第外，一些与皇帝私人生活关系密切的机构也被安排在长安城北部，如皇室婚姻场所礼会院（崇仁坊），宗教场所太清宫（大宁坊），宫廷音乐教习场所左右教坊（长乐坊、光宅坊），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寺观大安国寺（长乐坊）、光宅寺（光宅坊）、兴唐寺（大宁坊）、昭成观（颁政坊）、太清观（金城坊）等等。那么，我们便可以认为，从玄宗朝开始，长安城被有意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承天门街以北是皇帝内廷势力所在，以南则聚集着国家的行政官僚。在北城活动的各种势力中，北衙禁军和宦官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这两者之间互相渗透，渐成一体，即将对唐朝的整个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禁军身份的卑微化——户奴与奴官

与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建立以及由此引发的皇帝内廷势力扩大同时并存的另一个趋势，是皇帝的私人生活与国家政治活动分开。表现到居住格局上，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以朱雀门横街为界限，南北城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公私分工；表现到禁军制度上，则是北门禁军虽然规模扩大，在宫廷政变中也愈卷愈深，但是对于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却有转少的趋势。

玄宗以前的禁军将领往往因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而被记录下来，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当然是边功。如契苾何力，虽然在太宗朝检校屯营，在高宗朝检校羽林军，但他最为人称道的功绩却是征吐谷浑、击龟兹和服辽东。再如李多祚，本传称其“少以军功历位右羽林大将军，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其之所以能在禁军中得到高位，靠的也是征契丹、突厥所建立的赫赫战功。

同样，将领们如果在禁军中工作得力，便会被提拔到其他系统。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张仁楚，永昌元年（689）授左金吾卫

函谷府长上折冲、押左羽林军飞骑上下。如意元年（692）检校庭州刺史，从此离开禁军系统[①]。再如冯师训，贞观十三年（639），起家应材官之选，释褐拜左屯营飞骑队正，累迁飞骑校尉。麟德二年（665），擢右骁卫郎将，令北门侍奉，押左营飞骑。乾封元年（666），制为积利道总管，迁右监门卫中郎将[②]。北衙禁军将领对国家生活有着广泛的参与，往往成为国家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到开元年间，随着北衙禁军本身的壮大与内廷化色彩的不断增强，这样的一种格局便不再为皇帝所接受。最为典型的例子如王毛仲，当他向南衙伸手太多时，便遭到了玄宗毫不留情的清洗。开元二十六年（738）后，内部迁转机制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建立使北门禁军形成一个类似于内侍省的准内廷机制，禁军将领的活动领域也收缩到禁军这一固定系统，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基本被禁绝。与之相应的一个后果便是，将领的官阶提高、待遇优厚，但身份却走向卑微。

玄宗以前，北衙禁军将领大多选自统治者的姻亲、宗族或是私人亲信，和统治者处于大体相同的社会阶层；另外，他们与南衙官员属于同一官僚体系，彼此迁转无常，不存在身份上的差异。太宗、高宗两朝有四位北衙将领与皇室通婚[③]，可见其当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玄宗朝则不然。永昌元年（689），武则天以官奴扩充万骑，给这支军队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奴”字烙印。到了玄宗时代，主

---

①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382页。

②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5页。

③ 阿史那社尔尚衡阳长公主，契苾何力尚临洮县主，阿史那忠尚定襄县主，程知节之子处亮尚清河公主，分别见《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3288页；《契苾何力传》，第3291页；《阿史那忠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50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程知节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203页。

要由这一系统出身的禁军将领，也因此被称为“北门奴官”①。奴官可以做到正三品的龙武军大将军，但就其身份而言，依然是皇帝的家奴。而且，由于龙武军系统的内部迁转体制，他们和南衙不再处于同一官僚体系中，其职衔也就不复为南衙官员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由于员外官的设立而使禁军将领中身居高位者增多，但其社会地位较之前期则大为降低。

北门领袖王毛仲的经历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种状况。王毛仲本官奴出身，以黠慧事玄宗。早在中宗一朝，王毛仲就协助玄宗，倾心结交北军将领，于唐隆政变有功，累拜官太仆卿，领闲厩使，加开府仪同三司。王毛仲嫁女，害怕不能请到宰相宋璟，求助于玄宗。玄宗遂谓宰相云：“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宋璟领旨出席，但还未饮满一杯，便诈称腹痛而归②。显然，官职的提升并未改变王毛仲作为奴的身份，也未能使他得到正统派南衙官僚的真正认可。王毛仲虽未任职于龙武系统，但他是唐元功臣，出身官奴，并且一直以北门奴官领袖的面目出现，他的经历基本上可以代表北门禁军将领的总体情形。

另一个证据是北门将领通婚圈的改变。玄宗朝的北门将领已经不再有尚主的记录，相反，内部通婚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如奴官领袖王毛仲之媳为万骑将军葛福顺女，左龙武军将军同正李忠义前夫人即右龙武军将军屈元寿之妹，其继夫人南氏、屈元寿夫人王氏、龙武将军张金刚夫人李氏也都是唐元功臣的姊妹。

甚至梨园艺人也成为禁军的通婚对象③。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为衣食于右龙武军的斗鸡小儿贾昌娶梨园弟子潘大

---

① “北门奴官”之称，见《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4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第6768页。

③ 有关梨园论述，参见任半塘《唐戏弄》，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李尤白《梨园考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伟洲《唐梨园新考》，《周秦汉唐研究》，第345—360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同女。史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① 潘大同就是这三百弟子之一。潘氏天宝中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其身份可能类似于天宝名伶谢阿蛮。“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② 潘氏得幸杨妃，也应是艺人中之佼佼者。

与之相似的是德宗朝右龙武军同正将徐思倩的例子。徐思倩天宝中授右龙武军宿卫，累迁同正将。其子继续为北衙将领，女儿则是皇帝殿前弟子③。同一家庭内部包含禁军与优伶两种身份，可见这两个系统之间地位相近。虽然徐思倩本身生活的年代较晚，但其家庭结构所反映的问题，比照贾昌看来，应该可以上溯到玄宗时代。

唐前期基本还是身份制社会。婚、宦二事，最能反映社会地位。北衙禁军将领内部通婚或联姻倡优，官职内部迁转而又不能得到南衙认可的情形无疑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落。

将领如此，士兵亦然。我们在前两章分析过，北衙禁军从开始出现便分为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分别发展为后来的羽林军和龙武军。羽林军系统最早很可能追溯到百战余威的秦府兵。此后的屯营飞骑虽由招募而来，却还存在户等要求，显示出较高的社会身份。羽林飞骑则改由一般民户或由府兵招募。开元十二年(724)，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④。以户部印印臂，暗示了这支军队近乎于“兵户”的性质，可以作为他们身份卑微化的象

① 《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第476页。

② 《明皇杂录补遗》，载《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136页。

④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1页。

征，这种象征出现在开元时代并非偶然，它与同一时期整个士兵的身份降低联系在一起①。但是，在同时代的各种军队中只有羽林军印臂，又反映了这支天子禁军作为皇帝家奴的特殊性。

龙武系统的最初形态百骑中便含有官户、蕃口成分。永昌元年（689）改为千骑，兵额扩大，更是大量从户奴中擢拔。唐隆政变立功后，停止以户奴为万骑，而立功将士子弟大量涌入。

分开来看两支禁军的发展史已经可以得出禁军身份下滑的结论，如果再考虑两支禁军地位的升降沉浮以及兵额的消长，结论就会更加明确。我们知道，作为皇帝的私兵，忠诚是对于禁军的最高要求。相对于招募自府兵和一般民户的羽林飞骑而言，出身户奴的百骑（千骑、万骑、龙武军）无疑与皇帝关系更为密切，忠诚于皇帝的可能性也更大。因而，从武周朝开始，龙武军系统崛起的速度、对政治的影响力都逐渐超过羽林军。随着龙武军在禁军中所占比重的增加，龙武军的一些特征也在玄宗朝左右了整个禁军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说，由于龙武军的势力增长，禁军的出身更加呈现下滑趋势当不为过。

禁军身份降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化素质的下降。唐太宗朝，“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② 我们可以在碑刻中找到相关印证：魏哲，“贞观十五年（641），起家补国子博士，……十六年，敕授左翊卫北门长上，禄赐同京官，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四月条云：“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亦云：“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可见，随着唐朝社会向文治化发展，士兵地位降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不仅仅限于北衙禁军。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53页。参严耀中《论唐前期的军府学官》，《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4—81页。

仍令为飞骑等讲礼。”[①] 在飞骑中立学、讲礼反映出皇帝对于这支亲兵的厚爱，希望将其培养成为文武全才。因为有皇帝重视，可以想见，当时的飞骑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但是，到唐玄宗时代，北衙禁军的文化水准大为降低，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一介武夫。史载开元八年（720），禁军将领葛福顺之子举明经及第，玄宗十分诧异，一定要亲自考试，而福顺之子也果然面墙不知所对[②]。显然，无论在时人心目中还是在事实上，禁军及其子弟已经不再有文。诗人韦应物在唐玄宗朝曾为三卫，他在诗中称自己当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北衙禁军，但还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禁军的整体水平[③]。另外，从第三章所列表十中我们看到，唐元功臣子弟都担任武职，无人能向文臣发展，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状况。禁军文化素质下降与禁军出身下滑有关，但也是皇帝的有意安排。如前所述，忠诚是皇帝对禁军的最高要求，而一个出身低微、没有文化知识的武夫更可能愚忠于皇帝。因而，唐太宗以后，皇帝不再有教育禁军的举措，这当然更加剧了禁军身份的下降。

禁军身份下滑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北门禁军娱乐色彩的增强。唐都长安是一座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④]。宫城北门玄武门建立在龙首原的高冈上，居高临下，俯视城中。玄武门以北是广袤的禁苑，以南则是皇帝的寝宫，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正因为这

---

① 杨炯：《唐将军魏哲神道碑》，《全唐文》卷一九四，第1968—1969页。

② 《册府元龟》卷六五一，第7801页。

③ 《全唐文》卷一九〇，第1956页。

④ 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都城建筑》，第62—81页，中华书局，1982年；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仪礼空间——以皇帝仪礼的舞台为中心》，《东洋文化》72，东洋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2年；尚民杰：《隋唐长安城的设计思想与隋唐政治》，《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第1990—1998页；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年第3期，第48—63页。

样，北门禁军才在这里屯兵驻扎，以保卫皇帝的安全。但是，玄武门本身并非只有政治意义，它也是皇帝后宫与猎场之间的桥梁，属于皇帝的私人生活空间。

和承天门作为发号施令的场所不同，玄武门是内廷游乐场所。武德元年（618），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袭，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①]；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宴群臣及吐谷浑河源郡王诺曷钵于玄武门，奏倡优百戏之乐[②]；景龙三年（709）二月，中宗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③]，均可反映出玄武门这一特色。

驻扎于玄武门以北的禁军，也具有很强的内廷娱乐色彩。如前所述，北衙禁军之设，原为陪同皇帝田猎。从贞观朝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鞬，为游幸翊卫的描述，不难想见北门禁军兼具中古社会家兵、亲随的风范，这使得禁军在宿卫之外还被用来从事各种狎戏。如贞观十三年，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④]。

开元中，北衙禁军向内廷化急剧发展，和内廷娱乐系统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专为皇帝驯养斗鸡的鸡坊便隶属于龙武军。唐代宫中原有雕、鹘、鹞、鹰、狗五坊，供皇帝狩猎，由宫苑使押领[⑤]。玄宗好斗鸡，即位后，于五坊制度之外另治鸡坊，索长安雄鸡养之。鸡坊小儿由禁军子弟构成，设专使押领，而衣食于龙武军[⑥]。《新唐书·兵志》云：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开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六月条，第5796页。

② 《玉海》卷一五四，《唐宴蛮夷玄武门》，第2840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三年正月条，第6631页。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三年十二年条，第6150页。

⑤ 《唐会要》卷七八，《五坊宫苑使》，第1421页。

⑥ 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太平广记》卷四八五，第3992—3995页，中华书局，1961年。

元初选禁军子弟为斗鸡小儿，大约是这种政策的具体措施之一。

玄宗朝斗鸡小儿中以贾昌最为知名，其事迹见于陈鸿祖的《东城老父传》。《东城老父传》作为小说中“逸事”一类，不代表唐代小说发展方向，因而从文学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①]。但是，将其作为史料考察，则历来多有创获。其中较为重要的如陈寅恪《读东城老父传》、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和唐刚卯《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②]。其中，陈文重点探讨长安胡化问题，周文逐句疏证相关制度，唐文则主要关注斗鸡与时人信仰的关系。其实，《东城老父传》所蕴涵的信息极为丰富，以之考察玄宗时代的禁军身份，同样具有价值。据《东城老父传》，贾昌之父贾忠原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随玄宗诛韦后，诏徙家东云龙门。贾昌幼年于斗鸡颇有天分，“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其实，贾昌之父贾忠参加唐隆政变有功，为唐元功臣。作为功臣之子，贾昌之入鸡坊符合前述制度规定。《东城老父传》之所云，只是为了突出玄宗对于贾昌的知遇之恩而已。

鸡坊隶属于龙武军，原本是玄宗笼络政变功臣、优奖禁军家属的一项政策，但其出现也显示出这支军队固有的娱乐色彩已经进一步强化。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禁军特别是龙武军（万骑）内部父兄入军伍、子弟为小儿的情况普遍起来。

天宝后期，禁军“富者贩（服）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

---

① 参见鲁迅《小说史大略》，齐鲁书社，1997年，第290页；李钊平《论唐代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内在超越》，《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第34—41页。

② 陈文载《史语所集刊》第10本，第175—179页，1948年，又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98—3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周文载《文史》第17辑，第167—181页，1983年；唐文载《唐研究》第6卷，第213—2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①。角觝属于“百戏”之一，又称为“武戏”，在唐代每与倡优杂戏并举②。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始，这种娱乐已经基本为禁军所承担。《雍录》卷八《左右龙武军》称：“初置唯以从猎，其地最为亲密。固已易于宠狎矣。……唐自中叶以后，天下多事，凡有土木兴作，多于北军取办焉。而他秘戏耽乐，外人不知尚多，此其亲狎之由也。”虽然立论重点在唐后期，但也适用于玄宗时代。

同时也应看到，唐前期禁军向卑微化发展，仅仅意味着他们身份变化的一种走向。另一方面，禁军作为皇帝亲兵，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较为宽松的军内司法特权，又使这一身份被时人艳羡。

史载唐隆政变后，万骑地位大大上升，“长安良家子避征徭，纳资以求隶于其中，遂每军至数千人。”③ 这种势头在玄宗朝一直持续下来，到“安史之乱”爆发时，市人在禁军中已经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我们在唐诗中经常看到的长安恶少形象，也多以北衙禁军为蓝本。如王建的《羽林行》④：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
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
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
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诗中隶属于羽林军（代指所有北衙禁军，下同）的恶少生活

① 《新唐书》卷五〇，《兵制》，第1327页。
② 《角觝要义》，见《唐戏弄》，第215—222页。
③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3页。
④ 《全唐诗》卷二四，第317页。

于唐后期，这一时期政治动荡，皇帝经常流离迁播，北衙禁军也更多地投入战斗，故而会有“收城功”。这些功劳又成为他们跋扈的资本，使他们能够杀人越货而不受惩罚。又如张籍《少年行》[①]：

少年从出猎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
独到辇前射双虎，君王手赐黄金铠。
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
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倡楼醉。
遥闻虏到平陵下，不待诏书行上马。
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
不为六郡良家子，百战始取边城功。

杜牧《少年行》[②]：

官为骏马监，职帅羽林儿。
两绶藏不见，落花何处期。
猎敲白玉镫，怒袖紫金锤。
田窦长留醉，苏辛曲护岐。
豪持出塞节，笑别远山眉。
捷报云台贺，公卿拜寿卮。

这些复仇杀人、买醉宿倡、斗鸡走马的长安恶少也都具有禁军的身份。当然，张籍、王建、杜牧都是唐后期人[③]，他们作品里刻画的也是唐后期以神策军为主体、兼具征战任务的北衙禁军

① 《全唐诗》卷二四，第325页。
② 《全唐诗》卷二四，第325页。
③ 王建生于大历元年（766），卒于元和十二年（817）以后，见《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第151—16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2000年第二次印刷；张籍生于大历元年，卒于大和三、四年（829—830）间，《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第552—563页；杜牧生于贞元十九年（803），卒于大中元年（852），《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第191—210页。

形象，但是，我们认为，北衙禁军的基本形象在玄宗朝已经确定。兹举二例以为旁证：

（开元）十一年（723），帝谓宰臣曰："昨闻万年县界崇仁坊有黄衣长上斫杀人，不见州县奏来，是何道理？"时左金吾卫黄衣长上杨骆持刀入乌那昇家，伤昇妻女，仅而免死，有司惧罪，将掩之[①]。

黄衣长上虽然属于金吾卫，但是，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他们的身份、待遇与羽林军相近，都属于皇帝的亲随人员。其行事非常类似于张籍《少年行》中"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倡楼醉"的羽林飞骑，可以想象，这类事例在玄宗一朝也会经常发生在羽林、龙武军中。

再看韦应物追忆玄宗时代生活的《逢杨开府》[②]：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
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
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
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韦应物曾于玄宗朝担任三卫[③]，诗作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情形。诗中的作者是一个"一字都不识"的武人，以陪同武皇帝（玄宗）打猎为主要职责，他倚仗玄宗的"恩私"豪横不羁，终日赌博、饮酒、宿倡，在乡里为非作歹，但是，又因为身份的特

① 《册府元龟》卷一五二，第1844页。
② 《全唐诗》卷一九〇，第1956页。
③ 《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第163—183页。

殊而使“司隶”（代指京兆尹）不敢处置。玄宗去世后，他的地位也随之沦落。就这几点特征而言，诗中描绘的形象更像是靠政变起家、在玄宗朝作为亲兵受到特殊优待而又享受内部司法特权的北衙禁军。

这种形象在时人心目中的反应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享受优厚待遇、具有豪侠之气的皇帝亲兵；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仗势欺人、不学无术的天子家奴[①]。前者促使禁军成为长安市民渴望得到的身份，他们甚至不惜纳资隶军，以避征徭；后者又使这一身份并不能获得社会真正的认可而趋向卑微。

综上所述，唐前期北门禁军的诞生和发展，首先是体现皇帝个人利益和需求的机构与国家机构发生分离以及皇权不断上升的产物。在这一背景下，北门禁军的最早形态——屯营得以成立于府兵体系之外。此后，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北门禁军也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唐代统治者并不希望这一私人势力无限膨胀。开元后期，地位煊赫的龙武军率先建立内部迁转机制，在优宠龙武军的同时限制了他们在北衙以外势力的发展。在这种体制的限制下，北衙禁军对于政治的参与极为有限，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龙武军建立以前的禁军将领大多数能在正史中找到相应记载，而开元二十六年之后的龙武将军只有陈玄礼因为在“安史之乱”中的特殊表现而在传世史料中留下了姓名[②]，北衙禁军作为一个整体则以京师恶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心目之中。对于禁军这种准内廷势力的优宠与限制并行，体现了维护政治清明与稳定的原则，无疑是同时期皇权发展与理性政治混合的产物。

---

① 参周敏《论唐代京都“禁军侠少”及在唐诗中之表现》，《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3 期，第 132—135 页。

② 有关陈玄礼的情况主要见于《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 3255 页。

第五章　北衙禁军与府兵制的消解

第一节　北衙禁军对府兵人员的吸纳

滨口重国先生曾经指出，唐前期从府兵制到新兵制的过渡是一个一分为三的过程，囊括全部军防任务的府兵制演化为专司中央宿卫的禁军、作为地方警备的团结兵和负责边防守备的藩镇[①]。这是一个相当有概括力的结论。

府兵制的解体一直是唐史学界引人瞩目的一个话题。府兵制作为唐前期基本军事制度曾经发挥巨大作用，但其解体却无声无息，没有引发什么震荡。府兵制解体的原因，目前的解释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基础论与环境论[②]。所谓基础论是将其与均田制的破坏联系起来，认为由于田制破坏，府兵负担过重，导致了府兵逃散，宿卫不给，直至最后瓦解[③]。环境论则认为，由于周边民族崛起所导致的边疆形势的变化，使得府兵这种以平日务农、有事出征为特征的预备兵不再适应需要大军长

---

① 《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史学杂志》第41卷11、12号，1930年，收入氏著《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二次印刷。

② 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③ 持这种看法的代表作如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砺波护《两税法制定以前客户之税负》，《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第329—353页，同朋舍，1986年2月。

期屯边戍守的局势，因而逐渐被招募来的镇军，乃至后来的节度使军取代[①]。笔者个人比较同意后一种解释。

问题是，唐代府兵数目极大，按谷霁光先生的说法，在开元初年尚有 633 府，人数至 68 万之众[②]。如此众多的府兵解体后的走向，虽有滨口先生一个宏观的解说，但在微观意义即转化的具体方式上，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事实上，即使在中央宿卫的层面，北衙禁军对于府兵制的消解也是多角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绝非“代替”二字所能完全概括。

1. 北衙禁军与府兵士兵

唐代北衙禁军的建立与发展是与府兵制的破坏同步进行的。从高宗龙朔二年（662）起，吸收府兵制下的士兵进入禁军序列开始成为唐朝政府的一项制度。此后，这项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先天二年（713）正月诏曰：“自今后，羽林飞骑并于卫士中捡补。”[③] 开元十二年（724），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④] 对于这项政策的原因，孟彦弘先生解释为，府兵具有身份性，一经检点，终身不必再负担国家的租庸调杂徭等义务。唐初府兵的任务

---

① 代表作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副刊第 9 号，第 98—125 页，1948 年。

② 《府兵制考释》，第 142—152 页。此后武伯纶、李方、张沛、周晓薇、陈国灿等人都根据新出墓志有增补（见武伯纶《唐京兆郡折冲府考异》，《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6 期，第 90—94 页转第 17 页；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第 36 辑，1992 年，第 199—221 页；周晓薇等《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 年第 3 期，第 129—138 页；1996 年第 2 期，第 215—218 页；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六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73—91 页；张沛《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文博》1995 年第 1 期），总体数量已经超出谷霁光先生当年的数字，但是，所增军府存在的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因而暂时仍沿用谷霁光先生的说法。

③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第 1292 页。

④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 1331 页。

有三项：宿卫、征行和镇守。但是，随着镇兵主力由府兵变为募兵以及镇兵的增加，边地的镇守和征行就不再由府兵来担任，这样，府兵的任务便仅余宿卫一项。番上宿卫的府兵具有地域性，仅限于关内、河东、河南等有限地区。这就使得国家白白免除了一部分人的租庸杂徭而不能收到效用。鉴于此，政府对府兵制进行了调整，其中一项内容便是以府兵补充北衙禁军，以扩大府兵的服役人数①。

这种解释为我们考虑唐政府在府兵制解体过程中发挥的主动作用颇有启发，但是，认为以府兵补充禁军仅仅是为了增加府兵服役人数则或有商榷余地。首先，龙朔二年府兵尚为军事主力，不存在任务不足的问题。其次，开元十二年取京旁州府士充羽林飞骑，而京旁州府正是承担宿卫任务的军府所在地。如若按照孟彦弘先生的解释，应该以相对边远地区的府兵充当羽林飞骑，方能收到扩大府兵服役人数的效果。那么，以府兵补充羽林飞骑，还是应当从飞骑的选取原则来着眼。前面讲过，飞骑作为保卫皇帝安全的亲兵，以骁勇为第一要义。而府兵毕竟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因而较之一般民户军事素质为高，以其补充飞骑自然恰当。

龙武军（包括万骑）的兵源，在景云元年（710）停止以户奴为万骑后，一般史料都记载为以唐元功臣子弟充②。但是，唐元功臣为数毕竟有限。我们在《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左右神武军下看到："又置左右龙武军，皆唐元功臣子弟并外州人，如宿卫兵，分日上下。"则龙武军的兵源不止唐元功臣子弟一途。借助于羽林飞骑"取京旁州府士充"的记载，我们猜测"外州"

---

① 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唐研究》第一卷，第245—276页，1995年。

②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1页。

很可能是对应于“京旁州府”的一个概念，所谓外州人可以理解为京畿地区以外的人，其中自然包括当地的府兵。

随之而来的便是羽林军、龙武军的兵额问题。《册府元龟》卷一一八，《亲征》第三记云：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十月，吐蕃复侵渭源。帝思亲征，乃下制曰：“……其差取后军四万人，诸色番兵二万人，京兆府兵一万人，飞骑二万人，量追三百里内兵，留当下人充。万骑五万一千人，幽陇兵各二千人，岐州兵五千人，并集本州待进止。”一次出征便能够征调飞骑二万人、万骑五万一千人，可以推想北衙禁军的总数当更为惊人。但是，《唐会要·京城诸军》云：“天宝七载（748）七月二十日敕，左右羽林军飞骑请准后加数，通旧一万五千人为定额。”万骑兵额，也不过每军数千[①]。两种差异极大的数额之间的矛盾，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北衙禁军的分番服役制度；一是纳资飞骑、万骑的存在与发展。

如第二章所述，羽林飞骑分六番服役。如果一万五千人的定额仅仅是指长安城常驻飞骑的额度，那么飞骑总数就应该是这一数字的六倍；同理，万骑的总人数也应该按照这一原则考虑。如此庞大的禁军来源，应该主要追溯到先天二年诏以及开元十二年诏中确立的从府兵卫士中选拔飞骑的原则。

还应该加以考虑的是，飞骑、万骑和三卫一样，是一种身份，故而有纳资一事。开元年间，许多市井子弟纳资隶军，以避征徭。李锦绣先生认为，其所纳资成为唐政府解决额内禁军经费的主要来源[②]。笔者猜测，纳资飞骑很可能部分地来源于原来的

---

①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龙武官尽功臣，受锡赍，号为‘唐元功臣’。长安良家子避征徭，纳资以求隶于其中，遂每军至数千人。”第3253页。

② 《唐代财政史稿》上，第三册，第1184—1186页。

纳资三卫。按《旧唐书》卷四三："凡诸卫及率府三卫，贯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皆令番上。余州皆纳资。"而据《马神威墓志》：志主大约在贞观后期即"初以翊卫，简充羽林飞骑，从班例也"①。如果三卫简充飞骑已经作为惯例，那么，原来的纳资三卫中，应该有一部分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纳资飞骑甚至万骑。他们可能和原来的纳资三卫一样，并不需要到中央宿卫，但是兵额不废，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征调。

如果上述两说成立，那么玄宗时代所出现的大量飞骑、万骑就已经从相当规模上继承了原有的府兵。事实上，府兵的后身——"骁骑"也在其后的时间里继续为禁军提供了兵源。唐玄宗前期，随着府兵制逐渐堕坏，宿卫军队严重缺额。开元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骁骑"②。但是，开元十六年二月，骁骑弓手又改为左右羽林军飞骑③。骁骑虽然属于募兵，但它和府兵一样有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④，因此可以看作府兵的变种。而骁骑弓手转化为羽林飞骑，就从此脱离原来的属籍而落籍禁军，这也可算作府兵进入禁军体系的一个变相。

2. 北衙禁军与府兵将官

府兵将官转入禁军系统甚至还要早于士兵。了解这种转化关系，先要看一下北衙禁军建立以来的组织结构。

北衙禁军从贞观十二年（638）屯营成立，到高宗龙朔二年（662）改为羽林军为营级建制，屯营隶属于屯卫，没有专职长

① 《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256页。
② 《新唐书》卷五〇，第1326—1327页。
③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条，第1299页。
④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7页。

官，其将领称为某卫大将军（将军）检校屯营、北门上下、检校屯兵等等，又可简称为屯营将军。屯营下设飞骑和百骑两个系统，分别委派南衙将官负责。此外还有一些南衙府兵长上北门，也附属于屯营。这一时期，百骑的力量很小，飞骑是屯营的主要兵力，因此，押飞骑将领与押屯营将领的级别差异不大，总的说来，左右屯营的长官绝大多数都由南衙大将军兼领，而飞骑长官则由诸卫将军兼领。如贞观中“太宗选骁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直屯营以充仗内宿卫，名为‘飞骑’，每游幸，即骑以从，分隶于行本。”① 姜行本就是以屯卫将军的身份押飞骑。在他之后，郑广又以检校右领军将军的身份押左飞骑仗②。飞骑营以下有校尉、旅帅和队正。说明当时北衙禁军的组织结构是营（屯营、飞骑营）——团——旅——队。在这四级建制中，后三级和南衙十二卫一致，有专职将领，而营级将官则由南衙将军或大将军兼领，在行政级别上作拔高一级处理，显示出对于禁军的重视。

唐高宗龙朔二年到武周天授二年（691），屯营脱离屯卫，组建为左右羽林军。但是，独立后的羽林军官僚体系建设仍不完备，没有专任的羽林将军，继续由南衙诸卫长官兼领。这时的羽林军长官已经摆脱前一阶段称谓上的不确定状态，统一为某卫将军（大将军）检校羽林军。其中，飞骑可能仍保留营级建制。但有关将领级别等详细情况则无从查考。

武周天授二年后，羽林军建立了完备的职官体系，设大将军各一员，正三品；将军各一员，从三品。翊府中郎将、郎将，分别为正四品、从四品。此外，羽林军佐官有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曹参军事，品秩同于诸卫。有司阶、中候、司戈、执

① 《旧唐书》卷五九，《姜謩传》，第2333页。
②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192页。

戟所谓四色官，品秩、人数同千牛卫。羽林军的组织结构就成为军——府——团——旅——队五级，原则上都有专职的禁军将领，但我们仍能在有关石刻史料中看到府兵将领检校北衙禁军的实例。如王珙，圣历元年（698）以左玉钤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卫事[①]；马神威，久视元年（700）前以鹰扬卫将军检校右羽林卫将军。

并且，从军到队这一五级结构只存在于飞骑系统，由百骑发展起来的一系仍然保持营级建制，设专使领之。这些专使大多出自南衙诸卫。例如目前我们所知的左卫中郎将押千骑使杨执一，押万骑果毅陈玄礼、葛福顺、李仙鸟[②]，左领军将军押万骑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兼右万骑使白知礼、右骁卫大将军押左万骑使薛莫、右领军卫将军北军使鲜于廉都是如此[③]。从上述职名推测，百骑系统发展到万骑后，级别大体比照羽林军对待，而稍有降低。押万骑（军）的长官本职基本是南衙诸卫将军，其下有营，营一级的长官则由诸卫果毅担任。这种局面大约一直维持到开元二十七年（739）龙武军设置官署。显然，即使在府兵制逐渐废弃后，南衙诸卫将领的职名仍然存在，其中一部分便转化为禁军将领的寄禄之官。

此外，传世文献中提到有南衙诸卫折冲以下的将官进入禁军为展仗押官："开元初，卫士为武士，诸卫折冲、果毅、别将，择有行者为展仗押官。右羽林军十五人，左羽林军二十五人，衣

① 《全唐文补遗》第四辑，第399页。

② 《旧唐书》卷七，《玄宗本纪》，第166页。

③ 分别见《赠郎将葛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二三一，第2339页；《唐元城府左果毅葛公神道碑》，《张燕公集》卷一七，第182页；《白知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15，第1443页；《薛莫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49页；《鲜于廉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454页。

服同色。”[①]从有关墓志看来，这种转化可能在开元之前就已实行，如武后永昌元年（689）至如意元年（692），张仁楚以左金吾卫函谷府长上折冲押左羽林军飞骑上下[②]；公孙思观自武后圣历二年（699）至殇帝唐隆元年（710）为陕州河北府折冲都尉左羽林军宿卫押飞骑上下[③]。

南衙府兵将领涉入禁军系统大体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该将领本来出身于禁军内部，但由于禁军职官系统不完备，只能借用诸卫将领的职名为寄禄之官。这种情形在由百骑发展起来的龙武军一系比较突出。例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唐元功臣，他们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贯以南衙职名，但很可能一直服役于万骑系统。另一种情况是将领出身于南衙诸卫，后被调入禁军系统，他们原来在南衙的职名方转化成寄禄官。这一类型主要见于羽林军系统。府兵将领不同的涉入方式与禁军两系统各自的内在发展模式有关，其中，以飞骑为主体的羽林军一系更近似于正规军，与南衙关系相对密切；而万骑系统则私密性更强，与南衙关系较为疏远。

第二节　北衙禁军对于府兵职任的消解

如前所述，府兵的职任主要包括宿卫、征行和镇守。其中，宿卫是其针对中央的职责，而征行和镇守则针对边疆问题。此外，府兵还负责所在地团的防务与治安维系，这一点虽无制度明文规定，但可以从府兵分布上所反映出来的内重外轻的格局中得到体现。随着府兵制的解体，府兵的职任分别被其他军事系统接

① 《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第1289页。
②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382页。
③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99页。

管。其中，从征与戍守职责逐渐被节度使制下长期戍边的募兵所取代。地方防务方面，兴起于山东近边诸州的团结兵也成为地方戍守的新思路[①]。府兵更为重要的宿卫职责，则在很大程度上转入北衙禁军。

我们在第一章推测唐初宿卫的府兵约有十万人之多。这十万府兵在京师的生活空间大概有仗舍、助铺、武候铺（金吾铺）和屯营四种形式。

仗舍是守门立仗将士退居之地，大概宫城及皇城（包括离宫别馆）诸门外均有，宫城更是十步置一仗舍。除皇城及宫城之外，诸王、公主府第给卫士宿卫的也有仗舍。如《旧唐书》卷一八三："又相王、卫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卫士宿卫，环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于宫禁。"[②] 虽然说的是特殊时期、特殊人物僭越的情形，但也必有此前的制度作为基础。仗舍仅供立仗人退居，规模当不会太大。唐前期南衙诸卫随着府兵制的瓦解而逐步衰落，立仗制度也逐步萎缩，只有金吾卫还保有维持京师治安职能，并和北衙禁军一起分担仪仗职责[③]，金吾仗舍也因此发展成金吾仗院[④]。

另一种形式是助铺。据《新唐书·仪卫志》：左右卫和左右骁卫在皇城四面以及宫城内外分知助铺之职；左右威卫分兵主守皇城东西面之助铺；左右领军卫则分兵主守皇城西面助铺。这里

---

① 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文史》第25辑，第95—108页，1985年。

② 《旧唐书》卷一八三，第4738—4739页。

③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燕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先一日，金吾引驾仗、北衙四军甲士，未明陈仗，卫尉张设，光禄造食。"可见玄宗朝一般仪仗只用金吾卫和北衙禁军。

④ 《长安志》卷六："龙朔二年造蓬莱宫含元殿，又造宣政、紫宸、蓬莱三殿。……东有通乾门，西有观象门，阎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又有金吾左右仗院。"

所说的助铺，大概紧靠宫城和皇城而建，是府兵小规模的屯据点。除宫城、皇城这样的国家公共建筑外，亲王及部分公主宅第亦有助铺。如《旧唐书》卷一八三记云："太平、长宁、安乐三公主置铺，一如亲王。"① 《唐律疏议》卷八云："诸于宫门内外若皇城门守卫，以非应守卫人冒名自代及代之者，各徒一年。疏议曰：谓宫城门外队仗及傍城助铺所及朱雀等门所有守卫之处。"② 可以约略想像助铺的主要职能及重要程度。总的说来，助铺和仗舍有相似之处，都是京城重点保卫地区的屯兵之所，不同的是，仗舍专为立仗卫士退居之用，而助铺则为普通警卫屯驻之所。

除长安外，东都也有关于助铺的记载。如《旧唐书》卷三七："（开元十八年六月）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漕渠斗门，漂损提象门外助铺及仗舍。"③

助铺的规模不会太大。《唐会要》卷八六云："（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敕：两京城、皇城及诸门并助铺及京城把守捉兵之处，有城墙若门楼舍屋破坏须修理者，皆与所司相知，并量抽当处职掌卫士，以渐修营。"④ 据此看来，"当处职掌卫士"已经足够修缮助铺所需人工，则助铺或许有房舍若干间，供府兵屯驻之用。

第三种是武候铺（金吾铺）。《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骕骦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⑤ 武候铺与助铺职能大体相当，但它隶属于武候卫，也就是后来的金吾卫。根据职责分

① 《旧唐书》卷一八三，第4738页。
②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第628页，中华书局，1996年。
③ 《旧唐书》卷三七，第1358页。
④ 《唐会要》卷八六，第1584页。
⑤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第1285—1286页。

工，主要负责城门和坊里的警卫。武候铺的戍兵人数有明确记载，据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助铺的人数。

以上三种宿卫形式终唐一代一直没有改变，府兵解体后则由骠骑负责。

第四种形式是屯营。屯营原本是战时屯兵营垒，并不带有军事建制的含义。但是，由于戍守京师、保卫皇帝是一项长期任务，因此在京师地区，平时也有屯兵之营。下面将有关南衙屯营的史料按时间排比如下：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闰六月）丁巳，诏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胡注曰：“左右十二卫屯营也。”自然是指南衙屯营。

《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筑九州鼎成，“自玄武门来曳入，令宰相、诸王、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这里十万人虽是总南北衙士兵之和而言之，但当时北衙禁军还在发展之中，来自南衙屯营者当占绝大比例。

《新唐书》卷七六《韦庶人传》：“（景龙三年）帝遇弑，议者谨咎秦客及安乐公主。后大惧，引所亲议计，……与兄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列府兵五万分二营屯京师，然后发丧。”既云府兵，则为南衙屯营无疑。

《旧唐书》卷一〇〇《王志愔传》：“开元九年（721），上幸东都，令充京师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及左右屯营押官谋反。夜半时拥左屯营兵百余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将杀志愔，志愔逾墙避贼。俄而屯营兵溃散，翻杀梁山等五人，传首东都。”对照现存的长安城图我们知道，顺义门外是布政坊，而景风门外是永兴坊。这两坊根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正是左右金吾卫所在地，这意味谋反的屯营属于南衙，或许就隶属于金吾卫。

《唐会要》卷七二："开元十年（722）九月二十七日敕，驾在京，左右屯营宜于顺义、景风门内安置，北衙亦著两营，大明北门安置一营，大内北门安置一营。"这条记载是唐廷针对权梁山事件所作的反应。在事件发生后，长安守备得到加强，不仅涉及南衙屯营，北衙留守部队也在加强之列。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凡幸三（西）京，即东都南、北衙，皆置左、右屯营，别立使以统之。若在都，则京城亦如之。"仍然像是针对权梁山事件所作的制度调整。

开元以后屯营的规模不确知，但从权梁山谋反事件仅涉及屯营兵百余人可以看出，唐前期南衙屯营人数一直呈递减趋势。正因为如此，受到权梁山叛乱冲击的唐廷才在开元十一年招募长从宿卫，用以取代已经衰落的府兵。

权梁山之乱后，唐玄宗惩于皇城治安的虚弱，将左右屯营移入顺义、景风门内安置，但在此后，屯营发挥的作用更为有限。天宝十一载（752），邢縡与龙武万骑谋杀龙武将军，以其兵作乱。事情败露后，邢縡及其党羽逃跑至皇城西南隅，被高力士带领的四百飞龙兵讨平[①]。唐设南北两军，原为互相牵制，但到邢縡作乱时，虽然进入南衙领地，南衙驻军却已无力约束。这时的南衙屯营兵源自然已经由府兵改为骧骑，但它所反映的南衙日弱、北衙日强的态势却可以上溯到府兵存在的时代。

按照前述制度规定，南衙屯营设专使统领。但到开元年间，它与金吾卫的关系似乎愈来愈密切。权梁山事件中，叛军选择顺义、景风两门作为突破口，表明他们的原驻地就在这两门之外。我们知道，顺义门外是布政坊，而景风门外是永兴坊。这两坊正是左右金吾卫所在地，这或许暗示着南衙屯营此时和金吾卫之间的特殊关系。整个唐前期，特别是玄宗一朝，随着府兵制的解体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三月条，第6911页。

和北衙禁军的兴起，南衙诸卫的军事职能逐渐萎缩，而金吾卫主要负责京师治安，本来与其他诸卫的职能并不相同，因此并不特别受到影响。一个显著的例证便是其职能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也依然存在。“安史之乱”后，肃宗还京。大权在握的宦官李辅国上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以备巡检。”同平章事李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肃宗遂罢此议。[①] 这说明即使在“安史之乱”以后南衙力量极端不振的情况下，金吾卫仍然维持了警夜的正常职能。那么残存的南衙屯营兵力，或许也就都归入了金吾卫之中。

南衙诸卫在唐前期处于不断萎缩之中，但是，它的各项职能仍然存在。这样一对矛盾的解决方式是：许多原来由南衙府兵承担的职责转入北衙禁军系统。我们在第二章谈到过羽林军对于唐前期宿卫与仪仗制度的影响，这里仅通过长上制度来看一下北衙禁军兼并南衙诸卫的趋势。

长上是对应于番上而言的，是府兵番上宿卫中央的一种变体。称为长上的将士没有番期，终年服役。相对而言，他们比番上的士兵素质更高，也更为统治者所亲信。府兵本来有宿卫长安城各门的任务，玄武门也是其中之一，故而就有一些府兵被派往北门长上。我们推测，在武德年间，府兵番上体系并未完全确立，因而玄武门宿卫可能全部由府兵和王子兵中的长上负责。

玄武门之变后，虽然渐有专职的北衙禁军，但在玄武门宿卫中，长上仍然是重要角色。这一点，可以从长上将领和士兵两方面得到体现。将领如常何，于玄武门之变有功，政变后除真化府

① 《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揆传》，第3560页。

折冲，特令长上，贞观十二年，迁右屯卫将军[①]。从常何前后经历看来，他所任固然是南衙长上，但实际任职的地点则是北衙。又如魏哲，“贞观十五年（641），起家补国子博士，……十六年，敕授左翊卫北门长上，禄赐同京官，仍令为飞骑等讲礼。……二十年，诏除游击将军右武侯信义府右果毅都尉，长上如故。……（显庆）三年（658），诏除左卫清宫府左果毅都尉，寻圉谷府折冲都尉，并长上如故。”[②] 三任俱是南衙将领，但实际长上的地点则在北门。再如李君羡，贞观中为左武候中郎将，封武连县公，北门长上[③]；薛仁贵，贞观末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北门长上，寻迁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长上。永徽五年（654），高宗幸万年宫，甲夜，山水猥至，冲突玄武门，宿卫者散走。仁贵曰：“安有天子有急，辄敢惧死?”遂登门桄叫呼，以惊宫内。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上使谓仁贵曰：“赖得卿呼，方免沦溺，始知有忠臣也。”[④] 可见其时仍在北门长上。此外还有左清道率频阳府长上果毅康留买，高宗朝北门长上[⑤]；崔献，自麟德元年（664）先后任左威卫果毅、折冲，一直于右羽林军长上[⑥]；左金吾卫郎将裴昭，唐隆元年（710）北门长上[⑦]。以上将领都带南衙武官职，同时又在北门长上，成为北衙将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开元后期，担任部分南衙武官的蕃将长上北门已经形成一种制度：“蕃人任武官者并免入宿，任三卫者配玄武门上，一日

① 《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4页。
② 杨炯：《唐将军魏哲神道碑》，《全唐文》卷一九四，第1968—1969页。
③ 《新唐书》卷九四，第3837页。
④ 《旧唐书》卷八三，《薛仁贵传》，第2780—2781页。
⑤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453页。
⑥ 《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全唐文》卷一九六，第1988页。
⑦ 《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04页。

上，两日下，配南衙者长番，每年一月上。”[①]则所有供职于南衙内府三卫（亲、勋、翊）的番官都被安排到玄武门，分作三班轮流服役。

南衙士兵中，也可以看到许多长上北门的例子，如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阿史那社尔为右军大将军检校北门左屯营，“领屯卫飞骑及长上宿卫之兵奋不顾命，所向无前，……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②] 可以看出，当时在北门屯营当直的除了飞骑禁军外，还有“长上宿卫之兵”，他们或许便是随本府长上将领一起屯驻北门的兵卒，但都归于检校北门左屯营的将军阿史那社尔麾下。毛汉光先生在《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一文中考证出曾到两京长上的军府共 61 个，其中，分布在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附近者占总数之 93.5%[③]。这些长上者固然并不都到北门长上，但据此推测北门长上军府的地理分布也应类似于此。

据现有史料看，唐前期左右卫、左右领军卫、左右武候卫（金吾卫）、左右清道率等南衙诸卫都曾有兵力长上北门。北门长上者的身份是府兵将士，但是由禁军将领统一指挥，这从前引阿史那社尔率领飞骑与长上士兵共同作战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些长上士兵后来的发展情况固然由于史料缺乏而无从知晓，但是，“安史之乱”以前，北衙禁军一直呈扩大的态势，因而并不排除将长上的南衙府兵吸收进来以扩大现有兵源的可能。

唐前期北门长上的存在本来具有南北衙力量共同承担北门防务的意义，但是，长上者被编入禁军则同时体现出北衙禁军对于南衙诸卫人员与职任的吸纳。目前所知南衙将领番上北门的最晚记录出现在天宝年间，据 S. 2703/3 号《敦煌郡牒文抄目及来符

① 《唐六典》卷五，第 154 页。
② 《册府元龟》卷三九六，第 4698 页。
③ 《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 5 卷第 1 期，第 111—171 页。

事目历》云："敕东京北衙右屯营使牒，为果毅李延言违程不到事，廿四日判，牒上东京右屯营使迄。"这是一条天宝八载（720）的文书，此时府兵制已近尾声，但是，果毅李延言还是需要到东京洛阳的北衙右屯营番上①。大概从此之后，随着府兵制的瓦解，真正意义上的长上北门者都被并入禁军②，而南衙诸卫在北门的势力也被彻底消解到北衙禁军中。

十二卫外府如此，内府亦然。原来五府三卫作为十六卫中与皇帝关系最为亲密的军队，所承担的一些职务也被北衙禁军取代。隋代跟随帝王出征的是亲、勋、武三卫（侍），《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云："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炽之孙也，亦亡命在太原。"可见当时内府三卫有跟随皇帝亲征的职责。这种制度直到唐初依然存在，甚至到了从行三卫不堪劳顿的地步，为此，贞观二十二年（648）敕牒还特别提出要惩罚三卫"假托事故，方便解免"的行为③。但是，到唐太宗以

---

① 《英藏敦煌文献》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0页。参见菊池英夫：《从西域出土文书看唐玄宗时代府兵制的运用》（上、下）分别见《东洋学报》第52卷第3号，1969年12月，第22—53页；第4号，1970年3月，第52—88页。

② 当然，随着府兵制的瓦解，折冲、果毅乃至别将等府兵体制下的武官渐成虚官，他们往往被授予禁军（也包括边军）系统中的武职，以作为寄禄之官。这一点，在开元前期唐元功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李怀，释褐右卫扶风郡左果毅长上（《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156页）；宋庄，释褐左领军卫匡道府折冲，长上内供奉（《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468页）。两位唐元功臣释褐即为长上，显然与他们所挂职的折冲府并没有关系，这些功臣都出身于万骑营，应该就在万骑长上，开元二十七年（739）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转入龙武军系统。这一类型的长上在龙武军系统长上武官中应占很大比例，但并非原始意义上的北门长上。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三），第30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录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参见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第148—1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后，此项职责渐被北衙禁军取代。这一点我们在第二章羽林军的职能部分已经论证，兹不赘述。

唐初三卫作为亲兵与皇帝关系密切，因此常常作为皇帝的代表，被派遣随从护卫大臣或是贵戚，以示优礼。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贞观年间，诤臣魏征拜扫还乡，太宗遣三卫二十人从，仍借殿中马三十匹护送①。北衙禁军兴起后，飞骑、万骑逐渐承担起类似任务。神龙二年（706）秋，宰相魏元忠请归乡拜扫，中宗特赐锦袍一领，银千两，并给千骑四人，充其左右②。景龙中，安乐公主“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撤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殚，假万骑仗、内音乐送主还第。”③

三卫来源于官僚贵族子弟。在关中本位政策下，三卫入侍体现了皇帝与官僚贵族共制天下的原则，是府兵中皇帝最为亲近的力量。但是，随着关中本位政策的终结以及府兵制的解体，三卫的象征意义不复存在。《唐故左金吾卫将军河南阎公（用之）墓志》称：“先是有司以三卫执扇登殿引跸，公奏曰：‘三卫皆矫悍有材力，不当升阶陛，迩御座，请以宦者代。上（玄宗）曰可，遂为故事’。”④ 开元年间三卫执扇登殿引跸的职责被宦官代替，这一变动与三卫代表皇帝私人优礼大臣的职责被北衙禁军取代有着相同的背景，反映了皇帝所依靠的武装力量由内府到内廷的变迁。这与同一时期中国社会逐渐消除贵族政治残余，逐步确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恰呈同步态势。

不仅中央宿卫，府兵在地方防务方面的职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北衙禁军取代。如前所述，府兵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宿卫、边

① 《魏郑公谏录》卷四，《对百姓安否》。
② 《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第2953页。
③ 《新唐书》卷八三，第3655页。
④ 《全唐文》卷三九二，第3985—3986页。

地战争和戍守，也在于军府所在地的镇防。作为唐朝统治基础的关陇、河东、河南地区，在府兵制时代曾经军府密集，以实现守内虚外、巩固根本的战略原则，这些地区的核心地位并未随府兵制的瓦解而改变，那么，唐廷也必然不会完全漠视府兵制解体后重兵屯边、中原销兵的危险格局。

有关研究表明，武后一朝，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相继出现团结兵。开元八年以后，团结兵的范围又扩展到关内、陇右、河西，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原本由府兵担任的镇防职责[①]。其实，不仅团结兵，北衙禁军在地方的发展可能也存在着同样的考虑。如前所述，飞骑的选取范围以“京旁州府士”为主，纳资飞骑的地域范围当更加广泛；而万骑则来自于居住长安城里的唐元功臣子弟和外州。二者包含的地域范围可能已经趋近于唐初主要军府所在地。

飞骑和万骑都实行上番制度，番满则回到当州；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纳资飞骑、万骑。他们的存在可能也是唐朝在府兵制瓦解之后解决核心地区防务的新出路之一。《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命吕休璟等北伐制》云：“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将番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这里的“武用绝群飞骑”与“番汉兵募健儿”及“城傍”并列，又参与北伐，颇疑是河东地区番下的飞骑；同书卷一〇七所载开元二十七年（739）《遣荣王琬往陇右巡按处置敕》更加明确：“宜于关内及河东纳资飞骑并诸人中间召取健儿三五万人。”关内及河东是唐都长安与北都太原所在地，也是唐初军府密布的地区。在府兵制瓦解之后，北衙禁军系统中演化出自己的地方力量，他们平时作为受过训练的士兵震慑地方，在需要时便可以随时调动，开赴疆场。仅就这一点而言，他

①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234—236页。

们和唐初的府兵并无不同①。

吴宗国先生曾基于开元十六年（728）部分骧骑并入羽林一事，提出了“禁卫合流”的概念。虽限于体例未作更多论述，但仍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思路，它揭示出唐前期北衙禁军对于南衙卫兵在人员与职任上的双重吸纳。府兵制的解体是唐代政治史上一个巨大的变化，它不仅涉及规模庞大的府兵的走向，也涉及府兵所承担的全部职任的转移，这两点在唐朝都进行得相当顺利。这是因为，虽然府兵制的解体以开元十三年（725）骧骑代替府兵承担南衙宿卫及天宝八载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为标志，但其他军事力量对府兵职责的浸润从唐初即已开始。在边疆，募兵及其戍守的军镇逐渐代替了府兵和原有的镇戍体系；在中央，北衙禁军的出现本身便是对府兵制的消解。随着北衙禁军的发展，他们从参与北门守卫到专任北门守卫，长安城的戍守也由以南衙屯营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北门屯兵。到开元天宝时代，南衙诸卫中只有金吾卫还依然活跃，承担长安城的治安职责。

府兵在人员上的大规模分流则开始于高宗龙朔二年（662），禁军成为吸纳府兵精华的主要方式。开元十一年（723）以后，部分府兵进入骧骑系统，其中又有一些在开元十六年后进入禁军序列。由于统计数字的缺乏，我们无法清楚地说明到底有多少府兵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禁军，但是，从开元二年（714）一次就能够抽调二万飞骑和五万多万骑来看，这一数字应当是惊人的。这些选拔自各地的禁军同时成为在重兵屯边的情况下解决中原守备的途径。这样，经过唐初以来百余年的发展，到开元时代，府兵制已经只剩一具躯壳，它的瓦解自然不会引起震撼了。

---

① 当然，从“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北衙禁军并未发挥防卫地方的应有职责。但是，这应该归结为同时期禁军本身的败坏，而不能据此认为唐政府没有让他们发挥防守职能的想法。

余论　唐前期北衙禁军的渊源及走向

第一节　骁果、给使营与唐代的北衙禁军

唐长孺先生指出，专司北门守卫禁军的出现，乃是由于府兵本质自隋代发生变化，由西魏北周时期的部落兵演化为普遍征发百姓而来，随着这一演变的完成，府兵不再具有皇帝亲兵的特质，皇室需要有一支更为可靠的军队来执行戍守皇宫的职责。隋代出现的左右宗卫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出路，但宗卫仍是担任禁卫的诸府卫中的一支，不在府兵系统之外，且兵源限于杨姓宗人，数量不可能很大[①]。笔者同意唐先生将禁军的出现与府兵本质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考虑，但是，宗卫的作用，却仍有商榷的余地。据《隋书》卷二八《百官志》，宗卫是太子诸率之一，其地位比照左右武卫，在以皇帝为中心的禁卫系统中并不占重要位置。左右宗卫在唐代也曾一度存在："左右司御率府，龙朔二年（662），为左右司御卫。咸亨元年（670），改宗卫。景云二年（711）八月二十八日，改为司御率府。"[②] 仍然是太子系统的武装力量，可以反证宗卫在隋代的地位和作用。

---

①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38—44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唐会要》卷七一，第1289页。

其实，隋代确实曾经试图对府兵制变化的局面作出回应，只是其努力的方向不在宗卫，而在骁果和给使营；其起步的时间，也不在文帝，而在炀帝。

有关骁果的专论，以气贺泽保规先生的《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和黄永年先生的《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二文最为重要[①]。

气贺泽先生认为，隋炀帝增加军府，使之扩展到关中以外地区，大大改变了隋文帝施行的关中本位政策，将统治立足于更广泛的基础之上；同时，这一举措也是向兵民一致的征兵制方向继续发展，不再把兵源限定在特定地区。但是，改革之后的军事组织作战能力并不强，这在大业八年（612）远征高丽的失败中可以得到清楚的体现。在此之后，炀帝开始考虑以一种新的兵制来代替府兵，这就是骁果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进而认为，骁果制是对府兵制的补充，因为骁果隶属于府兵诸卫系统的左右备身府下，并没有设置其他独立的组织，统领骁果的将领，也多出自十二卫系统，这说明，炀帝并没有使骁果从府兵中独立出来。气贺泽先生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骁果是对于原始意义的府兵制的回归。骁果的基本构成是关中籍兵士，避免关中军事力量解体的危机意识，导致了骁果在炀帝末年的反叛；骁果举家免除赋役，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兵户制；骁果的上下级关系，带有私人朋附性质，有类于早期的乡团。因此他得出结论：骁果制在管理体制上

---

① 气贺泽保规《骁果制考——隋炀帝兵制的一个侧面》，原载《鹰陵史学》第11号，1986年；此据汉译文《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见《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第94—103页；日文原文收入气贺泽保规《府兵制的研究》，第239—266页，京都同朋舍，1999年。黄永年《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燕京学报》新三期，第153—169页，1997年8月。收入作者《文史探微》，第119—137页，中华书局，2000年。此外，娄建勇撰《隋末骁果兵浅探》，载《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

与府兵制十分接近，但应征将士则有决定性差异，它从本质上讲是向早期府兵制的回归。这种观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回归说”。

与气贺泽先生的回归说相反，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非常强调骁果对于唐以后军制的意义，认为募民为骁果是我国兵制史上一次有重大影响的变革，说明在大一统的局面下，继续实行地区政权的府兵制是行不通的，而必然要走上募兵化的道路。这种观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开启说”。

由于回归与开启指向的相反，二位先生对于一些相同的史实也做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例如，在正史上留下名字的骁果统帅大多都是十二卫长官而不是备身府骁果系统的长官，气贺泽先生认为这表明骁果并未从府兵系统脱离，黄永年先生则将其与唐前期羽林军官由南衙十二卫将领检校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体现了府兵制解体、府兵官员虚官化的历程。

二位先生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隋代的兵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更关心这一新的制度与唐代北衙禁军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无疑，骁果和北衙禁军存在很大差距。首先，二者产生的目的和作用并不相同。大业八年（612），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失败，次年（613）正月，“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①] 可见，征集骁果自然是为解决由于这次失败而造成的兵源不足和士兵战斗力减弱等问题。此后，骁果一直与隋末战争紧密相连，如第二次征高丽、平定杨玄感叛乱、解炀帝雁门之围乃至在长安以东抗击李渊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骁果也执行护卫皇帝的职责，但这并不是隋炀帝招募骁果的初衷。而唐代北衙禁军建立之初便立足于保卫皇帝与皇室的基础上，它虽参与战争，但基本

① 《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下，第83页。

上仅仅是在皇帝亲征的情况下以侍从的身份参战，其战斗职能附属于护卫职能，从未像隋朝的骁果那样成为主力部队。因此，在职能方面，有理由从公与私的角度来区分骁果与北衙禁军。

其次，二者的组织系统也有很大差别。骁果隶属于左右备身府，由与备身府正副长官品秩相同的折冲郎将、果毅郎将各三人掌领。骁果具体统属于左右雄武府，置雄武郎将领之。以武勇郎将为副员，同鹰扬、鹰击郎将①。武勇郎将之下还有校尉。据此可知骁果的编制基本同于府兵。除折冲、果毅、雄武郎将、武勇郎将这些专职的骁果统帅外，我们还在有关史料中看到以诸卫将军、鹰扬郎将（鹰击郎将）或虎贲郎将（虎牙郎将）统领骁果的实例，如《隋书》卷八五《司马德戡传》云："大业三年，为鹰扬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武贲郎将。炀帝甚昵之。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因隋末大乱，乃率骁果谋反。"

这样看来，气贺泽保规先生有关骁果与府兵关系的比较无疑有其道理："骁果是原有的府兵暴露出已无法发挥有效军事机能之后在左右备身府下组建的，其实际活动范围已超出炀帝亲军之外，指挥者也不限于备身府军官，因而由此进一步推想，骁果与府兵的差距似乎并不十分显著。"但是，这一结论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气贺泽先生有关"骁果活动范围超出炀帝亲军之外"的立论基础是炀帝在江都时，长安和洛阳附近也有骁果屯驻。但是，长安和洛阳一直是隋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和都城所在，骁果集结于这些地区并不能改变其亲兵性质。考虑骁果出现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骁果确实作为亲军存在，只是隋炀帝招募骁果并非针对府兵与皇帝亲密程度下降，而是针对府兵战斗力的下降。这一点使之更像是对府兵的补充，而与唐代的北衙禁

① 《隋书》卷二三，《百官志》下，第800—801页。

军有本质的差别。

尽管如此，骁果和唐代的北衙禁军，特别是羽林飞骑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是招募而来。隋炀帝募民为骁果，标准不详。但“骁果”一词所隐含的“骁勇果敢”之意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选拔原则，《隋书·沈光传》所谓“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①，将“骁果”作为形容词使用，是对选拔标准的最好说明。唐代北衙禁军中，飞骑的拣选标准是：“取户二（六）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② 百骑来源复杂，但也以骁勇为首要原则。

其次，二者都免除全家赋役。大业九年（613）八月，隋炀帝诏曰：“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③ 而唐前期也有类似针对北衙禁军的规定：“（天宝六载）正月戊子，有事于南郊，礼毕，下制曰：‘征行之家，每令存恤，差科之际，或未优矜。自今已后，并准飞骑例蠲免。’”④

第三，二者兵源都以关中地区为主。炀帝末年，留连江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⑤ 虽然骁果之中也有许多出身于江南系统，但据气贺泽先生分析，南方骁果恐怕是隋炀帝后来招募的，而关中系统的骁果则应当在骁果制产生之初即已组成⑥。唐前期北衙禁军的兵源，唐隆政变之

---

① 《隋书》卷六四，《沈光传》，第1513页。

②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1页。

③ 《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下，第85页。

④ 《册府元龟》卷八六，第1021页。

⑤ 《隋书》卷八五，《宇文化及传》，第1888页。

⑥ 参气贺泽保规前揭文，第99—100页。唐代“安史之乱”后，也有飞骑出自剑南道，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云：“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严中丞指严武，肃代两朝任剑南节度使。诗中所描述的飞骑家在剑南，应该是“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入蜀后招募的。

前的万骑出身已如表八所示，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为主；此后大量吸收功臣子弟，仍然多出自京师地区。飞骑的状况与之相似，开元十二年（724），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①，更使京师附近成为稳定的飞骑选拔地。

第四，京师恶少在二者之中都占很大比例。隋代最著名的例子如沈光：

> 沈光，字总持，吴兴人也。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皇太子勇引署学士。后为汉王谅府掾，谅败，除名。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记，微有词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驰，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余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②。

唐代虽然没有出现沈光这样的代表人物，但京城恶少名系诸军也由来有自。《唐语林》云“京城恶少及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③，虽然说的是唐后期情形，但禁军既然是招募骁勇而来，那么唐前期剽悍的京师恶少在禁军中应当也占一定比例。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在第四章已有专门论述，不赘。

---

①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1页。
② 《隋书》卷六四，《沈光传》，第1513页。
③ 王谠：《唐语林》卷一，《政事》上，第73页，中华书局，1987年。

最后，骁果和北衙禁军都是一种身份，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骁果与飞骑作为头衔进入墓志。唐代飞骑墓志前几章已经引用，兹不赘述。隋骁果墓志则如《刘世恭墓志》："大隋京兆郡大兴县进贤乡左备身府故骁果刘世恭，以今年十月廿日，于河南郡崩逝，以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十一月乙丑朔十四日壬寅，葬于城东白鹿原浐川乡之原。"① 无论隋代还是唐代，普通府兵都不会在墓志中表现出来，骁果和飞骑的入衔恰可以反映出他们区别于府兵的特殊身份。

上述几点中，气贺泽先生解释过骁果全家免除赋役、私人朋附关系发达以及以关中为主要兵源地的含义。那就是，骁果是向西魏、北周乃至隋初府兵原始形态的回归，他还特别指出骁果作为皇帝亲军的荣誉问题。当然，气贺泽先生是用以证明"骁果制是府兵发展史上的一环"，我们却可以从中体会到北衙禁军的精神实质。事实上，所谓府兵原始形态正是一种亲兵形式，在这种形态下，府兵被贯以所属将领的姓氏，形成模拟亲缘关系，从而达到效忠于统帅的目的②。军队与统帅（无论是将领还是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隋代骁果乃至后来唐代北衙禁军的身上重演，并成为他们与同时代的府兵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组建一支和皇帝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军队是根本目的，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隋炀帝已经不可能再去模拟部落兵制。于是，以优厚的待遇募兵并给予其亲兵的荣誉成为他加强骁果向心力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唐代北衙禁军身上同样有效。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倾向于黄永年先生的开启说，即隋炀帝针对隋代变化了的政治、军事环境创立了新的制度，这种制度中的一些重要因子为以后具有相似背景的唐王朝所采纳。如所周知，募兵成

---

① 引文见《考古学报》1956 年第 3 期，第 52—53 页。

② 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13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为唐朝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在开元时代，但是，北衙禁军以募兵为主却从唐初即已开始。而且，北衙禁军文属屯卫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性也与骁果和备身府的关系相似。这样看来，虽然菊池英夫先生对于骁果是“以募兵为基础之家有军队”① 的判断虽然还为时尚早，但是，说唐代的北衙禁军特别是羽林飞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模仿了骁果制则并无不妥。

与唐代北衙禁军更为相似的是给使营。史载“（炀）帝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江都之难发生时，已经作了宇文化及内应的司宫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遂使仓猝之际，给使营无一人在者，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护卫作用。江都事变后，宇文化及西归，以折冲郎将沈光骁勇，使将给使营于禁内。沈光等人谋以给使营袭宇文化及，事觉，“杀光，其麾下数百人皆斗死，一无降者”②，表现出对炀帝迟到的忠诚。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给使营出身官奴、屯驻玄武门以北，他们由隋炀帝直接指挥，负责炀帝私人安全。这些特点都有类于唐代的百骑系统。给使营出现的具体时间史籍无考，但是，炀帝到江都后，“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衣短巾，策仗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③ 又常以瓮贮毒药自随，准备临难自杀，不安全感非常强烈，为防备紧急情况而设立的给使营恐怕便形成在这一时期。

综上可知，针对府兵制度本质变化所引起的府兵战斗力不强、与统治者亲密性减弱等问题，隋炀帝曾经试图加以解决，这

---

①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展开》，《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5卷，第419页，1970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第5780—5784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第5775页。

便是骁果和给使营出现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两种新的军事力量都诞生于隋末干戈扰攘的时代，其发展过多地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而未能充分完善。其中，给使营在江都之变后宇文化及西归途中全军覆没，骁果则愈来愈向战斗部队靠拢，亲兵成分逐渐减弱，最后融入隋末蜂起的各支武装力量中。

继起的唐朝重建了府兵制。唐初府兵制虽然与隋炀帝时代有一些差异[①]，但并无本质区别。府兵之外，唐太宗又建立了北衙禁军。北衙禁军充分吸纳了这两种制度的优势，其中飞骑的许多特性来自于骁果，而百骑在最初组建时与给使营极为相似。可以说，隋炀帝对于兵制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实践在唐代得以最终完成。唐前期完善的过程也就是修正的过程，羽林军一系吸收了骁果在人员构成方面的优点，但屏除了其过多参与军事活动而膨胀的问题，使之收缩为更加纯粹意义上的天子亲军；龙武军系统则在发展中拓展了军队的来源，使之向正规化迈进。

第二节　唐前期君主专制的强化与禁军的走向

从唐初到玄宗开元末年，北衙禁军从无到有，由弱至强，建制逐步完善。它的演进与同时期皇权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在第一章说过，唐初北衙禁军的出现与同时期军队国家化的进程紧密相连。随着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掌权以及贞观年间府兵制的确立，全国武装力量统一于卫府系统之下。府兵兵籍分掌于兵部、卫府、州县三系统，全国各地的折冲府名义上隶属于诸卫，实际上由兵部指挥，而真正的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唐初的

① 参毛汉光《隋唐军府比较研究》，第119—157页。毛汉光先生认为，唐初军府较之隋炀帝时代向关中地区收缩，因而更类似于隋文帝时代。

兵制被概括为以府兵制为基础的中央军制，它在维护中央集权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皇帝制度的存在，中央集权与皇权往往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维护中央集权与维护皇权具有一致性。唐初十六卫既是国家武装力量，又担当宫廷宿卫，其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传统社会号称“朕即国家”，这种说法的理念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事实上，皇帝虽然作为专制国家的总代表，有其从属甚至统一于国家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一些与国家公共运作关系不大的私人利益与要求。并且，由于皇帝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这些仅仅服务于他个人及其家族的机构也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例如，秦代九卿中，为皇帝服务的有掌管祭祀礼仪的奉常，守卫宫殿门户的郎中令，掌管宫外警卫的卫尉，管车马的太仆和管皇帝私产的少府。而同时期管理国家事务的则有管军国财政的治粟内史，管司法的廷尉，管京师治安的中尉，管建筑的将作少府，管诸侯的主爵中尉，管少数民族的典属邦。为皇帝家族服务的机构多于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反映出帝制社会早期，国家机构是从氏族部落长的家族组织发展起来，氏族长成为君主，他的家仆也就成为朝廷官吏，所以宫府一体，职事相连[①]。

秦汉以后，处理皇帝家事与国事的机构日益分开。以门下省为例，其前身在东汉本来是少府属下的机构，掌侍从左右，给事禁中，属于皇帝私人势力，但是，在皇权与相权相维而又相争的背景下，它逐渐掌握平章尚书奏事和覆核诏书的权力。这样，门下省最终脱离少府，向外廷发展。隋初门下省还兼掌供奉之职，统殿内、御府、尚食、尚药等局，到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这

① 孙钺：《第一个封建集权制的官僚机构——秦职官简介》，杨志玖主编《中国古代官制讲座》，第60—64页，中华书局，1992年。

些部门另外组建殿内省，门下省成为专职的封驳机构。门下省的演变历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服务于皇帝个人和服务于封建国家的机构逐渐分离；二是皇帝不断通过信用私人势力来加强对于政权的控制。

北衙禁军建立和发展的背景正是如此。府兵本来就是天子亲军，但是，隋朝府兵制本质发生变化后，它的亲军性质逐渐弱化，主要演变成国家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北门禁军应运而生，承担皇帝私人防卫。北衙禁军最初隶属于南衙屯卫之下，此后逐渐脱离卫府系统，成立专职禁军，这一过程与中国传统社会向前发展所形成的公私之别是一致的。

公私之别的另一个表现是皇帝私属机构原则上不参与外廷政治。唐代专掌皇族及宫廷事务的机构包括宗正寺、殿中省和内侍省，此外，少府监也分掌皇帝服御器用。这些机构的职责都是事务性的，不关涉国家公共生活。以内侍省为例，它在唐初“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唯门阎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①]；殿中省长官经常由外戚或幸臣担任，开元初年，玄宗故人、先天政变功臣姜皎任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命之舍敬，曲侍宴私，与后妃连榻，间以击球斗鸡，常呼之为姜七而不名也。”但开元五年（722），却被解除政事，放归田里[②]。玄宗初年另一位殿中监李令问是玄宗藩邸旧臣，“特承恩宠，未尝干预政事”[③]，方得以始终保全禄位。

北衙禁军也是如此。我们在第三章谈到前期唐元功臣集团的覆灭以及禁军内部迁转机制的建立，打击以王毛仲为首的前期唐

---

① 《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第5855页。

② 《旧唐书》卷五九，《姜皎传》，第2334页；《新唐书》卷九一《姜皎传》略同。

③ 《旧唐书》卷六七，《李令问传》，第2482页。

元集团，可以视为对于禁军将领插手南衙的警戒，而内部迁转机制则从制度上阻截了禁军将领向其他系统发展的道路，北衙禁军从此被固定在专职亲兵这一特定的活动范围之内，避免了对于国家政治更大的干涉。

公私之别是中国封建政治向前发展的经验之一，但是，帝制时代的另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便是皇帝信任内廷势力，以之抗衡外廷，以便自己居中掌握，提高皇权。唐前期政治演进的基本趋势之一便是内廷势力影响的不断扩大，这一取向引起外廷相关部门的衰落。其中，北衙禁军在组织、人事、司法等方面逐步脱离南衙，形成准内廷体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随着北门禁军势力的不断壮大，南衙卫士，无论是府兵还是骧骑，都日渐萎缩[①]，两相对比显示出唐前期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

内廷势力的扩大并不仅表现为北衙禁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宦官势力的抬升。唐初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武后时，宦官人数增多，但尚不用事。中宗朝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而衣绯者仍寡。唐玄宗崇重内廷，内侍省衣绯紫者多达千人，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宦官手中。宦官还控制了南衙十六卫中的监门卫，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贵幸者如杨思勗、高力士、黎敬仁等，都在开元中担任此职，掌握了部分宿卫之权[②]。他们还通过兼领军事使职来扩充权力，监军

---

① 开元十一年，玄宗拟东封泰山，而府兵制堕坏，以至宿卫不给，张说遂建议募兵，号长从宿卫，后改称骧骑。开元十三年，张说招募的十二万骧骑正式取代府兵，宿卫南衙。骧骑实行六番制，因而，长上中央者当有二万人。但是，到开元十六年，骧骑弓手已经改隶羽林军。以后，骧骑渐失巡抚，人员日益散耗，实力大为下降。参《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相关部分及《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第3049—3057页。

②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总论》、《杨思勗传》、《高力士传》，第4755—4758页。

使、招讨使、内飞龙使等在玄宗朝都由宦官出任[①]。

开元后期，由于以内飞龙厩为中心的三宫联防体制的建立，宦官在军政、马政方面都取得一席之地，势力得到极大发展，而北衙禁军则彻底脱离南衙，并逐渐向内廷靠拢。在宦官势力日盛的情况下，北衙禁军逐渐受到它的影响和控制。如所周知，宦官作为内廷势力参与政变，从而与禁军发生关系由来已久。神龙三年（707）太子重俊政变中，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军围攻玄武门，宫闱令杨思勗拔刀斩李多祚之婿，羽林军中郎将、前锋总管野呼利，政变军队为之气索。唐隆元年（707）政变中，宫闱丞高力士倾心结交李隆基（玄宗），为其内应，政变后擢为内给事。先天二年（713）诛太平公主政变，高力士再次积极参与，并由此擢授殿中监，成为玄宗心腹。但是，直到开元十九年王毛仲等前期唐元功臣被贬诛前，宦官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还非常有限。他们与禁军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立还是亲和，也都仅限于表层。天宝十一载（752），邢縡与龙武万骑谋杀龙武将军，以其兵作乱。事情败露后，邢縡及其党羽逃跑至皇城西南隅，被高力士带领的四百飞龙兵讨平[②]。这次事件与神龙三年（707）杨思勗单枪匹马对抗发动政变的羽林将士有本质的不同。一方面，这时的宦官已经拥有自己的军队，足以对叛乱的龙武军士兵形成军事威慑；另一方面，高力士作为宦官的代表人物，在玄宗朝享有突出的政治地位，而且，他又通过唐隆政变和先天政变与禁军结下不解之缘，以其出面，能够对叛乱的禁军造成有效的心理威慑，这使得天宝十一载平叛成为宦官势力即将插手禁军的一个信号。

---

①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第244—279页，中华书局，1989年；赵雨乐：《唐代内诸司使之权力构造》，《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49—112页；宁志新：《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2—70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三月条，第6911页。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十五载六月，玄宗出逃，右龙武军大将军陈玄礼整比禁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随行。但其时羽林飞骑早已随高仙芝开赴前线，并最终覆没于潼关，因而实际上扈驾的只有龙武军①。丙申，行至马嵬驿，太子李亨、宦官高力士、李辅国利用陈玄礼再次发动兵变，诛杨国忠等人，迫玄宗缢杀贵妃，促成了玄宗向肃宗权力的嬗变②。回顾唐前期的历史我们发现，虽然北衙禁军一向与宫廷政变结下不解之缘，但玄宗以前的政变往往是禁军与南衙合作。如嗣圣元年（684）废黜中宗政变，宰相裴炎积极参与；神龙元年（705）诛二张政变更是由宰相集团全权指挥；神龙三年（707）太子重俊政变则有金吾卫将军成王千里合作③。马嵬之变则不然。经过玄宗一朝的改造，到天宝十五载，北衙禁军早已和南衙脱离关

① 飞骑开赴前线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第6937页。另外，据《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六月己亥，玄宗出逃，次扶风郡，随行将士咸怀去就，玄宗谓之曰：“卿等国家功臣，陈力久已，朕之优奖，常亦不轻。”及《旧唐书》卷五一《杨贵妃传》礼部侍郎李揆云：“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亦可证实玄宗逃离长安时，随行部队只有龙武军。

②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第232页。对于马嵬事件及其背后策划者的讨论，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高力士主谋说，见黄永年《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学林漫录》第五辑，1982年4月，第120—128页；《〈长恨歌〉新解》，《文史集林》第一辑，1985年，第179—206页。陈玄礼主谋说，见杨希义《试论马嵬驿杨贵妃死因真相》，《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第87—93页。李亨主谋说，见任士英《马嵬之变发微》，《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128—133页；史延延《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烟台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34—39页；唐华全《也谈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河北学刊》1997年第4期，第90—95页。笔者较倾向于李亨主谋说。但无论那种看法，都不否认宦官和禁军在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③ 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正月条，第6417—6418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七中，宗神龙元年正月条，第6578—6581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景龙元年七月条，第6611—6612页。

系。在宦官势力抬头的背景下，他们由受南衙牵制并与南衙互相渗透转化为受宦官牵制并与宦官息息相关。马嵬之变正是宦官与奴官联手的产物，它暗示着唐后期宦官通过控制禁军来操纵宫廷政治的基本格局。

马嵬之变后，玄宗与太子分途，作为后军的龙武军二千人以及内飞龙厩从太子西上，这正是北衙禁军和宦官的结合。在这二者之中，龙武军本来是唐玄宗的亲兵，与太子关系不深，到达灵武时，已经逃散殆尽，太子（肃宗）乃另行组建亲军神武军。而宦官势力则因为李辅国的定策作用而进一步抬升。史载李辅国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加剧了玄宗时代已经出现的宦官控制禁军的态势。回到长安后，李辅国专掌禁兵，唐后期由宦官统领禁军的局面由此开创。《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云："肃、代庸弱，倚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以德宗朝神策中尉的出现为宦官最终掌握禁军的标志。这一结论当然不错，但应该意识到的是，从肃宗朝开始，宦官典领禁军已经成为常态，距离最后的制度化，所欠仅时间而已。

唐后期宦官由干军而干政久已成为史家共识，由于控制了北衙禁军，他们口含天宪，操纵君主废立，成为政治巨蠹。学者们在考察宦官与禁军的关系问题时，似乎更多地将其与"安史之乱"这一突发性事件以及由此被激化的宦官权力上升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否认"安史之乱"对于唐代军事制度的深远影响，例如，节度使的普遍化以及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宦官典领禁军等等。但是，"安史之乱"对于这些变化的作用应该是强化而非引发。通过前几章的分析我们知道，宦官之能控制禁军，虽然有各

种各样的原因，却以玄宗朝北衙禁军彻底脱离南衙体系为基础。玄宗为了不使皇帝受制于权臣所采取的措施最终却导致皇帝受制于家奴，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参考文献

一、古籍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 年。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年。

（唐）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 年。

（唐）刘肃《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1984 年。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5 年。

（唐）魏征《魏郑公谏录》，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正》，中华书局，2001 年。

（唐）张说《张燕公集》卷一九，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 年。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年。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丁如明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宋）程大昌《雍录》，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

（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 年。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 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 年。

（宋）宋敏求《长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 年。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6 年。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中华书局，1988 年。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1 年。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年。
（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 年。
（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 年。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年。
（清）《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年。
（清）王昶辑《金石萃编》，中国书店，1985 年。
（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张穆校补、方严点校，中华书局，1985 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6 年。
《英藏敦煌文献》第 4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三），文物出版社，1996 年。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吴刚《全唐文补遗》全七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 年。

二、今人著作

爱宕元《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 年。
岑仲勉《府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 年。
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 armée*，2 vols.，Leiden：E. J. Brill，1947—1948。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 年版，2000 年第二次印刷。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年。

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 年。

胡戟等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 年 1 月。

黄永年《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 年。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2 年。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三联书店，2000 年。

李树桐《唐史新论》，台北中华书局，1972 年。

李树桐《唐史索引》，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年。

李尤白《梨园考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鲁迅《小说史大略》，齐鲁书社，1997 年。

马得志《唐代长安宫廷史话》，新华出版社，1994 年。

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气贺泽保规《府兵制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9 年。

任半塘《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 年。

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 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年。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重润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 年。

陕西省文管会《永泰公主墓壁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年。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 年。

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龙门书店有限公司，1980 年。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 年。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 年。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年。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王涤武《武则天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
王世平、马俊民《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正中书局，1971 年。
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 年。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 年。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 年。
阎守诚、吴宗国《唐玄宗》，三秦出版社，1989 年。
阎文儒、阎万钧《唐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余华清《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文津出版社，1994 年。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年。
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年。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 年。
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 年。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朱雷主编《唐代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三、论文

爱宕元《唐代两京乡里村考》，《东洋史研究》第 40 卷第 3 号，1981 年 12 月。

爱宕元《唐代府兵制的考察》，《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 年 12 月。

爱宕元《唐代府兵制的再检讨——折冲府历史地理的分析》，《东洋史研究》第 56 卷第 3 号，1996 年。

包新生《唐代禁军组织的演变与宦官典禁军制度》，《天津师专学报》1984 年第 2 期。

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原载《史学杂志》第 41 编第 11、12 号，1930 年；收入《秦汉隋唐史研究》上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 年第二次印刷，第 3—83 页。

蔡明云《唐代四次中央政变及其相互关系》，《史苑》第 49 期，1989 年第 12 期。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六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

陈琳国《论晋末刘宋军功家族的三种类型》，《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陈寅恪《读东城老父传》，《史语所集刊》第 10 辑，1948 年。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收入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忠凯、杨希文《唐长安城坊业第宅变迁原因初探》，《文博》1991 年第 4 期。

程存洁《〈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补正》，《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

程章灿《唐代墓志丛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

程宗才《建成元吉何以必走玄武门》，《新疆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戴何都，Les Insignes en deux parties（*fou* 符）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 (618—907)，*Toung Pao*，41，1952，pp. 1—148。

丁爱博（Albert E. Dien），The Use of the *Yeh-Hou Chia-Chuan* as a Historical Sourc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34，pp. 221-247。

杜文玉《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3 年第 3 期。

杜文玉《高力士家庭及其源流》，《唐研究》第 4 卷，1997 年。

杜文玉《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 4 期。

杜文玉《从唐初官制看李世民夺位的基本条件》，《唐史论丛》第 7 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杜文玉《唐代宦官的俸禄与食邑》，《唐都学刊》1998 年第 2 期。

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8 年第 2 期。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3 期。

樊文礼《唐代宦官掌典禁军试探》，《烟台师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

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文史》第 25 辑，1985 年 10 月。

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 年第 3 期。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 年。

葛承雍《重评高力士》，《人文杂志》1984 年第 1 期。

葛承雍《唐代的甲库考察》，《人文杂志》1987 年第 1 期。

葛承雍《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唐史论丛》第 7 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龚杰《唐代道士在长安宫廷的活动及影响》，《西北大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

谷川道雄《府兵制国家论》，《北大史学》2，1994 年 11 月。

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唐折冲府考拾补》、《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郭锋《唐尚书都省简论》,《中国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何兹全《魏晋的中军》,收入《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贺忠辉《唐〈杨执一墓志〉记事考补》,《碑林集刊》第二辑,1994 年。

贺梓城《唐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文博》1984 年第 2 期。

贺梓城《关于唐史中一些问题的纠正与补充》,《文博》1984 年第 3 期。

胡戟《酷吏政治与五王政变》,《西北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

胡戟《唐代太子监国制度》,《文史》第 40 辑,1994 年。

胡如雷《唐代府兵怎样变成骠骑和禁军的?为何有此改变?》,《历史教学》1957 年第 2 期。

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历史月刊》第 8 卷,1987 年第 1 期。

黄修明《高力士是马嵬兵变的后台吗》,《河南师大学报》1988 年第 4 期。

黄修明《唐代前期的北衙禁军》,《南充师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

黄永年《开元天宝时期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陕西师大学报》1981 年第 4 期。

黄永年《说李武政权》,《人文杂志》1982 年第 1 期。

黄永年《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学林漫録》第 5 缉,中华书局,1982 年。

黄永年《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黄永年《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学术集林》第 9 辑,1996 年。

黄永年《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 年。

黄永年《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燕京学报》新 3 期,1997 年 8 月。

贾麦明《唐长安大明宫及出土文物》，《故宫文物月刊》第 10 卷第 1 期，1992 年 4 月。

菊池英夫《唐折冲府与地方行政机关的关系》，《史渊》第 58 辑，1953 年。

菊池英夫《唐府兵制的成立过程与北衙禁军的起源》，《东洋史学》，第 13 辑，1955 年。

菊池英夫《唐代北衙禁军考》，《史渊》第 70 辑，1956 年。

菊池英夫《从西域出土文书看唐玄宗时代府兵制的运用》（上、下）分别见《东洋学报》第 52 卷第 3 号，1969 年 12 月；第 4 号，1970 年 3 月。

菊池英夫《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研究》，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四，中华书局，1992 年。

雷巧玲《从居住方式的变迁看唐王子权利的消长》，《晋阳学刊》1996 年第 3 期。

李方《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文物》1992 年第 9 期。

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第 36 辑，1992 年。

李鸿宾《唐玄宗择相与开天年间的中枢政局》，《文献》1995 年第 3 期。

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

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人》，《文献》1997 年第 1 期。

李锦绣《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新唐书之部〉》，《中国文化》1991 年第 5 期。

李锦绣《禁军及京师宿卫兵费》，《唐代财政史稿》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李锦绣《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原学》第 3 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年。

李锦绣《“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学术集林》第 10 辑，1997 年 8 月。

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 年第 7 期。

李树桐《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史学集刊》第 4 期，1972 年。

李树桐《玄武门之变的再认识》，《大陆杂志》第 72 卷 1 号，1986 年 1

月。

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2 期。

李晓路《唐代统治集团层次构成析论》，《学术月刊》1989 年第 9 期。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的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 4 辑，1993 年。

李雪芳《西安碑林藏〈唐周思忠墓志〉小考》，《碑林集刊》第三辑，1995 年。

李燕杰《隋领军府考补》，《文史》第 32 期，1990 年。

李钊平《论唐代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内在超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 年第 1 期。

李志生《论唐代公主政策的阶段性特点》，《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栗原益男《府兵制的崩坏与新兵种》，《史学杂志》第 73 编第 2、第 3 号，1964 年第 2、第 3 月。

砺波护《两税法制定以前客户之税负》，《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6 年 2 月。

刘光胜《唐代兵制的演变》，《历史知识》1981 年第 4 期。

刘后滨《唐代司法“三司”考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 年第 2 期。

刘后滨《安史之乱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刘健明《论北门学士》，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 年。

刘进宝《常何与隋末唐初政治》，《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刘俊文《唐代狱讼制度考析》，《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刘蓬春《玄武门之变伏兵考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0 期。

刘源《唐太宗为何不重用秦府旧将——兼论太宗任用武人的政策》，《历史教学》1996 年第 5 期。

娄建勇《隋末骁果兵浅探》，《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2 期。

罗永生《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历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唐折冲府考补拾遗》，二十五史补编本，开明书店，1937 年。

马驰《蕃将与武则天政权》，《许昌师专学报》1991 年第 4 期。

马得志《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 年第 6 期。

马俊民《唐代宦官专权与北军、马政的关系》，《河北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马良怀《中国宦官制度生存原因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毛汉光《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中正大学学报》第 5 卷 1 号，1994 年。

毛汉光《隋唐军府演变之比较研究》，《中正大学学报》第 6 卷第 1 号，1995 年。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街西》，《史流》第 25 号，1984 年 3 月。

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仪礼空间——以皇帝仪礼的舞台为中心》，《东洋文化》第 72 号，1992 年。

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号，1996 年。

妹尾达彦《中唐的社会与大明宫》，《中唐文学视角》，东京创文社，1998 年。

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唐研究》第一卷，1995 年。

孟彦弘《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后果》，《原道》第 2 辑，1995 年。

纳春英《官品服色制与唐人的色彩观》，《宁夏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倪岱峰《唐代府兵制中设府的基本构想》，《东方杂志》第 20 卷 7 号，1987 年。

宁志新《略论唐太平公主的政治倾向》，《河北师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

宁志新《说唐初元从禁军》，《河北师院学报》1989 年第 3 期。

宁志新《唐代的羽林军初探》，《河北师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

宁志新《唐朝的闲厩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潘孝伟《唐代的武举》，《安庆师院学报》1990 年第 1 期。

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

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 年第 2 期。

气贺泽保规《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原载《鹰陵史学》第 11 号，1986 年，收入作者《府兵制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9 年。译文见《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7 年第 1 期。

气贺泽保规《府兵在唐代府兵制中的位置》，《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1995 年 12 月。

秦健明《唐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位置考》，《考古》1994 年第 2 期。

任士英《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试探》，《烟台师专学报》1990 年第 4 期。

任士英《马嵬之变发微》，《扬州师院学报》1995 年第 3 期。

日野开三郎《唐初的军制》，《史学杂志》，第 62 编 12 号，1953 年。

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的研究》，《东方学报》第 33 册，1963 年 3 月。

日野开三郎《唐代翊卫考》，《东洋史学》第 28 辑，1968 年。

日比野丈夫《关于新获的唐代蒲昌府文书》，《东方学报》第 45 册，1973 年 9 月。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 年。

陕西省文管会《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 年第 2 期。

陕西省文管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 年第 1 期。

尚民杰《隋唐长安城的设计思想与隋唐政治》，《人文杂志》1991 年第

1 期。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第 3 期。

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1 期。

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 2 期。

史延延《试论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烟台师院学报》1995 年第 6 期。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 年第 6 期。

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 年第 2 期。

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 7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的演变》，《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8 年 12 月。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

唐刚卯《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唐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唐华全《略论唐中宗时期的政治风云》，《河北学刊》1993 年第 2 期。

唐华全《试论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唐华全《论唐玄宗诛太平公主事》，《河北师院学报》1997 年第 1 期。

唐华全《也谈马嵬兵变的历史真相》，《河北学刊》1997 年第 4 期。

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汪篯《唐初之骑兵》，《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汪篯《玄宗时期之禁军及其统帅》，《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 年第 6 期。

王赛时《唐代职业军人的谋生途径》，《西南师大学报》1990 年第 3 期。

王世平《跋郗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4 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82 年。

王素《唐五代的禁卫军狱》，《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 2 辑。

王素、邵千才《玄武门之变真相》，《文史知识》1998 年第 3 期。

王育龙《唐长安城东出土的康令恽等墓志跋》，《唐研究》第 6 卷，北大出版社，2000 年。

王元军《王毛仲与唐玄宗政权》，《文史知识》1993 年第 5 期。

王援朝《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廷与节度使所辖兵数考》，《文史》第 42 辑，1997 年。

王仲谋《唐云麾将军碑考跋》，《人文杂志》1993 年第 2 期。

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3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

吴宗国《唐玄宗治国之策与唐朝的盛衰》，《北京日报》1993 年 6 月 23 日。

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第 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武伯纶《唐代长安东南隅（上、中、下）》，《文博》1984 年第 1、第 2、第 3 期。

武伯纶《唐京兆郡折冲府考异》，《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6 期。

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 18 卷第 2 号，1959 年 10 月。

小畑龙雄《神策军的发展》，《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田村博士退官记念事业会，1968 年 5 月。

谢元鲁《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天府论坛》1996 年第 2 期。

辛德勇《唐长安城坊建制丛考》，《文史》第 37 辑，1993 年。

徐嫩堂《唐朝前期马牧业发达的原因》，《人文杂志》1994 年第 6 期。

薛平栓《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

薛平栓《浅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唐都学刊》1992 年第 3 期。

严耀中《论唐前期的军府学官》，《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严耀中《唐初期的库真与察非掾述论》，《史林》，2003 年第 1 期。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二》，《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杨鸿年《唐募兵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

杨文秀《唐宋时期兴庆宫的变化》，《唐都学刊》1992 年第 4 期。

杨希义《试论马嵬驿杨妃死因真相》，《西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叶其峰《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护军、中护军及护军师》，《文物》，1990 年第 1 期。

于汝波《唐代兵学述要》，《中国军事科学》1991 年第 3 期。

于汝波、杨希义《唐代军事论略》，《军事历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曾我部静雄《唐代南衙、北衙向南司、北司的推移》，《史林》第 64 卷 1 号，1981 年。

张国刚《唐玄宗的道路》，《文史知识》1983 年第 8 期。

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历史研究》1989 年第 6 期。

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1989 年第 2 期。

张国刚《唐代禁卫军考略》，《南开学报》1999 年第 6 期。

张金龙《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张沛《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文博》，1995 年第 1 期。

张其凡《五代后期禁军考述》，《安徽师大学报》1989 年第 3 期。

张文才《论隋代军事发展的特点极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张先昌《关于武则天杀害文武大臣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6 年第 1 期。

赵超《唐代洛阳城坊考补》，《考古》1987 年第 9 期。

赵冬梅《唐五代供奉官》，《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赵雨乐《唐代的飞龙厩与飞龙使——以大明宫的防卫为中心》，《史林》

第 74 卷 4 号，1991 年。

赵雨乐《唐代宫廷防卫与宦官权力渊源》，《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赵雨乐《唐末北衙禁军的权力基础》，《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编，1997 年。

赵雨乐《唐代宦官机构衙署考》，《第四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1999 年。

赵雨乐《唐前期北衙的骑射部队——北门长上到北门四军的几点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2 期。

郑宝琦《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文史哲》1988 年第 4 期。

郑英德、刘光胜《略论太平公主》，《史学月刊》1984 年第 3 期。

郑英德《唐玄宗年谱》，《四平师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周东平《论睿宗朝的政治改革与开元之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周敏《论唐代京都“禁军侠少”及在唐诗中之表现》，《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3 期。

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文史》第 17 辑，1983 年。

周伟洲《唐梨园新考》，《周秦汉唐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 年。

周晓薇、王其炜《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 年第 3 期。

朱长义《唐代前期的员外官制》，《荆州师专学报》1994 年第 3 期。

朱长义《唐代少数民族员外官制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 年第 1 期。

朱利民、张宪民《唐代马政》，《唐都学刊》1994 年第 2 期。

四、未刊博士、硕士论文

雷闻《隋与唐前期六部体制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7 年。

刘后滨《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 年。

范淑英《唐墓壁画中的仪仗出行图及相关问题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9 年。

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 年。

后　记

现在交付出版的这本《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选定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到现在，忽忽已有五年之久。博士毕业以来，由于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改变，我感受到教育英才的乐趣，也感受到更多的责任，把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教书上，总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来把它整理得更好，因此虽然有师友的不断催促，还是蹉跎下来，直到现在。

书稿的完成首先要感谢业师荣新江教授。我于 1999 年到北京大学师从先生攻读隋唐史专业，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信息都令我倾慕不已。先生重视新史料的整理与运用，提倡多学科的合作与交流，这些理念不仅直接指导了这篇论文，也将使我终生受益。正是在先生的引导下，我开始认真阅读唐代的墓志铭——这个文字量达到传世纸本文字两倍的资料宝库。在墓志中，我看到许多有关唐代北衙禁军的材料，而禁军的活动因为事涉大内，在传世文书中总是语焉不详。禁军问题联系着皇权，而皇权的发展正是唐代政治的主题之一。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毫无疑问，这个主题和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很大距离，但是，先生还是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的选择，并在以后的论文写作中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包括一字一句地通读和修改我的全部文稿。

论文的写作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宗国先生、王小甫先生、邓小南先生、考古系齐东方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阎守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正建先生的悉心指导，先

生们在肯定论文的同时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意见和建议，使我深受教益。

论文的最初思考开始于荣师的唐代墓志读书课。从那时起，读书班同学之间的辩难质疑便成为本文写作的灵感源泉之一。直到现在，每当想起在燕园理科楼中古史中心夤夜同读、切磋琢磨的情景，还让我备感温暖。

2002 年，我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书。受学校条件的限制，居住条件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硕士导师徐庭云先生慨然邀请我“登堂入室”，搬到她的家中居住。就是在徐老师宽大的书房里，我最终完成了论文的修订。其恩之大，不敢言报。

2004 年，本书被列入学校“211 工程”出版计划，为书稿的顺利出版提供了方便；历史系李鸿宾、尚衍斌、杨楠诸先生时时慰勉，敦促书稿早日完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张山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蒙曼　谨识

2005 年 4 月于中央民族大学